

关于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 征文活动的通知

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的要求，省委决定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为此，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南方日报理论部、羊城晚报理论部、广州日报理论部、《学术研究》杂志社、《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学习时报》广东记者站将联合举办“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征文活动。应征文章要求通过回顾思考我国、我省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的巨大变化，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就如何认识成就取得的根源、如何增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信心，如何倡导“富而尚勤”、“富而好学”、“富而重教”、“富而崇德”、“富而求秩”精神等内容，提出自己的见解或感受。时间从 4 月 1 日开始，至 7 月 31 日结束。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来稿，并在来稿信封注明“双思征文”。征文活动将评出一等奖 3 名，各奖励 2000 元；二等奖 5 名，各奖励 1500 元；三等奖 10 名，各奖励 800 元；鼓励奖若干名。获奖名单将于 8 月 31 日前在三报两刊同时公布。

目

学术研究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主编助理兼
编辑部主任

周 华

总校对

黄荣显

•经济学 管理学•

- 5 / 陈东琪: 对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和政策的几点认识
- 11 / 张凤林: 论充分就业目标与政府公共工程
- 17 / 黄德鸿 王 聪: 产业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关系的四点考察
- 22 / 杨培芳: 网络经济与第三种平衡力量
- 27 / 尹艳华: 网络经济与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

•哲学•

- 31 / 高齐云: 解放思想是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自序(第一、三部分)摘要
- 42 / 郑 毅: 新的方法 新的思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评介
- 44 / 邹永图: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

- 49 / 张江明: 新世纪社会主义辩证法反思
- 52 / 刘景泉: 关于社会主义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新思考
- 57 / 卢黄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研讨会综述

•历史学•

- 59 / 孔祥吉: 关于翁同和一封密函的订正

录

- 62/ 吴义雄: 罗孝全索赔事件及其影响
70/ 盛永华: 宋庆龄与基督教
73/ 蔡少卿 刘平: 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
——兼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
79/ 董少新: 互证以求真
——试谈《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之史料运用

•教育学•

- 82/ 郑永廷: 论当代西方国家思想道德教育方法
88/ 吴坚: 当代外国教学思想述评

•文学 语言学•

- 93/ 蒋风: 东亚儿童文学百年回眸
101/ 赵朕 赵焱: 台湾微型小说论
107/ 张世君: 红楼香的空间暗示
112/ 李玉莲: 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
118/ 唐为群: “之”的一种特殊用法——衬音助词

•书评•

- 122/ 周祯祥: 历史的决定论还是历史的非决定论
——读李明华《历史决定论的现代诠释》
124/ 张荣芳: 岭南古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读后
127/ 〔香港〕邱振声: 寻根问底,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评何楚熊《中国画论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 83846307

83846177

邮政编码: 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 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 7326

CN44- 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CONTENTS

No. 3, 2000

My Viewpoints about Current Sp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Chen Dongqi(5)
Target of Full Employment and Public Projects Organized by Government	Zhang Fenglin(11)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s of Industries and Industrial Economics	Huang Dehong and Wang Cong(17)
Net Economy and the Third Force for Balance	Yang Peifang(22)
Net Economy and Reform of Governmental Management	Yin Yanhua(27)
Emancipation of Thought as an Internal Dynamic Force for Philosophic Development	Gao Qiyun(31)
A Comment on “An Approach to the Original State of Marxist Philosophy”	Zheng Yi(42)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ic Fate of Socialism	Zou Yongtu(44)
My Review on Socialist Dialectics in the New Century	Zhang Jiangming(49)
A New Thinking over the Basic Law of Socialist Dialectics	Liu Jingquan(52)
Points from the Forum o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Historic Fate of Socialism”	Lu Huangxi(57)
Correction of Mr. Weng Tonghé’s Secret Letter	Kong Xiangji(59)
On the Event of Mr. Luo Xiaoquan’s Claim for Damages and Its Effects	Wu Yixiong(62)
Ms. Song Qingling and Christianity	Sheng Yonghua(70)
A Book Review on “A History of Chinese Labour Movements”	Cai Shaoqing and Liu Ping(73)
Utility of Historical Data in Work “Nine Families of Hu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ujue’s Culture”	Dong Shaoxin(79)
Educational Methods of Thought and Morality in Current Western Countries	Zheng Yongting(82)
A Survey over the Thoughts of Teaching in Current Foreign Countries ...	Wu Jian(88)
A Look Back into Children’s Literature of Eastern Asia in the 20th Century	Jiang Feng(93)
An Analysis of Micro- Stories in Taiwan	Zhao Zhen and Zhao Yan(101)
Spacial Imitation of Fragrance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	Zhang Shijun(107)
Translation and Spread of the Stories and Operas Written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Yulian(112)
A Special Use of Chinese Word “Zhi” as an Auxiliary of Syllable	Tang Weiqun(118)
Book Review over Mr. Li Minghua’s “A Contemporary Explanation of Historic Determinism”	Zhou Zhengxiang(122)
My Impression of Mr. Yang Shiting’s “Paper Collections of Historical Relics in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Zhang Rongfang(124)
A Comment on Ms. He Chuxiong’s New Book “A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 Theories”	(Hong Kong) Qiu Zhensheng(127)

对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和政策的 几点认识

□ 陈东琪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34)

[关键词]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7年周期性下调 2000年的速度与政策 体制放松

[摘要] 文章主要就经济界对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和政策方面争议较多的三个问题进行讨论。作者有三点认识与看法。一是该如何评价1993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连续7年下滑;一是今年的增长速度与政策配合问题;一是要坚持“总量放松”,而且更重要的是加大“体制放松”的力度,更多地用体制创新的办法来促进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005-06

自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7年下滑,如何评价这种下滑趋势,特别是如何评价去年的增长速度?如何看待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期间宏观政策操作及其效果?今年的增长趋势会如何变化?政府政策操作的主攻目标是什么?最近,经济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议较多。我谈三点看法。

一、经济增长连续7年下滑应分两阶段看,这两阶段的政策取向表现为从“紧缩”到“放松”,前一阶段的“紧缩”政策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后一阶段的“放松”政策稳定了经济增长。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11次波动中,1993年以来这次周期性下调的时间最长,时间已经达7年之久,减速幅度为50%,从14.2%降到7.1%。如何评价这一下降趋势?我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当时的14%以上的增长速度,有“过热”成份,用紧缩政策将其下调到8%左右是合理的,符合健康、持续增长的要求;二是要注意阶段性变化,不能

一概而论。1993—1996年属于“紧缩”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14.2%下降到8.8%,这是政府主动性调整的结果。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调整和减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用压固定资产投资的办法压低速度,当时的高通货膨胀问题就不能解决,就无法治理金融、房地产泡沫给经济带来的混乱,严重的短缺现象就会蔓延,结构矛盾会更加严重,市场秩序就很难有所好转。因此,经济增长7年下滑中的头4年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它既是经济周期规律发展的必然阶段,又为今天提供了一个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进行全面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的机遇和空间,这是一个不能低估的成就。尽管买方市场、需求不足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出现了对企业 and 政府都有较大压力的失业增加和通货紧缩等,但是,从根本上解决短缺,扭转多年来难以解决的高通货膨胀、增长速度大起大落和“企业不愁销路”对促进竞争、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的制约等问题,让中国内地的消费者第一次享受到买东

西不用排队,可以自由选择,感觉到手中的钱更值钱,企业的投资和生产必须以消费者的意愿和偏好变化为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买方市场优于卖方市场、一定程度的需求不足强于普遍短缺的地方。而且,在短缺经济时期,我们企盼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换,企盼走出短缺,企盼没有高通货膨胀,现在做到了这些,我们又怎么可以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形势,怎么可以轻易否定掉没有短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普遍排队的发展环境呢?当然,我们不能让需求不足的程度加深,不能让通货紧缩趋势长期延续,应当力争实现供求相对均衡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但是,这并不等于要回到短缺和高通货膨胀的老路上去。

1997—1999年,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惯性下降,但是政策操作是逐步放松的,因此这个时期属于“放松”或“扩张”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从8.8%降到7.1%,这种速度下滑不是政府实行紧缩政策的结果,而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实际上,政府在这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回升的政策措施。其一是,1996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作出经济“软着陆”的基本判断后,强调以短缺和高通货膨胀为特征的总量矛盾问题基本解决,下一步要努力促使经济回升。其二是,1996年5月至1999年7月,中央银行连续7次减息,并减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信贷额度控制,发展消费信贷等,其用意在于降低生产和消费成本,让更多的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用放松货币、信贷政策的办法增加企业投资和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其三是,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大幅度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需求,通过增加财政性工资和社会保障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其四是,采取一系列体制性政策措施,包括

扩招、加快住宅分配货币化等,这也是为了拓宽消费渠道,缓解需求不足的压力。其五是,1997年以来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减少进出口贸易限制,下放外贸自主权,以应对亚洲金融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刺激出口增长,此外是采取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措施。显然,这些措施不是像前面第一阶段那样紧缩经济,不是压投资和消费,不是控制通货膨胀,不是要推动增长速度下降。而是用积极的办法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需求,抑制通货紧缩趋势,想尽一切办法让经济止跌回升。

因此,两个阶段的政策取向是不同的,是相反的:第一阶段的特征是“紧缩”,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放松”或“扩展”。我们不能把第二阶段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简单概括为紧缩政策,虽然在1998年7月以前政府一些决策文件还在提财政、货币政策的两个“适度从紧”方针。当时不少经济学家,也未能就几乎是突然到来的国内需求不足和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持续性影响作出及时反应和充分估计,有的学者和部门决策者认为国内需求不足和亚洲危机的影响是短暂的,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政策方针根据新的经济形势作出及时的“方向性调整”。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1996年第二季度至1998年第二季度的具体政策措施表现出灵活性和弹性,二是1998年第三季度以来当积极的财政政策被推到前台后,就不再提“适度从紧”了,这也表明政府在这期间进行宏观调控时充分注意到从最新实际出发,政策操作的灵活性提高了。应当看到,如果政府不在1996年确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方针,不在1998年以来从财政、货币政策上作出从“从紧”到“积极”和“适当”的调整,不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不加大货

币发行和信贷投放力度,近两年的增长速度就有可能在3—5%之间,和“三年治理整顿”时期的情形一样。近两年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估计每年都在3—4个百分点。因此,评价政府政策的效果,要客观,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当然,主流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对需求不足判断晚了些,强调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晚了些,用加大体制性政策措施扩大需求晚了些,这也是事实。由此可见,对市场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认识,需要经历一个从“部分”到“统一”、从“个别性观点”到“全局性政策”的过程。

二、去年的7.1%不比前年7.8%的含金量低,今年有可能恢复到前年的水平,但需要有积极而谨慎的政策操作来配合。

去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比同期全球平均增速的3.3%高一倍多,比美国的4%左右高3个百分点,比欧元区的2.2%高差不多5个百分点,但是比前年又减少了0.7个百分点。有的学者据此对政策提出批评,并根据这种下降惯性预测今年将以同样幅度再度下滑,使增长速度掉到6.5%以下,出现连续8年的增长减速。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建议采取“下猛药”的扩张政策,重点是大幅度发行货币,直接用膨胀性货币政策刺激低迷的经济。对此,到底应当如何看呢?我谈几点想法。

首先,去年的7.1%比较真实,虽然水分未完全挤掉,但比前年的7.8%少一些了。前年的速度中,有一部分是在第四季度“赶”出来的,当时为了“确保8%”,一方面,各地纷纷赶在年底前上新项目,加快开工速度,当年增发的几百亿国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10—12月“分”出去的;另一方面,当时方方面面

“确保8%”特别强调,甚至作为“首长政绩”来看待,出现了“统计上的繁荣”。去年不同,年初定的7%从一开始就强调“只是作为预测值”,不是指令性指标,实际上有多少就是多少,不强调“确保”,这样各地就不必在统计上攀比速度,也无须在年底“赶”项目。所以去年7.1%的含金量并不比前年的7.8%低。

其次,去年的7.1%是一个平均值,从月度、季度看,表现为“前高后低”,前三个季度在7%以上,分别为8.3%、7.6%和7.4%,第四季度不到6.5%。这几个数字告诉我们,如果按这个季度性下降惯性继续下去,今年的确有可能达不到7%的增长速度。这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如果要实现7%或略高一点的速度,就得抑制上述惯性,就要适当加大政策放松的力度,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半途而废。今年的政策操作重要的是要注意好节奏和力度,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放松方面宜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我们注意到,近两年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后,经济有止跌回升的迹象,货币供应量增长也已经开始进入快车道,在此背景下,如果过分加大发钞票的力度,用膨胀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加速,不仅有可能为以后的经济留下高通货膨胀的隐患,而且可能将经济重新推到数量扩充的轨道。因此,今年应当注意控制货币政策放松的强度,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扩张度不能一下子变得太大。

其三,从发展趋势和政策操作动态看,经济增长下降惯性有可能在年中扭转,全年估计会出现“前低后高”的增长轨迹。我在今年1月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恢复到前年7.8%的水平”,其理

由,一是出口增长强劲回升的惯性不会很快逆转,因为6月左右“入世”会保持较好的出口预期,去年出口权下放带来的“出口增长效应”要比提高出口退税率带来的“出口增长效应”更能持久,预期世界贸易增长加速两个百分点左右将有利于我国今年的出口扩张;二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从去年第二季度见底(5.5%)以来,逐季稳定回升,目前在8%以上,如果今年完全停止福利分房,将货币性住房补贴并入工资,提高工资水平,则居民收入预期将提高,这会提高大众购买力,刺激消费,而消费需求上去了,过一段时期后,投资需求会跟进;三是政府今年在加大增发国债力度的同时,将增加投资需求的重点放到激活民间投资上来,可望改变今年非国有投资的疲软格局,今年下半年社会投资需求的增长估计要快于去年下半年,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可能高于去年,在10%左右;四是最近几月以来,冶金、石油和其他原材料涨价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出现了连续3年多负增长后的回升,不仅会在一段时间后逐步改变人们的通货紧缩预期,而且也表明国民经济运行的活力开始增加,市场正在出现由冷转暖迹象,在这个形势下,如果保持近两年政策放松的连续性,特别是努力消除制约增长的体制瓶颈,今年的经济增长恢复到前年的水平是可以预期的。

我想强调的是,政府今年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要抑制连续7年来的减速趋势,争取实现7.5%以上的速度,但不能“为速度而速度”。最近,各类媒体宣传“发展是硬道理”的声音多起来了,这是对的。没有发展,要想强国富民是不可能的,三步走战略也会落空。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发展”理解为“高速增长”。“发展”包括“较快增长”,也包括

“结构优化、效益改善和质量提高”,没有后者的“发展”,只不过是简单的数量型“发展”,这种“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是没有竞争力的。相反,在加快结构调整、推进体制创新和提高增长质量方面取得明显进展的基础上,实现实实在在的、水分进一步减少的7%左右的速度,其“发展”的业绩就是了不起的。为了突破原来计划经济过分强调高速度的观念,我们的政策指导要多在“调结构”和“改体制”上做文章,速度是一个“事后”的记录,可以作为预测指标,但不应当作为“事前”的指示,否则会分散宏观调控的精力。

近几年的统计资料表明,虽然总量增长速度在逐年降低,但同期的人均GDP在加速增长。这个“增长差”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贡献,但是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增长质量有所提高带来的。同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如果重复建设的程度越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对称性越好,其发展的意义就越大,人均收入水平就越高。所以,有理由相信,在一定的增长速度条件下,和原来的“为生产而生产”的经济相比,目前的“为消费而生产”或“为需求而生产”的经济增长,具有更高水平的“发展”涵义。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很高了,并不是说结构矛盾已经解决了,质量和结构的低水平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此,今年要特别强调提高增长质量和调整结构,要特别强调“有效增长”,要特别强调“发展”和“速度”的不同特点。为了减少资源的过度消耗,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我们不得不在“体制”、“结构”和“质量”上做文章。

三、今年政府政策的操作,不仅要继

续坚持“总量放松”，而且更重要的是加大“体制放松”的力度，更多地用体制创新的办法扩大需求，促进增长。

今年要在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结构矛盾有所缓解的基础上，实现 7% 以上的增长速度，不能只靠市场的自发力量，还需要政府干预，需要采取更为放松的政策措施。那么，政府下一步应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呢？采取以增发国债、提高工资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适当增发货币、增加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信贷投放为基本内容的货币信贷政策，大家的认识已经基本一致，也是中央在去年 11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了的。我想强调的是，今年要想在提高增长质量的基础上保证较快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加大体制性政策措施的力度。

今年，政府运用政策措施扩大需求，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促使经济增长速度止跌回升，可以在体制创新上多做文章。有的学者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解决总量和结构矛盾而忽视全面深化改革，不要因为面对通货紧缩趋势和更大的失业压力而对改革三心二意，既要加快经济增长，又要推进体制改革。这个意见很有意义。我想补充的是，加大体制创新的力度，在有的方面会对总需求产生“紧缩效应”，比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其资本和就业份额可能缩小，这会相对缩小国有投资需求的规模。但在另一方面会产生“扩张效应”或“增长效应”，比如体制放松使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环境改善了，经济自由了，它的需求就会扩大，其增长的速度就会加快。所以，加快体制改革可以扩大需求，促进增长。所谓体制性政策是指那些突破体制瓶颈，促使体制放松，让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的政策措施，它不同于财政、货币政策等

“总量性政策”的突出表现是，政府不要花钱，只要放权就行了。这种体制性政策，不仅会产生“增长效应”，而且有利于调整结构和提高质量。去年下半年的出口快速增长，有人说是用提高出口退税率的 600 亿元换来的，其实，该年下放出口权对刺激出口增长的贡献功不可没。体制创新式的改革可以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农业改革是这样，90 年代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是这样，最近的外贸体制改革也是这样。由于有体制创新，资源耗费减少了，比如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劳动的投入减少，国有工业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后冗员分流出去，但产出没减反而增加了。这说明，体制改革可以提高投入产出率，可以实现孙冶方早年提出的“最小—最大原理”，促进经济增长。

从体制创新角度扩大内需、刺激增长的政策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1) 完全停止福利分房，放开住宅交易市场，刺激住房需求增长；(2) 发行社会保障债券，加快建立市场型社会保障制度，为加快国有企业的产权和机制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3) 推进利率市场化，创新银行信贷体制，使国有这一块的信贷资源分配更有弹性，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4) 适当开放民间金融，建立非国有企业自由融资机制，为扩大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5) 取消收费制，建立单一税制，减轻企业、农民和城镇居民的经营和消费成本；(6) 加快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的步伐，迅速转换资本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加快股份制改造进程，让部分国有资产出售变现；(7) 变实物分配制为货币工资制，发展经理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创新收入分配体制；(8) 从调减税费和农民开支等方面努力使农民增收减支，提高农民的购买力；(9) 转变

地方政府职能,突破地方保护主义体制,打破地方垄断体制,形成全国统一的需求市场,促进全社会总需求的增长;等等。这些体制创新的政策措施,当然不可能在今年一年内完全推出,但是,今年在这方面的力度应当大一些,范围应当宽一些。这些体制创新,是今年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评价,经济理论界也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志有急躁情绪。前两年,当减息的效果不很明显时,有学者急忙下结论说“货币政策失灵”,当积极的财政政策未能带动社会总投资需求,加速增长时,有学者认为“挤出效应”会导致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减弱。实际上,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评价,时间要放长一些,不要太近视,不要

过早地作出否定性结论,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微观机制还不很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显现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时间,政策出台后过一段时间总是会有效果的,当然这要求我们的政策既要有连续性,要坚持,不要三心二意,又要注意协调搭配。现在看来,前期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正逐渐显现,不仅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上去了,而且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得到长期体现。如果今年在继续放松财政、货币政策的同时,加大体制性政策措施的力度,目前经济生活中的需求不足、失业和通货紧缩趋势比较明显的问题,在一段时期后将会缓解,国民经济将会随之回升。

责任编辑:韦 前 湛 明

论充分就业目标与政府公共工程

□ 张凤林

(辽宁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辽宁 沈阳 110036)

[关键词] 失业 再就业 政府职能

[摘要] 近年来,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我国的失业问题(主要是城市失业)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引起了国内外方方面面的广泛关注。能否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的成败。解决失业问题, 固然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努力, 但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应当是实施再就业工程的中心环节。

[中图分类号] F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011-06

一、当前的失业问题与充分就业目标

应当说, 我国社会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较大的失业压力, 这种压力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到传统计划体制特别是就业体制强制性束缚而表现得并不显著。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市场调节空间的逐步增大, 要素配置的自由度增高, 失业问题逐渐凸现出来。特别是近一二年来, 随着微观方面特别是国企改革力度的加大, 和宏观方面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失业问题也变得愈来愈严重, 继 20 世纪 80 年代初和 80 年代末的两次失业高峰之后, 目前我国正在形成第三次城镇失业高峰。据统计, 截止 1997 年底, 我国城镇下岗职工已达 1150 多万, 连同当年城镇已有失业人口 570 万, 总计约 1700 万。据此计算, 城镇失业率将超过 9%。其中, 像辽宁等国有经济成份占较大比重的省份和地区, 失业率可能会更高。另外, 也有学者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或失业人口以及城镇未统计的失业(诸如在岗闲置等隐性失业) 统一包括进来加以

估算, 测定中国当前的失业率高达 20% 以上, 甚至 30%。尽管不同学者由于统计方法与口径等方面的差异所估算的失业率并不相同, 但是失业率逐渐升高、失业形势日益严峻却是当今我国社会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从深层次分析, 中国的失业问题实际上归根结底都可以溯源于人口与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和劳动力供给过剩、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 在向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发生失业是一种必然现象。道理很简单: 市场经济调节奉行效率原则, 而效率原则要求企业对要素的配置服从利润最大化目标, 故而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企业转制的逐步到位从而企业行为的逐渐理性化, 原先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以“过渡就业”或“隐性失业”等形式掩盖着的劳动供大于求的矛盾便被释放出来, 形成公开失业。在现实中我们看到, 除了一些由摩擦性因素而引起的短期、过渡性的失业以外, 绝大多数的失业(不论是原有劳动力失业就业机会, 还是新生

劳动力缺乏就业机会)本质上都不过是这种市场效率原则发生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表明,失业将是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副产品”,即使没有各种周期性、结构性等等因素的作用,失业也会发生,这些因素的存在只不过加剧了失业的严重性而已。

应当说,一定程度的失业的存在对于保证微观经济运行效率是有某种积极意义的,它有助于增强企业活力,加强对劳动者的激励,形成竞争氛围,因而为社会所必需。但是,当超过一定限度(即社会临界点)以后,失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便会凸显出来。这是因为,一方面失业毕竟意味着人力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当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人力资源闲置时,便表明了一国宏观经济总体效率的损失。另一方面,失业的存在也会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均等程度,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带来威胁。特别是当失业率达到较高程度以至于导致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严重非均衡时,将会产生各种病态或畸形的社会现象,诸如赤贫、犯罪乃至暴乱、社会政治动荡等等。简言之,当失业超过了社会可承受的临界点,将会产生两大后果:一是宏观经济效率损失,二是社会不均等加剧。前者意味着资源配置点位于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显然偏离帕累托最优;后者根据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理,也将明显地低于帕累托最优或社会最大福利状态。由此表明,高失业率的存在意味着市场失灵,对其显然不能听之任之。以1946年英国政府发表的“就业政策”白皮书和美国国会通过的“就业法案”为标志,实现“充分就业”开始成为西方各主要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里的充分就业,当然不是指全部

就业,而是指将失业率限制在社会临界点以内的就业水平,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社会失业率是“自然的”,因而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充分就业是在保证微观经济运行高效率基础上的一种理想的就业水平,同时它又实现了宏观经济运行的高效与稳定,因而体现了微观效率与宏观均衡的统一。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为例,当失业率保持在6%左右的时候,便意味着实现了充分就业。

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要求社会公平,因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应当是一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能够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益完美结合的经济体制。关于我国的理想的就业水平或适度失业率究竟是多少的问题,目前学术界观点尚不一致,但我们认为,鉴于我国的体制转轨还不到位,社会保障体系还远不完善,因此适度的失业率显然应低于市场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备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是否可控制在5%以下。

值得重视的是,已经实施的再就业工程虽然取得不小的成效,但是同目前严峻的失业形势下社会对缩减失业的需求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以往在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思路与方法上存有偏颇之处。例如,有的地方把再就业工程简单地等同于扶贫帮困,甚者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传统的统包统配的就业模式上去,以至于重又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有的地方则单纯强调要素市场发育对于增加就业的功能,而忽视了政府在实施再就业工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反映了人们对于充分就业的目标的含义以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认识上还不到位,还没有完全学会用市场经济的理性思维去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

关系、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从而就不能不影响到再就业工程实效的正常发挥。

二、充分就业目标与强化政府职能

解决失业问题,实现充分就业目标,既需要完善市场功能,更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是当前深入推进再就业工程必须明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失业乃是市场所引发的,是市场机制自发运作的必然结果。就此而言,企图靠发育和完善劳动市场来消除失业是难以奏效的。当然,市场与失业的关系是双重的,当市场发育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条件下,包括人力在内的各种资源的流动将更加充分和自由,这对于人们发现新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再就业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的发育与完善有助于刺激就业。因此,市场对于失业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制造失业,也可以通过提供新的再就业机会来刺激就业和减缓失业。不过,通过市场所减缓的失业主要是一些因摩擦性因素而造成的暂时、过渡性失业,而对因总量因素而造成的失业,例如当经济运行处于均衡时劳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市场则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所以,从总体上看,市场制造失业的效应一般将大于减缓失业的效应。正因此,我们通常把高失业率的存在视为一种“市场失灵”。

为此,在实施再就业工程、追求充分就业目标的过程中需特别注重发挥政府职能的主导性作用。现代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市场调节与政府管理相结合的经济,市场调节这只无形之手的功能在于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实现微观经济的活力与资源配置的效率,政府管理这有形之手的职能则在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与资源总体利用的效率。我国从原有的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

制转轨,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化,即从原先的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取代市场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就宏观管理来说,由于其特有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只能非但不能弱化,反而需要强化。因此,对于像充分就业这样的重要宏观经济目标,政府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主要责任。那种单纯地把消除失业、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希望寄托在完善和发达的劳动力市场上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还将削弱政府应当履行的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正常职能,因而不利于宏观政策的有效实施。

由政府主导实施再就业工程,决不意味着重又回复到过去那种由政府“包下来”的就业体制去,如果那样实际上就等于放弃国企改革,因为如果政府“包下来”实际上也就等于国企包下来。正确的思路是要求政府按照市场经济下的常规方式,即综合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和手段,根据经济运行的现状进行行之有效的调节,努力实现充分就业以及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等目标。在这方面可供政府选择的政策措施是很多的,应特别指出的是如下几点:

一是需求管理政策,即通过刺激和扩大总需求来增加就业,这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当产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时,将会导致企业缩减生产规模,从而引发劳动市场需求不足,造成就业机会减少和失业的发生。因此,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是扩大总需求。这一政策措施对于我国当前推进再就业工程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虽然我国的失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这一人力资源环境,但是,当前失业问题变得如此严重

显然与近两年来国内需求疲软以及因东亚和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不足密切相关。因此,刺激总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乃是当前减少失业的一剂救急良药。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手段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财政政策,它具体又分为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两项,减税有助于刺激民间的消费与投资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则直接扩张总需求;其二是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松动银根来刺激民间投资需求。就作用力度而言,财政政策要强于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一项作用更强大。我国在1998年为启动经济曾连续三次降息,但效果都不明显,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出台扩张财政支出的政策,实际上就验证了这一点。

二是人力开发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善和提高现有人力资源的素质,增强其职业适宜性来扩大就业机会。与上述需求管理政策不同,人力政策本质上属于一种供给管理政策。与需求政策相比,人力政策对于社会实现长期、稳定的充分就业目标更具有重要意义。人力政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教育与培训,其二是人力迁移与流动。所谓教育与培训,主要是指对于已经下岗的失业人员以及进入劳动年龄但尚未上岗的待业人员进行各种专业技术知识的教育与职业技能的培训,增强其人力资本素质与含量。由于这种教育或培训不仅对受教育或培训者本人有益,而且还会对整个社会带来诸多好处,诸如增加了失业或求职者的技能从而提高了职业适应性,延缓了适龄劳动力进入就业领域的时间,促进了整个社会科技水平以及国民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等等,所以即使在西方国家此类培训的相当大一部分通常也是由政府出资举办。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由政府大力兴办各种职业技术培训更是理所当然。然而,在前些年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过程中,一些地区或部门的领导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他们重安置,轻培训,只讲“输血”,不讲“造血”,结果虽然在某一时期勉强缓解了失业的压力,但没过多久失业率又恢复到甚至超过原先的水平。这个教训是需要很好总结的。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失业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开发地带的城市群,而在内陆、偏远地区失业问题则不突出,甚者还存在着劳力缺乏、资源闲置有待开发的问题。这样,如果宏观上有针对性地实施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引导沿海地区的剩余人力去内陆、偏远地区开发资源,置产兴业,将是一种现实而有效的扩张就业途径。此外,人力迁移与流动还包括跨国移民与劳动输出,这也应当成为我们今后在扩大对外开放中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的一个方面。

三是产业政策,这也是一种供给管理政策,其具体内容是指宏观当局通过有效地运用税收和补贴、利率与信贷条件等经济杠杆和手段,调节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等,使其符合于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产业政策对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具有重要功能,以产业结构为例,如果国家通过各种有利的政策措施大力鼓励并积极扶植对吸纳劳动力强、而资本装备要求低的第三产业,而适当控制一、二次产业的投资规模,那么将会产生明显的增加就业效应。从技术结构来说,如果对于那些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或部门给予优惠政策,也将产生类似效果。当然,产业政策的实施不仅要着眼于充分就业,而且要综合考虑到产业结构升降换代、技术创新与进步等等。这些目标之间也许是有矛

盾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宏观上就没有任何政策协调与平衡的空间。实际上,在某些部门或领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完全可以和引进高新技术并行不悖。因此,如果忽视产业政策对于扩大就业的积极作用,那将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四是市场培育政策。如前所述,实施再就业工程应当以政府为主导,但同时也需要完善的市场环境与之配合,这就在客观上引出了政府加强与完善市场建设的要求。加强与完善市场建设,主要是建立与完善市场的信息服务系统,保证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市场信息的畅通与充分流动性。藉此,一方面可以为消除摩擦性失业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又能够为宏观决策者建立完备的失业监控体系提供信息基础。

上述这些政策措施各有特点,它们在实施方式、操作手段以及政策效力等方面是不尽相同的。决策者在具体实施这些政策来推进再就业的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各项政策措施的特点,充分利用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协同配套地同时或适时地出台某一种政策或某几种政策,这样方能产生理想的政策效果。

三、有效地举办公共工程应成为当前的政策重点

我们已经知道,实施再就业工程进而追求充分就业目标,应当以政府为主导,而政府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又是多方面的。那么,接下来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在当前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政府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政策操作思路呢?

我们认为,医治失业的政策操作显然应当以需求管理政策为主,同时辅之以其他各项政策。而在需求管理政策当中,尤其要加大财政政策特别是其中的

财政支出政策的操作力度,通过大力兴办公共工程来刺激总需求和就业增长。

首先,在当前通过大力兴办公共工程来解决失业问题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目前失业形势日益严峻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总需求有关,相当大的一部分失业属于需求不足型。另一方面,在刺激总需求的各项政策措施中,凭靠间接传导机制的货币政策已显得软弱无力,唯有启动财政政策特别是增加公共工程支出方能形成显效。这就如同对于一辆一直处于静止状态的列车,要令其启动将需要付出比正常运转时高出数倍的拉力一样。在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的时期,凯恩斯就极力倡导政府举办公共工程来扩大就业。通过举办公共工程,一方面由于吸纳工程建设人员可以直接扩大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刺激各种生产资料与消费品的需求又可以间接地扩大第二级、第三级的就业机会,形成“乘数效应”。这对于尽快地缓解当前的失业压力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的意义。不仅如此,举办公共工程还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好处。一般来说,由政府兴办的公共工程都集中于道路、桥梁、水库、电站等社会基础设施产业或部门,其产品大多属于公共物品。社会基础设施或公共物品的发达程度,将直接制约一国经济长远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因而应当适度地超前发展。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是,长期以来,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总体上落后于加工工业,能源短缺、运输紧张一直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近年来这方面的供给虽有较大增长,瓶颈有所缓解,但总的来说供给质量不高,短缺矛盾依然存在。至于有关居民生活方面的环境设施建设和生态工程,就更是欠帐太多了。有人说中国目前已经告别

了短缺经济而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实际上就公共物品而言,我们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短缺局面。因此,通过政府举办公共工程来大力发展能源、交通等产业,实施环境与生态工程,改善生活质量,不仅可以扩大就业,而且还将有效地增加社会基础设施或公共物品的供给,克服其对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瓶颈制约。用通俗一点的话说,这就是由政府来牵头,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那种一方面有许多人没事干,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应该干的事而没人干的矛盾现象。

其次,通过举办公共工程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具有现实可能性。举办公共工程需要有资金来源,这或者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当财政收入不足时)来源于公共债务。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虽然政府财力有限,但居民个人储蓄存款余额高达 4.6 万亿元,且保持不断增长的势头,而在中短期内国民的消费热点又难以形成,这就为政府举债兴办公共工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在私人储蓄过度的情况下,政府举债支出仅仅意味着购买力的转移,不会发生“挤出效应”。因此,只要规模和结构控制得当,便能够达到即刺激总需求、增加长期有效供给而又不会诱发通货膨胀的目的。由此可见,在当前通过大力兴办公共工程来推进再就业工程实乃明智之举。对于公共工程,不仅中央政府要兴办,各级地方政府更要兴办,将其纳入地区性宏观调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之中。不过,今后我们在兴办公共工程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要使总量规模保持适度,根据近期刺激总需求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需要和现有财力的可能来确定公共工程的适度规

模,避免“一窝蜂”式的过热行为。第二,要保证结构优化,根据现实经济结构的特点及经济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使公共工程在各产业部门间形成合理分布,确实让公共工程起到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缓解瓶颈的作用,避免重复建设。第三,要讲求经济效益。公共工程虽属政府行为,但其具体运作应贯彻成本——收益核算法则,项目的选择应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项目的实施与建设过程要遵循规范的招、投标程序,并实行认真的监督与管理。

我们认为,如果按照上述思路有效地推进再就业工程,中国的失业问题在近期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并逐步得到较大改善,从而为国有企业改革和整个经济调整提供更大的空间,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尽快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最终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课题组:我国就业政策的战略目标和总体思路,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8年第37期。
2. 岳颂东:关于城镇职工下岗问题的思考与对策,经济研究参考,1998年第52期。
3. 钱小英:论我国失业率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
4. 课题组:我国失业的测度、警戒线及若干建议,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年第3期。
5. 钟朋荣:中国失业问题研究,学术研究,1998年第11期。
6. 布赖恩·斯诺登: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商业印书馆,中译本,1998年,p12。
7. 保罗·萨缪尔森等: Economics, 英文版, 1995, p591~ 592。
8. 陈淮主编:过剩经济! 过剩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p33。

责任编辑:谭湛明

产业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 关系的四点考察

□ 黄德鸿 王 聪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广东 广州 510632)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关键词] 产业经济学 工业经济学 区别 联系

[摘要] 我们的研究发现,不少人常常使产业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不加区分地交叉使用,存在互相重叠的问题。这种研究状况,无论对两大学科的自身建设与发展,还是我国当前的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本文认为发挥两者在市场经济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指导作用,本文从历史、中外比较、研究对象与内容、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和揭示了产业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 F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017-05

一、理论上区分产业经济学和工业经济学关系的现实意义

1. 从两大学科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看。产业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区别的根本标志是对市场的依附性不同。产业经济学是将各个产业部门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是以市场作为研究载体,着重于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为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研究,因此,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也就没有产业经济学。而工业经济学是就工业产业部门的研究,它着重于研究各个工业部门和行业的特殊性,因此,工业经济学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经济学科,并不一定要依赖于市场经济条件才能存在,它既可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经济学,也可以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业经济学。为此,正确区分产业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不但有利于这两大学科的完善与发展,而且有利于从产业的角度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2. 从部门经济的统一性要求分析。

我国原来按行政管理权限设置了一系列部门经济学,如电力经济学、煤炭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物资经济学等,这种划分有的属于工业经济学范畴,有的属于服务与流通领域的经济学范畴。这种划分方法割裂了部门经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各部门经济学不能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而且,由于学科缺乏科学的理论体系支持,造成学科间的内容严重重叠、交叉。产业经济学将各产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客观上适应了各产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客观规律,有效地弥补了按行政管理权限来设置部门经济学的缺陷,有利于建立科学的部门经济学科体系。

3. 从产业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关联性分析。产业经济学应当在当今我国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和观念的实践中得到新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乃是生产力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课题。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经济发展的观念和对经济增长方式

的认识是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突出地表现在:(1)认为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要素投入,即通过增量投资扩大经济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对于依靠市场行为,如通过企业并购等横向联合方式扩大经济规模等方式认识不够。(2)认为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产品产量,片面追求发展速度,没有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摆正,是为生产而生产,其结果是经济效益不高,甚至低下,并长期得不到扭转。这些问题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够有关,没有从产业结构优化,从产业的整体联系和发展,从规模经济考虑和改进。经济增长方式和观念的转变也是中国产业经济学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大好机遇,弄清楚产业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的关系,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据以制定产业和工业发展政策和措施有积极的意义。

4. 产业经济学既不同于微观的个量分析,又不同于宏观的总量分析,它是一般均衡分析,这其特点在于:第一,产业分析的经济对象是构成国民经济总体的各子系统及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与发展,这些子系统的关系即为产业结构,子系统内企业之间的关系组合即为产业组织,显然,这是一个特殊的分析领域。第二,产业分析比静态的个量分析和总量分析更偏重于动态分析,虽然产业分析也要对分析对象作静态分析如投入产出分析,但更偏重于各产业此消彼长的动态发展及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作用。产业分析就其分析对象而言,就决定了它的特点更偏重于结构分析。它的基本命题是:不同产业结构和不同产业组织下的国民经济总体会产生出不同的国民收入或净产值,并且会有不同的增长速度以及不同的效益和效率。第三,产业分析较之于个量分析更具实用性,这是因

为产业分析的经济理论基础,即产业经济理论本身大都是通过统计分析而得出的实际产业发展演化的趋势。第四,产业分析所关注的均衡,既不是微观分析中所着眼的局部均衡,也不是宏观分析中所追求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均衡,而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内部各种具体的生产与需求、中间需求与中间供给、最终需求与最终供给以及各产业部门的均衡。产业分析是经济分析的一种发展,又是经济分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产业概念与工业概念关系的历史考察

工业生产和工业的概念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产业的形成和存在却比这古老得多。事实上,人类社会在经历近代工业化革命之前就曾经历了畜牧业与农业等二次社会大分工,为人类社会生产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局限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的产业已具有了初级水平的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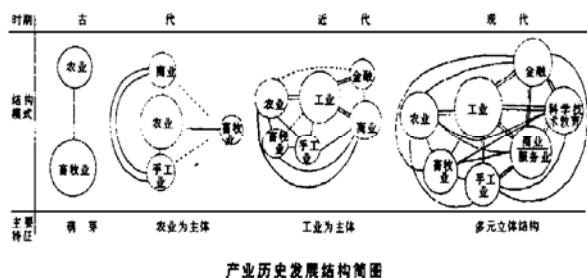
近代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浪潮来势迅猛,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并且主宰着整个人类社会实际生产能力水平。似乎工业生产就覆盖了人类社会整个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领域。当代社会生产深刻变革和一体化的进程早已超出了传统工业生产领域的范围,工业作为整个社会生产结构一部分的面目也日益清楚地显露出来,由于深入系统地研究和揭示社会生产组织结构,这正是造成产业概念与工业概念分离态势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18世纪首发于英国的产业革命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全面变革的历史过程。孕育与诞生于这场划时代变革的工业体系或机器生产体系尽管在后来占了主体地位,但仍不能不以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生产方式

的不断变革为其发展开辟道路。在这种意义上说,产业概念从一开始就具有比工业概念更广泛的涵义、更强的概括能力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产业概念和工业概念是渊源流长的,它们的原始含义“industry”是指的同一个概念,随着社会生产的深化和扩展,逐步地分离出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来。但同时也说明了产业和工业在社会生产的历史进程中和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紧密关系。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义产业的概念。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经济学中的产业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产业概念是指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包括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保险业等一切领域,而每一个具体产业如农业、工业等又是由同类型企业的集合而成。狭义的产业概念专门指工业或称为制造业内部的各种工业部门或行业。实际上,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产业概念中的产业,都是指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企业集合或群体,即“社会生产组织结构体系”,英译文为“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 system of social productive”缩写为“OSSOSP”。

产业结构体系的产生与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实质就是社会分工的产生及不断细化的过程。下面是产业历史发展结构体系简图:



简图中,大小为各个构成部分所占的地位;双线表示强联系,单线表示一般联系,虚线表示弱联系。

从简图明显反映出,近代以来在产业结构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工业发挥着主体作用,实际上产业结构体系的形成也就是工业体系的形成。

三、中西经济学的比较考察

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一般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微观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即单个生产者(或厂商)如何以有限资源从事生产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单个消费者(或家庭)如何把有限的收入用于消费以取得最大满足。微观经济学由均衡价格理论、消费和生产的优选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四个部分构成。其中均衡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宏观经济学是与微观经济学相对应的,它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考察和说明国民收入、就业水平、价格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如何决定和如何发生波动。其基本内容由国民收入决定论、经济周期论、货币与价格理论(研究一般价格水平,而不是研究个别产品的价格问题)、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等组成。

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产业”这个范畴被抽象掉了,西方经济学大多是不过问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内部结构问题的。从微观经济学看,它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的抽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研究的重点是厂商的行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收入的形成、分配和使用,它并不研究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研究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最终产品的总量运动,而把中间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也就是产业之间的关系抽象掉了。而现实的经

济活动,不仅要求回答国民收入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问题,而且要求分析再生产过程中产业之间体现的中间产品复杂的交换与消费关系,特别是日益严重的生产取向和资源优化配置等问题,正迫使人们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和把握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不能不涉及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内部关系结构,要求人们对社会再生产过程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产业经济学正是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未被研究的“产业”领域展开的产业之间和产业内企业间的产业关系研究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学科发展史看,可以认为,在以研究“包括工业企业”为对象的微观经济学和以研究“国民经济”为对象的宏观经济学之间,再出现一个以研究“产业”为对象的中观经济学,构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产业经济学的形成和微观经济学以及工业经济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其许多原理和方法都是从微观经济学原理中衍生和引申出来的。

四、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区别考察

20世纪80年代初,产业经济理论开始引入我国,随后,以惊人的速度在国内传播开来,有关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产业政策的论文著作不断涌现,并且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和研究机构。产业经济理论的传播和发展,既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为实现国内现存的部门经济学科体系科学化提供了途径。

工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地存在于现代工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规律,并探讨在不同具体条件下,自觉利用这些规律的途径和方法。工业是重要的产业部门之一,经济发展的中心就是工业化,因此,它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

作为一门部门经济学科,工业经济学通过对工业发展规律的探讨,指导人们对工业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

产业是农业、工业和商业等众多产业部门和产业行业部门的概括。产业经济学是从产业关系的总体上研究产业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资源在产业各领域中的优化配置。显然,产业经济学不同于工业经济学从工业这一特定产业部门去研究工业经济运行和管理机制问题。但是,产业经济学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产业”出发,探讨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中产业间的关系结构、产业内企业组织结构或行业结构变化的规律以及研究这些规律的方法。在产业经济学阐述和研究的内容及产业经济学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工业是其主要的研究客体。例如产业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产业组织理论以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为对象,实质是微观经济学中价格理论在企业与市场为研究对象的运用。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又是以工业企业为研究客体,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工业的集中、工业的专业化、工业企业的规模与结构等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与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霍夫曼对工业化中工业部门结构演变规律的探讨,40年代初C·克拉克、库兹涅茨用三次产业分类法对经济发展条件和变化规律所做的研究以及马克西、西尔伯斯对汽车规模经济的研究等密切相关。

五、方法论的差异考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个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区别,主要反映在对于“市场”这一研究载体的运用与反映程度和范围不一样。

工业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是要正

确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生产的客观经济过程,因此,边际分析法是研究工业经济的重要方法论思想。即微观经济学中有关消费者、厂商(通常是利润最大化)的供给与需求分析的局部均衡方法论思想。这种方法的长处是简明扼要、结构严谨并能得出许多实际结论。它的主要缺点是忽视了一般均衡及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中往往立足在工业企业的特殊性上,例如,同样一项措施对某个部门会产生效益,而对另一个部门则不一定产生效益。生产积聚、专业化、联合化和布局的形式,科学技术进步的方向,经营管理和经济刺激的经济方法、计划方法,只有考虑使它们得以实现的那些部门的特殊性,才会有效。

产业经济学是面对众多产业部门的整体研究,必然要把市场作为整个研究的载体,更为强调市场分析的方法论思想,通过市场来反映各产业部门之间联系的基本规律,即分析产业间关联的理论特点,揭示产业间关联关系量的比例,以此来反映产业经济现象。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范式“结构—行为—绩效”,即市场结构决定厂商行为,厂商行为决定市场绩效。这一依赖于市场机制的产业组织理论逻辑模式构成了产业组织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因此,这种分析方法是在对整个经济的各个生产组织领域(即产业)以及它们之间同时发生的相互影响的研究中来分析国民经济,即从产业角度来分析产业及国民经济。这种方法论克服了微观经济学局部均衡的不足,并且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论。继承和发展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方法的优点,摈弃了它们“条块分割”的弊端,具有立体再现事物本来面目的特点。

产业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有着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即经济分析方法论的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的关系问题。例如,价格理论作为产业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而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理论分析模式是研究个人和厂商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刺激,以解释各种市场现象。产业经济学和工业经济学在价格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产业经济学侧重产业间价格差异,注重各产业主体合理配置资源,工业经济学侧重厂商成本,价格高低,注重追求利润最大化。

通过对产业经济学和工业经济学关系的认识,既可以使我们明确产业经济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又可以通过二者的密切内在联系,使我们认识到工业经济学对于促进产业经济学发展和深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好地将两门学科结合起来,促进各自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悦主编,《产业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宋毅、张红,《产业发生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 丁敬平,《产业组织与政府政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
4. [澳大利亚]黄有光,《综观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5. Dennis W. Carlton, Teffrey M. Perloff: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London, 1990.
6. William G. Shepherd,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alysis, Markets, Policies*, 4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HK) Limited, London 1997.

责任编辑:韦 前 湛 明

网络经济与第三种平衡力量

□ 杨培芳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北京 100000)

[关键词] 网络经济 协同 哲学意义

[摘要] 文章分析了网络经济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 及对现代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影响, 指出了网络经济如何促使信息产业的改革, 论述了网络协同这第三只手的作用, 并讨论了从被组织经济到自组织经济的哲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 F0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022-05

早在 1881 年, 电力就为照明装置提供了能源, 但是电力真正推动生产力则是 20 世纪 20 年代电动机普遍使用以后的事。同样, 70 年代以来, 全世界投资电脑设备上千亿美元, 社会生产力未见明显增进, 进入 90 年代, 借助互联网对电脑设备的杠杆放大效应, 许多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大大改善。

信息网络的迅速普及, 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也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理论基础。80 年代西方经济界倡导“凡是小的, 就是好的”社会理念, 极力主张把大企业化整为零。认为船小好调头, 只有小企业才能适应信息社会多样化、非标准化的需要。进入 90 年代, 面对企业利润摊薄, 企业联合合并风潮不断, 西方又有人提出企业只有做大才能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抵御风险, 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认为 80 年代许多网络性企业(交通、通信、供水、供电)的私有化改革并不那么成功, 在现实改革与发展中还出现许多新难题。

美国商业部 1999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1995—1998 年, 互联网及信息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至少占 1/3, 降低通货膨胀率 0.7 个百分点。可是大多数网络服务商的获利遥遥无期, 单靠网络服务根本无法存活。又比如, 高科技产业是高质量高利润的行业还是高质量低利润的行业? 知识是社会合作的产物还是个人努力的结果? 知识财富是私人财产还是公共资源? 由于相互依赖性经济的增长, 是政府决策代替市场决策还是市场决策代替政府决策? 由于信息产业收益递增性和全球扩张性, 未来特大型企业的主要约束机制是市场还是政府? 交通、通信、环保、教育需要的大量资金如何解决, 是靠政府投资还是靠市场积累? 面对这些问题, 市场和政府都显得苍白无力。现代经济正在呼吁除市场规律、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即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协同力量。

一、从费里德曼到斯蒂格利兹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 西方多数经济学家笃信自由市场经济会解决资

本主义社会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个人管个人,上帝管大家”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遵循的社会学原则。但是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打破了自由主义放任经济政策关于依靠自由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贫穷和就业均衡的承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经济中垄断、外部性、机会不均等、失业这四大难题,因此产生了凯恩斯主义革命。

凯恩斯有两个卓越贡献,第一是发现自由经济本身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第二是提出了慎重负责的政府干预能恢复有效竞争和维持充分就业均衡,从而使自由市场再次作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但是几十年的经济实践并没有反映出构成凯恩斯理论的有效模型,经济在很多领域走向更大规模的垄断,垄断必然带来内部非效率性和价格、供求关系和服务质量的失衡。劳动力资源也不可能高度流动,政府调节市场的机制变得呆滞不灵。

70年代末,以费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作用的增加是影响经济利益和个人自由的祸根,过分的宏观管理和社会保障形成官僚主义,导致非效率性。唯一的办法是削减社会福利,接受短期高失业。他们的纲领是恢复自由市场经济和强有力的个人主义刺激。

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整个80年代起到了有效刺激西方经济再次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80年代后期,由于网络经济的兴起,使自由市场经济再次出现更多领域的失灵。西方企业并购风潮迭起,克林顿政府不得不默认企业并购和垄断的回归,并且开始冷落新自由主义,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吸引私人投资公共工程,以刺激经济增长。90年代开始走红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强调指

出,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对竞争具有局限性的产业进行规制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在某些行业中竞争是难以维系的,可能更适合几个生产者独占,这就形成了一种在政府干预下的适度竞争局面。

但是信息网络产业的大量投入,并不像工业经济那样直接创造产值和提高就业,很可能使许多网络投资商资不抵债或造成更多的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发现资本主义在后工业社会正面临窘境。一是信息社会相互依赖性的增长使社会公共决策日益代替政府决策和市场决策。二是在新形式下,社会更加需要的并不是物质意义上的经济学,而是站在劳动即人的立场上的经济学。完全听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完全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早已变得难以奏效,斯蒂格利兹的主张也不过是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一个折中方案。网络经济时代不仅需要市场规律,需要政府干预,更需要社会协同这第三种调控手段。未来投资的主要目的将不是高额利润,而是高科技素质、高教育水平和高生活质量。工业时代建立在线性控制思维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正在走向衰亡,一些更有生命力的建立在非线性思维上的理论体系(如理性预期学派和网络社会主义学派)正在萌发。

二、信息产业改革悖论

贝尔发明电话两年后便和他的伙伴一起创立了贝尔电话公司。到1880年,美国电话机发展到4.8万台,这时贝尔已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贝尔的电话事业由公司总经理西奥多·维尔继承和发展。

1893年,贝尔长达17年的专利权到期,之后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全国出现了6000多家电话公司,仅纽约市就有1000多家互不相干的电话局。当时

人们要与另一个区的朋友打电话,就得同时租用两个以上电话公司的设备,甚至还要忍受努力回想使用那部电话才能找到那个人的烦恼。维尔审时度势,详细研究了这种现象,作出了顺乎时空的选择。他首先提出电信公司不应该只追求利润,更具有服务社会大众的责任。并以“一个网络,一个政策,普遍服务”的口号,收买了多数私人电话公司,最后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

多年来,西方经济界总是单独划出一类企业,它受到公共利益的影响,并需要政府直接管理与调节。这样指定的企业通常都是私人所有,但都负有公共责任,因此被称为公共企业。典型的例子是公共交通、通信和供水、供电业。一般来说,这类企业都具有自然垄断性,是由它的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和资金沉淀性决定的。但是长期的自然垄断又给社会经济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比如大型垄断企业内部官僚化,非效率性,垄断利润及服务质量低下。

进入70年代,技术的发展使自然垄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不同网络公司之间的适时结算在技术上也成为可能。经过长期的辩论和诉讼,到1984年1月1日,世界上最大的私营企业AT&T(贝尔系统)终于被化整为零。美国电信自由化风潮很快波及世界,国有企业私营化,大企业分割成小企业似乎成了必然趋势,我国也有人提出,“美国的电信改革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进入90年代不久人们就发现,现代企业并不遵循凡是小的就是好的原则,而是只有大企业才能抵御高额投资风险,承受日益摊薄的利润。

如果说一般工业企业边际收益随着产量的增加呈递减趋势,那么信息企业的边际收益则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递

增。这就是说,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信息业的经济规模不是减小而是增大,甚至增大到了全球一个网络,全球一个芯片,全球一个软件的程度。在信息领域,一般的小公司愈来愈没有生存空间,跨国联合、购并之风迭起不断。许多专家开始重新审视80年代的电信自由化运动,认为美国1984年解体AT&T的作法并不可取,英国地铁、煤气和自来水公司的私有化没有成功,印度将全国电信业分解成21个经营者全面竞争是个沉痛的教训。香港本地电信由四家公司全面竞争的结果看来也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喊出了“重建垄断时代辉煌”的口号。

那么网络企业究竟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电信是自然垄断领域还是自由竞争的领域?90年代企业并购是垄断的回归还是自由化的超越?未来企业是高度专业化还是高度综合化?企业内部管理是集权还是分权?社会发展主要依靠相互依赖性还是依靠人们的独立性?未来的社会结构是被组织化还是自组织化?人们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这不仅关系到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更关系到整个信息社会的经济原则和社会理念的变革。一个重要情况是,在网络经济时代,市场和政府都面临失灵,原有意义上的集中型大企业和独立分散型小企业都将成为信息生产力的桎梏,只有在非线性思维上才能构筑兼有大企业的强盛又有小企业的灵活的网状企业结构。网络协同,合作性竞争正在形成第三种平衡力量,这种新平衡力量将重新激励经济增长,并且修补被网络经济撑破了的理论躯壳。

三、依靠“第三只手”的力量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曾断言,人们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

的手的指导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后来西方经济学将这一定理总结成帕累托最优。也就是相信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它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

但是,帕累托最优在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因为它是建立在无限多同等经营者和无限多同等消费者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之下的。现实的市场经济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因为:

(1) 垄断的实际存在。这是由某些产品和服务的规模经济性造成的。现代信息产业的经济规模出现了跨国联合扩张趋势。市场对于垄断性企业形不成约束力。

(2) 外部经济性存在。有些生产者的生产结果会对他人产生有利影响或者有害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结果也会对他人造成有利或者不利影响。尤其是某些生产和经营活动可能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危害公众健康和社会安全,这些问题不可能由市场本身自行解决。

(3) 公共物品的存在。如国防、环保、绿化、道路、桥梁、广播等公共设施,属于不付钱的消费,或者非营利投资领域。

(4) 信息不对称性。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假定是信息对所有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是透明的。而实际上,消费者与经营者对商品信息的了解总是不透明,而且不对称的。于是自私的经营者们必然会出现欺诈行为,破坏帕累托最优。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各国通常是采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政策干预,或者由政府直接进行管制。可是过分的政府干预或者管制会出现两个不好

的后果,一是使经济出现官僚支配下的低效率,二是会出现大企业收买政府部门,与政府合伙侵害消费者利益。

那么究竟应该靠什么力量刺激信息时代的经济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呢?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应该净化市场环境,完全由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恢复经济的一般均衡。一批社会学家则认为,高科技信息产业所特有的收益递增性引起的正反馈效应必将更快地破坏市场均衡条件,造成经济的极不稳定。必须加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甚至认为现在的许多问题(如环境、人口、教育、互联网)已远非地方政府所能解决。“必须交给整个国家去寻求解决办法”。但是人们是否只能交替求助于市场规律和政府干预这两只手的力量,或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呢?近几年的理论研究证明,在网络经济条件下,利用市场规律和政府干预这两只手的力量还是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经济以及人类生存环境问题。必须重视网络协同,即第三只手的作用。所谓第三只手,原指社会道德规范对经济的积极影响,是建立在“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利他主义倾向”基础上的理论。但是现阶段人们的利己主义倾向往往压倒利他主义倾向,致使道德规范的力量显得苍白无力。到了网络经济阶段,一方面人们要利用网络进行经济交往,就必须遵循网络规则和网络信誉,甚至需要共同投资网络建设,共享网络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信息网络使各种交易活动变得日益透明,使原本靠少数先进分子自觉遵守并教化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变为一种阳光下的刚性气氛,社会监督将无情地清除与社会利益不和谐的害群之马。合作性竞争和双赢战略将是最好的选择。网络协同的作用日益成为继市场规律、政

府干预之后的第三只手的力量。

四、从被组织经济到自组织经济

工业社会的哲学原则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和机械决定论基础上的被组织化原则,它强调共性抹煞个性。这种组织原则在追求单一目标的群体活动中十分有效。恩格斯曾引证拿破仑的话说,“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①主要原因是两军的组织程度不同,而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则把信息定义为组织程度的量度。如果我们认同维纳的定义,就会沿着兵营规律在经济控制论基础上越走越远。这一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停滞,80年代东欧国家巨变的历史事件中得到了证明。

从哲学本质意义上讲,信息就是事物的差异性。到处杂乱无章的系统是“熵结构”,没有信息量,到处统一一致的系统结构也没有什么信息量。只有保持个性多样化的有序系统才包含大量的信息。所以说信息不是被组织程度的量度,而是自组织程度的量度:信息社会不是被强力控制下的抹煞个性的社会,也不是混沌无序抵消个性的社会,而是通过信息的作用,使每个行为主体不断自组织的多样性社会。在今后的改革中,信息产业既不适合建立高度集中的大型垄断性企业,也不适合高度分散、对抗性竞争的众多小企业,而是更适合各经营主体灵活独立又协同合作的自组织化的少数大型专业化的企业集团。

当前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难题是工业商品需求不旺,公共能力供给不足。未来的投资市场肯定要向交通、通信、环

保、教育领域倾斜。但是按照市场规律,资本只经营有利可图的企业或领域,而把涉及建立共同生产条件的开支推给整个国家。但是,靠市场积累和政府投资难以筹集到现代公共工程需要的巨额资金,而必须依靠社会协同的力量,由受益者共同投资无利可图但可直接提高生存质量的领域。为了更多地吸纳社会资金,需要政府的非营利政策支持和非政府的社会协同组织的共同运作。从一些国家近年来的实践看(以色列的合作制企业,芬兰的电话用户股份,日本的社区组合,我国的社会集资办公益性事业),自组织的力量还相当稚嫩或不规范。但是,农业社会靠接连不断的冲突激励发展,工业社会靠对抗性竞争促进发展,在信息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也要改变,其主要动力不再是冲突和对抗,而主要依靠网络协同条件下的不断自组织力量。

面对网络时代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已开始发现。现代经济的病根恰恰在于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人们迟早会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从高营利部门转向高科技、高教育和高国民保障体系上来。世界经济改革的方向既不是加大国家资本,也不是回到私人资本中去的历史循环,而是在网络协同力量的驱动下,从国家所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转化。也就是扬弃官僚支配和营利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劳动异己的所有制基础上,“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8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4页。

网络经济与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

□ 尹艳华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 天津 300071)

[关键词] 网络经济 网络化 政府管理

[摘要] 网络经济与政策管理问题, 在国外正逐渐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关注的热点。文章探讨了网络经济如何在行政效率、政府职能输出、地方政府职能的增强、公民政治参与、国家安全、公民的个人安全等 8 个方面改变政府的管理。分析了政府面临的冲突与抉择。

[中图分类号] F0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027-04

网络经济正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技术政策主任迈克尔·尼尔森(Mike Nelson)指出:“正像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商业结构一样, 我们可以预见计算机技术和信息交流技术的发展将极大地影响政府的结构和职能。”就一般而言, 新兴的科技交流手段将使政府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得和控制能力, 从而使政府职能扩展, 可以更集权、更有效地实现其对社会的控制。历史上, 航海技术的发展使英国寻求到了更广大的海外殖民地, 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和电报系统帮助英国中央政府实现了他对其遍布世界的殖民地的有效控制。今天的政府已经可以通过自身、媒体及各种组织和商业数据收集公司获得大量的信息, 从而支持政府进行正确的决策, 对国家和公民实施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以往的政府使信息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特权, 组织层级越高, 其所拥有的信息量就越大。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给人们带来的最直接益处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 使得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更接近信息。通过网络及其它各种信息传媒, 公众更加了解政府在做什么; 一些原本只有政府可以提供的服

务, 公众也可通过其他的渠道获得; 旧有的权力平衡被打破, 这必将导致政府管理方式的巨大变化。

一、网络化将使政府人员大幅精简, 极大地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有效的政府是经济成功的基础”已经为人们所普遍认同, 然而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却不是一件易事。20 世纪 70 年代末, 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开始推行裁减政府公务员、改革文官制度、提高服务意识与行政效率的行政改革措施, 揭开了全球性新一轮行政改革运动的序幕。这里有美、英、日等发达国家, 也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等一些国际组织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998 年 3 月, 中国政府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推出了机构改革方案,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行政改革运动。行政改革如何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真正建立一个效能的政府。转变政府职能是关键, 而网络化将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良好的契机。一方面, 网络化加强了政府的信息置换功能, 新型政府可以使用各种新技术手段实现信息化管理。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传递信息、沟通信息将以更快捷、更经济的方式

进行,政府的整体行政办事效率将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信息可以在组织内部为更多的人来分享,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较低的层级就可以得到解决,以上传下达为主要工作中层管理可以大大精简,因信息传递不及时和错误所造成的内部消耗可以大大减少,行政程序进一步简化,行政效率提高。

二 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与职能转变。

行政改革向公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一些人认为:Internet(因特网)及其相关技术将极大地增强个人的力量,从而使政府无足轻重。一些抱有极端看法的人认为数字货币和电子商务会使政府对税收和经济的管制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样政府将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政府职能定位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弥补市场缺损,来自于社会 and 公众的需求。市场的缺损必须从政府中得到弥补才可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便捷、低成本的网络传输使公民和企业可以实时了解政策法规。政治经济网络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公众更容易获得信息,信息资源的共享为政府职能输出准备了条件。政府可以将社会性、公益性、自我服务性的事务性工作从政府中剥离出去,交给中介组织和事业性单位承担;将原本属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的经济职能归还给社会,政府集中精力致力于市场培育,实现公共权利。政府将是信息的中继站,公众希望政府可以更广泛地帮助个人解决问题,实时地向社会公众发布各种政策信息,提供各种政策咨询服务。

三 政府与公民的交流方式将更为直接,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将大大提高。

网络化为公民了解政府的工作提供了经济而快捷的渠道。政策的制定、决策和执行过程不再是神秘的东西,透过网络公民可以最切近地了解政府的工作进程。美国白宫网页自1994年开通以来,白宫和美国政府各部门已经有几十万份文件在这里上网,每天有上万人光

顾该站点,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中国政府的一些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也设立了面向社会公众的网页,提供各种信息和政策咨询服务。政府工作正在变得更公开、更透明。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将会有更便利的渠道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收集社会各阶层的意见,获得信息反馈。而且这些信息可以以最直接的方式获得,避免因需经过多层过滤而使信息失真情况的发生。网络的快速信息传递既使公众的信息反馈速度大大加快,也使政府对问题的回应速度大大加快。与高层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已经不再是不可及的事情,网络使公民和政府实现了没有中间环节的直接沟通,它必将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密切政民关系,从而增进社会稳定。

四 地方政府的职能将进一步加强。

网络技术使地方政府能够更容易获得国家或国家级组织提供的信息,并有效地将这些信息和地方的需求结合起来,寻求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原本需要上交中央政府方能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当地直接获得解决。资源会得到更有效的利用,政府的整体行政效能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独立性也会进一步加强,横向联系增多。中央政府更多地致力于协调和监督保障,国家立项将大为减少。

特别是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地方政府可以打破中央政府独揽对外交流合作大权的传统,直接参与对外事务。公众借助比中央政府更贴近的地方政府参与国际经贸合作,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趋势。在美国,已有40个州分别在1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66个办事机构,而且在进一步发展。这些对外事务涉及投资、教育、研究、签约和政策等多种活动,正对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愈来愈大的冲击和影响。地方政府“僭越”联邦政府的外交权力,其最主要的是能给地方带来财源和就业机会,信息技术和通讯条件的改善和全球网络化的发展显然是其重要的技术条件。

五、公民政治参与将有突破性的进展,民主政治程度进一步提高。

网络技术不仅会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还能使公民更多地参与决策过程。从公民的角度看,透过网络公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政府在做什么、在怎么做,并可以以多种方式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决策过程。可以预见,网络化的社会中,人大或议会会议将不再仅仅局限于院内,选民与代表、议员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正在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可通过网络与选民进行必要的交流。目前,美国众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有公开的网页,选民与他们之间的交流更为直接、迅速。美国以往的民意调查以电话、邮政信函为主,现在网上的民意调查已经相当普遍,并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电子空间将使权力从经理和政治代表手中转移到那些直接参与价值增值的普通劳动者和公民手中。民主政治在网络经济中不再是一种现代政体必不可少的缀饰,公民的政治参与将不仅仅限于投票,网络将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这会使政治冷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六、政府在保障国家安全上面临的新问题。

在网络经济时代,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不仅来自于有形的世界,更危险的是来自于无形的电子虚拟世界。随着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日益融合,网上信息交换、贸易、购物、娱乐甚至聊天,可以发生在任何国籍的个人或组织之间。时间和空间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电子空间,国家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恶意的网上“黑客”运用普通的个人电脑和网络技术,寻找计算机系统和信息交换系统的弱点,非法截取或篡改数字信息,破坏系统的正常运作,甚至捣毁整个系统。网络的滥用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保障国家网络和重要信息设施的安全。为此,1996年7月,美国白宫下达了关于保护重要设施的总统令。1997年10月提交了

一份关于如何保护美国信息设施的报告,探讨用多种方法保证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一方面,政府部门加强监控,并严厉打击任何破坏活动;另一方面,鼓励各行业监控自己的系统,从而提高整个信息基础结构的安全性。国家安全问题,一直是许多国家不敢轻易放宽对 EDI 限制的重要因素,没有一个良好的解决办法,这一局面改观的步伐也不会太快。

七、政府对改善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将负有更大的责任,并投入更大的力量致力于人力资源的开发。

网络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信息资源的共享,它要求的是一体化的模式。网络越大,网络各部分的运行效率和潜在功能越是加倍增长,更广泛的覆盖面和更多的参与者是网络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每个人都参与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得到更有效地运作。谁拥有先进的信息交换手段,谁就有资格成为国际贸易伙伴,而信息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或地区将被排除在网络经济之外。政府必须对不发达地区投入更大的力量,使他们具备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的信息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需政府运用它的行政力量来改善。

如果说传统经济是一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经济的话,网络经济则是倚重信息资源和金融服务业的全球化经济。在美、日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地位正在发生逆转。新技术正在改变生产过程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构成,与直接劳动相比,间接劳动的比重在不断增加。一些技能含量较少的工种正在消失,如材料装卸工等,知识工人成为劳动力需求的热点。在美国,制造业产值不断稳步增加的同时,制造业的就业却在大幅度减少,减少的绝大部分是非技术工人。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看屏幕和敲键盘的“白领”化工人将大幅度地增加。在信息网络覆盖全球、无国界经济蔓延的新条件下,资本已经越过了国界,不同国家的资本费用也在趋同,除了劳动技能外,生产过程的每

一个要素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同样存在。吸引资本进入本国市场的最富竞争力的因素,是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积累。正是由于其他一切因素都很容易地在世界各地流动,最能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是具有从事复杂劳动知识技能的劳动力。政府在增强对资本的吸引力方面除了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外,主要是大力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政府除了增加教育投入外,还可以出台各种刺激性政策措施,吸引高技术企业和科研开发机构进入本国投资,鼓励企业增加对工人的技术培训。政府可以给这类企业一定的补贴和税收上的优惠,这一做法看起来代价很高,国家会损失大量的财政收入,但是国家所获得的报偿将是日益强大的人力资本,和国家持久的竞争力。资本可以随意流动,但受到良好训练、具有较高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仍会继续留在投资国,成为良好的投资条件。

八、新的冲突与政府的抉择。

1. 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民族工业发展的冲突。电子商务的发展要求对电子商务的征税管辖权做出明确的规定,以避免双重或多重征税。美国在《全球电子商务纲要》中号召各国政府尽可能地鼓励和帮助企业发展 Internet 的商业应用。建议将 Internet 宣布为免税区,凡无形商品(如电子出版物、软件、网上服务等)经由网络进行交易的,无论是跨国贸易或是在美国内部的跨州交易,均应一律免税,对有形商品的网上交易,其赋税应按照规定办理。零关税对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保护民族幼稚工业的最有效的手段——关

税保护屏障将完全消失。电子商务的巨大商机与民族工业发展的冲突如何解决,政府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如果我们既不想丢弃这个发展机遇,又想保护民族工业的话,我们的选择应是给予政策的大力支持,积极推动本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2. 个人隐私自由、商业安全交易保护与国家公共安全管理之间的冲突。网络经济使人们更加关注公民隐私权和企业的商业秘密问题。政府是否值得信任,政府机构将有权力滥用的可能,而且权力滥用的问题在现实中是经常发生的。这是一个涉及公民的隐私权和公民自由的政治问题。政府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这两者间找到一种平衡,使我们既不侵害公民的隐私权和企业的商业秘密,又能维护正当的商业和社会秩序。

3. 本国政治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数码化或称数字化,意味着把任何形式的信息——文字、音响、图像——转化为二进制的数字语言,可以从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以光的速度无限量地向另一个地方传输。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已经不复存在,信息网络、卫星电视等传输的信息正穿透各国的边界,使传统的信息检查制度变得苍白无力。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政府将无法限制本国公民接受外来的思想和文化。网络化使文化交流变得更方便、更深刻、更广泛,而各国政治传统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将会引起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混乱。政府要采取适宜的措施,达到既保持本国文化的主流地位又不妨碍日益加深的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

责任编辑:谭湛明

解放思想是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自序(第一、三部分)摘要

□ 高齐云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 解放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动力 科学批判 多样化形态

[摘要] 作者认为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必须解放思想, 恢复哲学应有的批判的功能, 打破教条主义的僵化体系, 揭示马克思主义体系多样化发展形态, 只有这样, 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031-11

一、清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式与神圣化的曲解, 恢复、发扬其科学的、批判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本质上是和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期, 就明确地提出: “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①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 当他们创立的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指导地位时, 他们更反复地强调不能把他们的理论当做“现成的公式”^②和“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③而应当看做是“研究历史的指南”、“行动的指南”。^④

但是, 虽经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复的批评、阐述,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现象并不可能完全绝迹。因为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认识现象, 同时更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 既有悠久的历史因素的影响, 更有深刻的现实条件的作用。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国家政权后, 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占统

治地位和具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如果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物处理不当, 就会产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倾向, 甚至使教条化恶性膨胀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来, 在斯大林执掌苏联领导大权前后,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倾向又突出起来, 并且进一步推向神圣化。对此, 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某些相关的活动来看。当然, 斯大林在领导建设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捍卫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上建立了历史的功绩, 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在理论上武装干部等方面发挥了历史的作用, 这些都是不应否定的。但是, 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条化、神圣化的始作俑者的错误, 也必须给予应有的批评。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 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

公式,使哲学与政治混同起来。《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在论说某个哲学观点后,往往直接地简单地引出一个政治结论,并把它公式化。例如,在论说世界的不断运动、发展后,即引出结论:“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⑥这一政治公式把“向前看”与“向后看”绝对地对立起来,本身就是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典型。与此相类似的公式,《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还提出了许多条。这样从哲学观点直接引出政治公式,就把哲学与政治简单化地等同起来。其实,早在1930年12月批判德波林时,斯大林就亲自肯定德波林在哲学上的错误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把哲学问题和政治错误完全混为一谈。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这种“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的公式,实际上发挥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变成教条,另一方面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推向盲目信仰。斯大林这样做的原因,不仅在于他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甚低,又不能向水平高于他的人学习;更主要的在于他要维护对领导大权的控制,树立个人权威;用他的报告中的话来说,则是要巩固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权。但是这样做,既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又造成了政治上的许多错误。斯大林在领导工作中的许多错误,就是与这类两极绝对对立的公式以及渗透在其中的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的。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的另一“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把阐释、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最高领袖垄断的专

利。他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写道:“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逝世后,最伟大的理论家列宁,以及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是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⑦这段文章在逻辑上前后矛盾,在内容上陷入绝对化的错误。这段文章的前半部分认为,列宁继恩格斯之后,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继列宁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后半部分则肯定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唯一”的。按照文章前半部分的说法,后面的“唯一”既不能成立也不应使用。按照文章后半部分的“唯一”的规定,前面的“列宁的其他学生”就应排除在外,显然,这才是“结束语”作者突出“唯一”的真意所在。按照作者的认识与思路,恩格斯是在马克思之后,列宁是在恩格斯之后,斯大林是在列宁之后,“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单线嫡传”的“理论”,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的重要“依据”。因为按照这个“理论”,各个时期党的最高领袖是“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者,所以应高于广大干部群众而被当作神圣崇拜,相应地被“唯一”者“推进了”的理论,就成为只能盲目地信仰、奉行的神圣教条。是否这样做,也就成为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不能不指出,斯大林的“创造”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重大的影响,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被“向前推进了”。诸如,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作为人民的“大救星”或“慈父”,宣扬他们的话“句句是真理”、“永远的普遍真理”,鼓吹对

他们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这种观点虽然有时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名词,但是表现的同宗教教徒对他们的神和教义的盲目信仰、狂热崇拜一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相反。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中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并且是这种观点、方法的最集中和最突出的表现。这种以个人崇拜为特征的现代教条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批判的本质的肆意践踏和完全否定。要消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的曲解,就必须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的批判的精神和本质。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的批判的本质,作为创始人的马克思有过深入的阐述。在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他就明确地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⑧在创立之后的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期,他又深刻地阐明,“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⑨马克思的论述,为科学地理解、掌握唯物主义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本质,提供了原则性的说明。

首先,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根本内容不是颠倒是非、无限上纲、否定一切,而是通过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

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其次,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对象,一方面这种批判既指向旧世界,其中重点是指向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批判。马克思说,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指向“每一种既成的形式”。所谓“每一种既成的形式”,既包括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又包括每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应该采取自我批判的态度。但是,现代个人迷信式的教条主义阉割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它认为,不能对革命领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因为革命领袖“洞察一切”,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已经达到真理的“顶峰”。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体现绝对真理的“天堂”,等等。把批判锋芒指向这些,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就是反动。这种认识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质完全相反的。恩格斯认为,思维是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统一,“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⑩至于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不仅不能“洞察一切”,不能达到真理的“顶峰”,而且他的认识中需要改善的东西比不需要改善的东西还要多。所以,列宁指出,“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⑪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采取科学的批判的态度。至于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绝对真理的最终

体现,不是尽善尽美的。在那时,人类社会仍然必须通过科学的批判,才能继续得到发展。

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它“不崇拜任何东西”。^⑫对这种批判的精神,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予以彻底的贯彻。他们从不害怕自我批判,也不否认自己的思想、理论中包含不确切以至错误的因素。他们对于自己的思想、理论,都重视在肯定的同时,揭露其中否定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期,就注意不断清理自己所受旧哲学的影响。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后,也注意揭露、纠正他们思想认识上的不足以至错误。由于贯彻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精神,一方面批判反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实行自我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被创立后,才能继续得到完善、发展。列宁对待自身和布尔什维克党,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他指出:“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一次又一次改正这些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⑬如果一种政治错误是对群众有影响的整个政党所犯的 error,老实地承认这种错误,对许多人会有极大的政治上的好处。”^⑭列宁是这样明确地说的,并且是这样坚决地做的。列宁及其领导的党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设想依靠行政命令和强制的计划监督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后来,列宁认识到这种错误。他说:“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⑮于是,列宁决定在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采用间接过渡的方法,以建设

社会主义。到了晚年,列宁还坦率地指出,“我们转入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火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而在于我们完全忘记了合作制”。^⑯列宁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⑰可惜,列宁之后的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口头上虽然常说自我批评,实际上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对于自己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错误,不敢公开承认和彻底纠正。例如,斯大林认为,苏联1936年通过的新宪法表明,苏联已进入“逐渐过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⑱他在1937年还宣称,苏联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⑲这些观点脱离客观实际,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产物。但是,对于前一错误,斯大林至死都未作过修正。对于后一错误,斯大林在1952年采用批评他人的方式,羞羞答答指出:“‘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⑳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变相提倡、鼓励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损害以至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流弊所及,使有的理论工作者竟然认为,领袖人物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并不属于他的思想。那么,这些错误属于谁的思想呢?这在客观上不能不说是宣传领袖人物“洞察一切”的个人迷信和现代教条主义。由此可见,是否承认,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批判精神,这是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还是实行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原则问题。

再次,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方

式的多样性。对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不同方式、特点,马克思、恩格斯作过许多具体的分析和深刻的论述,需要我们对系统的研究和科学的概括。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在这里,马克思把对旧世界的批判,区分为武器的批判和理论的批判、物质的批判和精神的批判。在各类批判中,他们还依据不同的对象,突出不同的特点。例如依据黑格尔法哲学的内容,突出对它的政治批判。对于作为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的《精神现象学》,马克思主要不是政治上批判,而是着重剖析它的思辨的唯心主义,并对其中辩证法的因素与唯物史观的萌芽给予了肯定。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也坚持、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批判的精神和本质。特别在从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出发,进行有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批判方面,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例如,他在晚年写的对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评论,无不充满了科学的批判精神。后来,某些人在运用批判的武器时,往往陷入主观唯意志论,一方面,对他人,颠倒敌我,混淆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任意夸大,无限上纲;另一方面,对自己,或者不作自我批判,或者轻描淡写,完全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批判的精神。阉割、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批判的精神和本质,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可见,要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恢复、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批判的精神和本质。

二 打破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封闭的、僵化的体系,如实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发展的多样化形态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编写、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不仅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内容,着重于一般哲学理论的阐述;而且不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的体系特点,编造出一个“板块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些教科书认为,这个体系一般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加上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四小块组成,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到斯大林到毛泽东等人的哲学都是这样一个体系。在80年代之前,这个看法流传很广,影响极大,普遍地被奉为正宗。凡是不符合这个体系结构的哲学思想,一概被斥之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扭曲成为一个封闭的僵化的哲学体系。对于这个方面的问题,人们在长时期内缺乏明确的认识。到70年代,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要真正掌握、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破除这类教科书、教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与体系的扭曲。现在,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这类教科书、教材存在缺陷,但是,有的学者仍然把它们宣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来源于恩格斯、列宁。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揭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封闭、僵化的错误,我们必须就有关的论点作一些澄清。

第一,把这个封闭、僵化的体系说成来自恩格斯、列宁,这是缺乏足够根据的。哲学的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下又包括若干子系统。哲学的思想内容通过内在的有机的联系,组成思想的体系。哲学思想包括若干观点、观念,它们有机地组成哲学的观点体系。哲学思想、观念赖以存在、表现的概念、范畴,通过内在的有机的联系,组成逻辑的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重点在思想内容、观点观念的阐述,而不是追求体系的结构,因此对体系问题没有专门的论述。但是,他们在关于哲学观点、范畴的阐述中,又包含有某些体系结构的思想。从这些有关的思想看来,他们既没有提出、也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更没有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者并列的概念。从整体概念的使用来看,马克思把他们创立的新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我的辩证法”;恩格斯则称之为“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后来的“两大块”和“四小块”的体系来自恩格斯,这至少是对恩格斯有关思想的误解。至于认为这个体系来自列宁,同样是对列宁有关思想的误解。不错,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但却不是二者连接一起、并列使用的。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一系列的概念,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前者属下的子概念。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二版序言》中明确地说:“尽管这是一本和俄国‘马赫主义者’进行论战的著作,可是我希望,它作为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介绍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中所得出的哲学结论的参考书,将有所裨益。”^②在这里,必须澄清对列宁的一段话的误解。不少人由于误解了列宁的这段话,从而作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的错误结论。列宁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③这段话是对马克思发展人类哲学思想新贡献的论述,列

宁认为马克思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传统的唯物主义,用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认识自然界,并且把这些原则扩展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从而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显然,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必须区分清楚。一方面,列宁这里说的是马克思扩展唯物主义认识的范围,而不是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过程;另一方面,列宁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 and 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二者相对应,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者相对应。所以,完全不能说列宁的这段话里包含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者并列的意思。然而,斯大林却说:辩证唯物主义“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⑤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斯大林把辩证唯物主义当做只是关于自然界的看法、了解、认识、解释、方法、理论(这里且不说他把方法与理论彻底分割开来的错误),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推广、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去研究社会历史。这是对列宁的话的曲解,因而得出了与列宁的思想根本不同的、也是完全错误的结论。由此可见,“两大块”的并列结构是曲解列宁的有关思想的产物,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思维的“创造”。

第二,造成这个封闭、僵化的体系及其深远影响,根源在于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和哲学理论问题政治化。在20世纪20~30年代出版的上述教材、教科书,

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在体系上还未全部定型为“两大块”和“四小块”。但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由于“大清洗”加强了的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和把一切理论问题政治化的严重影响,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捧成为高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的经典。因而,以其为典范去改编、新编哲学教材、教科书,逐步形成了“两大块”和“四小块”的体系。同时,由于这些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和一切理论问题政治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被曲解成“单线嫡传”,其他一切被拒之门外,实行自我封闭。就联共党内的情况看来,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列宁逝世后的党内斗争中不断受到打击,并于“大清洗”中被杀害,他的理论自然被完全否定。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因为曾经转向过孟什维克,他的“象形文字论”又受到过列宁的批评,他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就长期被束之高阁。对外国兄弟党的哲学家,联共(以及后来的苏共)只要感到稍不如意,就横加批判,任意否定。匈牙利的卢卡奇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思想,在20年代就被指斥为“修正主义”,60~70年代波兰的沙夫哲学和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也都被批判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在对马克思思想和实际情况的研究中,新问题、新观点的提出都被扼杀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家,则斥之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帝国主义代言人,一概加以否定。甚至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自然科学新成就,如遗传学说、相对论等,也被扣上莫名其妙的“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帽子,加以否定。面对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和不断变化的人民要求,上述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

不研究社会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又不批判地吸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反映的新问题和研究的新成果;或者只是用过时的公式、不变的教条去曲解新情况、新成就,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扭曲现实和认识错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日益封闭、日益僵化。

上面说过,“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要打破封闭、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就必须使各个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己所处的时代、国家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其实,只要解放思想,冲破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和封闭、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束缚,实事求是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就可以发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力求探索、解答自己所处时代和国家提出的历史课题,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演变,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和理论课题;在不同国家的演变,受各个国家特殊的经济、政治条件和思想、文化传统的制约;通过不同载体而实现的演变,还受到不同个人的哲学、文化教养的影响。这种种特殊性的存在和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形态。为此,在理论上必须科学地理解一般哲学基本问题和个别哲学基本问题的联系与区别。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说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⑥这是恩格斯研究人类哲学发展的历史,从众多的个别哲学探讨的具体哲学问题中,总结出来的全部哲学共同具有的一般哲学基本问题。它反映、代表了个别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的本质,但

是并没有包括所有个别哲学各自研究的主要问题。正如恩格斯在该书中同时指出的,远古时代、中世纪、欧洲近代的哲学思维所探讨的主要哲学问题,都是有所不同的。恩格斯批评说:“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②7}所以,必须掌握一般哲学基本问题,才能了解个别哲学之间的联系和共同本质;必须研究个别哲学的基本问题,才能把握各个哲学之间的区别和特殊本质。只强调一般哲学基本问题,不研究个别哲学基本问题,就会把一般哲学及其个别表现形式或各个具体哲学混为一谈。因此,在实际上必须客观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发展。

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就开始了多样性的发展。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的深化、扩展、完善;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向不同的团体、阶层、国家、地域的传播;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因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或遇到挑战而作出的新阐释、新回答。这些演变中,既有质的跃进,又有量的增长,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作用。19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俄国,并且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的讨论。俄国《祖国纪事》杂志1877年10月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了挑战。当时,马克思写作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予以反驳。由于某些原因,此信当时没有寄出。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作为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桥梁的俄国发生的

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开始从世界的西方迈向世界的东方。这个量的扩张,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其重要的质的跃进。因为世界的西方与世界的东方,不仅是自然地理概念,不仅存在地域上的区别,而且是社会关系概念,存在着社会经济、政治及相关制度上的差异。简要地说,当时的西方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世界或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当时的东方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世界,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以至非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也出现了新变化。当时,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西方国家进入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而在世界的东方,如俄国、中国、印度等国家,则兴起了蓬勃的革命运动。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些国家能否发挥作用或者如何才能发挥作用,就成为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新问题。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着重集中精力研究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的问题。1881年1月间,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请他对俄国正在争论的、关于“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②8}发表意见。马克思对此十分重视和极其慎重,为复信而撰写了四稿,因为这是关系如何正确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落后国家如何应用与发展的重大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②9}马克思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

理论”。^⑩至于哪些国家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阶段,这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马克思通过对俄国农村农业公社所处的内外社会历史条件与发展前景的分析,认为只有在若干特定条件共同作用下,俄国农业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⑪马克思上述细致而深入的分析、阐述,第一次探讨了东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同时,它表明,因为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本身具有各自的特殊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的应用、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态多样化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因此,人们不能盲目地把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等同起来,而应清醒地把它们区别开来,从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出发,去应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才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

主要由于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情况的特殊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应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次生形态中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各有特色的两大形态。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于工人起义失败之后的革命低潮时期;面临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对工人阶级既压迫又渗透的双重关系,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有待重新启蒙;主要探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规律性,着重解决在资本主义制度较完备较稳固而工人起义暂时不会发生的条件下如何唤醒、组织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早期东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于俄国革命酝酿、兴起、胜利的过程中;面临的是落后的经济、政

治、思想、文化和工农群众的尖锐对立,群众的大多数生活于贫困、动荡之中,他们的革命意识较易引发;主要探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规律性,着重解决在缺乏民主的条件下如何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如此众多的差别,也必然会反映到哲学问题的研究与这些观点的形成上。这两大形态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匈牙利的卢卡奇和俄国的列宁。主要由于上述重要条件的不同,造成了他们在哲学形态上的差异。卢卡奇要探讨社会大致正常发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统治及其给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造成的制约,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实践及其给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前景。因此,他着重研究的哲学课题是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的辩证关系中的主体能动性问题,主要阐述的哲学理论是历史的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概括起来,可以说卢卡奇哲学思想形态是,以主体能动性为核心,以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为中心内容的社会总体辩证法(社会存在本体论)。列宁要探讨落后国家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这些特殊性对应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准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具体制约。因此,他着重的哲学课题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主要阐述的哲学理论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认识的辩证法)。概括起来,可以说列宁的哲学思想形态是,以对立统一学说为核心,以认识论、辩证法、逻辑三者同一为中心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次生形态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还有德国的柯尔施、意大利的葛兰西等;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次生形态中的东方马

克思主义的,还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在哲学思想上,他们也有着各具自身特色的具体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次生形态之后,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再次生形态。它们是分别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次生形态中某个具体形态,作为直接的、主要的思想、理论来源而产生、形成的。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系统中,俄国的斯大林哲学思想是以列宁哲学思想为直接的和主要的理论来源的。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自称是为评价“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出现对我党的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而写的。虽然,正如上述,他在哲学体系问题上曲解了列宁的思想,但这并不能否定它以列宁哲学思想作为其直接的和主要的理论来源。中国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以列宁哲学思想作为直接的、主要的思想理论来源,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而产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次生形态的另一个具体形态。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③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③③}毛泽东科学地理解、掌握了列宁哲学思想的精髓,并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发展了列宁哲学思想。列宁认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③④}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③⑤}这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的基本观点,是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支柱。毛泽东处于比俄国具有更大更多特殊性的中国,他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过程中,主要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先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着重探究的理论课题是理论与实际、普遍与特殊在实践中的辩证关系。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正是以列宁的上述观点和相关思想为基本依据,同时吸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对上述历史任务与基本课题展开了系统、深刻的研究、论述。在这方面,人们对其新内容新观点的阐述已经很多,我们不再在此重复。我们只想在总体上说明一点,即毛泽东依据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认识,肯定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理论又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从这样的新视角去展开阐述,才能从根本上对有关的哲学理论进行新的论述,从而创立了以实践理论为基础、以对立统一理论为核心、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能动的革命的认识论,使毛泽东哲学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次生形态中的一个光辉的具体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至于西方社会中,卢卡奇、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次生形态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呈现出极为复杂、多样的情况。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公开出版,西方学者掀起了研究马克思思想的热潮,不少学者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西方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和学者个人思想文化方面的广泛开放性,这些学者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既有来自马克思哲学的因素,也有来自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因素,其中有的学者、学派的哲学思想还有源自卢卡奇、葛兰西哲学的因素。并且在这些西方学者的不同时期、不同著作中,来自上述各方面因素影响的有无、多少、大小、深浅又有所不同。因此,对这些学者、学派的哲学思想的考察,必

须着眼于根本性质、总体倾向,而不能只从枝节考虑。从根本性质看来,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批判、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拥护、支持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立场;在总体倾向上,则着重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着重于作为主体的人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着重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因此,从主流看来,这些学者、学派哲学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发展的再次生形态。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中,前期的哈贝马斯和施密特、40年代初至50年代初的阿尔都塞,可以算作属于这一类型。在当代,世界的东方与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出现了各有特点的新变化,由此形成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邓小平理论就是当代东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具体形态。上述简要的评析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在东方或西方的演变,都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的发展,看做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演变的多样化形态,全盘加以否定,都是违背客观实际的。

①⑧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

416、416、460页。

②③④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2、460、472、456、219、223—224页。

⑧⑦⑩⑫⑬《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1、618、577、424、424页。

⑭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218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6页。

⑰⑱⑲⑳㉑《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15、443、142页。

㉒⑳㉓㉔《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602、571、682、684页。

㉕《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8页。

㉖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第1版,第381、140页。

㉘㉙㉚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37、430、130、438页。

㉜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㉞《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0页。

责任编辑:何蔚荣

新的方法 新的思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评介

□ 郑 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 广州 510070)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3-0042-02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高齐云先生的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书分四编,共46万字。该书以新唯物主义产生、检证、完善的历史发展为经线,以新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逻辑体系的理论结构为纬线,深刻细致地揭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并提出、阐述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提供了新的方法,开拓了新的思路。

该书是同类著作中最优秀的一部。

第一,清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式和神圣化的曲解,恢复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批判的本质。以前,人们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把苏联学者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当作唯一正确的教材,尽管1956年我国也编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完全是苏联那一套理论的翻版,久而久之,使人们认为只有那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对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神圣化和教条化。对此,作者认为,要清除人们头脑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神圣化的曲解,就必须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批

判精神和实质。其科学的批判精神和实质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同时,这批判也是一种自我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只有在不断地批判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实行自我批判,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

第二,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于哲学通论的偏向,揭示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内容。以往,人们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更多的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不外乎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作者认为,这种通论有偏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其自身独特内容的。作者通过对马、恩早期著作特别是对《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中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哲学的核心和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有的内容。我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中心内容,去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论述、撰写,才能克服把马克思主义哲

学变成哲学通论的偏向,才能牢牢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

第三,打破被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封闭的、僵化的体系,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发展的多样化形态。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一般的教科书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加上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四小块所组成,凡是不符合这个体系结构的哲学思想,一概被斥之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扭曲成为一个封闭的、僵化的哲学体系。作者认为,造成这个局面,其根源主要在于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和哲学理论问题政治化。其表现在:既不研究社会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又不批判地吸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所反映的新问题和研究新成果,只是用现成的公式去套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封闭、僵化。作者认为,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使各个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己所处时代的国家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演变,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和理论课题;在不同国家的演变,受各个国家特殊的经济、政治条件和思想、文化传统的制约;通过不同载体而实现的演变,还受到不同个人的哲学、文化教育的影响。这种种特殊性的存在和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就开始了多样性的发展。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深化、扩展、完善;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的团体、阶层、国家、地域中传播;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中对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

战作出新的阐释、新的回答。因此,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

第四,纠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为领袖言论和现行政策作论证的做法,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先导和为人们思想导向的作用。在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领袖言论和现行政策作论证,而不是首先发挥其时代先导的作用。这样就很容易制造出一个虚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容易让人们认为某个领袖的观点或某一个领导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其后果就是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要克服这种状况,作者认为,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先导和为人们思想导向的作用。就是要密切注视时代发展的新情况,及时研究时代提出的新问题,科学地揭示问题解决的方向与途径,为时代的发展做好思想准备和提供理论指导。

综合全书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不仅具备了很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功底,还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在全书中自始至终都在呼吁人们在学习、引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定要解放思想,克服现代个人迷信与现代教条主义的影响;要着力于理论结合实践。只有这样,才能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才真正掌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内容。该书的出版,既对刚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中青年学者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又开阔了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路,深化了认识。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作出了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何蔚荣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 邹永图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10)

[关键词] 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两重性

[摘要] “全球化”是社会发 展自然历史过程的一种现象。“经济全球化”具有两重性。资本主义提倡的全球化实质是世界的资本主义化, 而社会主义提倡的全球化最终是人类的解放和实现世界的共产主义。我们正在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应当提高自觉性。

[中图分类号] B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2000) 03- 0044- 05

历史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全球化”差不多成了世界各国的政要、学术界、舆论界的常用词汇并从中引出各种不同的见解和结论。其中, 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全球化”进程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关联。本文就有关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和基本观点, 作粗浅的探讨, 属求教之作。

一、“全球化”是日益成为现实的客观社会历史进程, 是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一种现象形态

从人们的共识可知, “全球化”首先指的是经济全球化, 属于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因此, 探讨“全球化”问题, 在总体上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寻求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和指导思想。

首先, 按照严格的历史主义原则, 可以明显看到, “全球化”与任何社会现象一样, 有萌芽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 决不是天上掉下的瞬间产物。有的外国学者形象地指出: 全球化本身并不

新鲜, 自从人类在原始时代走出深山密林里的洞穴, 朝着遥远的世界迁居时起, 全球化就开始了。可以说全球化是从物资的流动开始并随贸易的超越国界而自发地形成的。然而, 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有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转换, 也就是盲目性在减少而有意识有目的行为大大加强了。因此, 成为当今世界热门话题的“全球化”获得崭新含义。新在何处? 新在它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发展契机, 另一方面又给世界造就了新的矛盾和新的困境, 形成了两刃相割的局面。对此, 有不同的态度以对立之: 有的肯定; 有的否定; 有的怀疑; 有的视为机遇; 有的当作挑战; 有的积极参与; 有的消极抵制, 等等。究竟对“全球化”应当如何对应, 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和观念问题。按照历史唯物论观点, 可看出“全球化”是由经济因素在世界范围的流动开始形成的客观过程, 是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以至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组合, 并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因此, 可以说, “全球化”是一种不

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之自然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具有典型意义的“全球化”浪潮有二次:第一次全球化是以工业经济全球化为标志,可以追溯到18世纪蒸汽机和电力带来的运输革命,为人类和物资跨国和跨洲的流动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得益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观念的流行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传播,导致西方工业国降低关税促进跨国贸易,而二战后不久却产生了关贸总协定又逐步降低了关税,促进了世界贸易。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是从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它从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通讯革命获得推动,又得益于苏、东剧变加入了市场经济行列,流进了国际资本,加强了进出口贸易。

“全球化”的进程在当代具有普遍与加速的特点,并逐步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的全球性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包括了生产经营的全球化,跨国公司为其主体。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已有4.5万个左右的跨国母公司和28万个子公司或企业。它们掌握了世界1/3的生产和2/3的世界贸易,形成了统一的国际生产体系。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由1970年有400亿美元上推到1997年的4000亿美元,达10倍之多,全球贸易额和资本流动量都是以指数级增长。经济全球化又表现为金融全球化,1993年国际融资总额为2750亿美元,到1997年后则增至75854亿美元;目前实现经常帐户交易货币可兑换的成员国137个。近年来由在南亚金融危机波及日、俄、拉美、非洲,使全球金融市场陷于混乱,这是金融全球化的反面表现。二是科技与信息的全球化。由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新的信

息技术,大大地缩小了自然的分割的国家时空限制,互联网与电子信息为地球每个角落的人们提供了更快、更多的交往机会。据说,一个人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同3000万人免费地进行对话。三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化与市场全球化。世界上一切非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无例外地运用市场经济体制,苏东解体后也由计划经济变为此种体制,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逐步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这些共同点:由市场调配生产要素、运用国际资本、鼓动国际贸易。1994年关贸总协定标志了贸易自由化,1996年又基本实现了投资自由化,1997年在世贸组织主持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市场全球化的协议。可以说,从货物、服务等均极有利形成世界性的贸易自由化和全球统一的大市场。

以上说明,“全球化”确定是一个具有物质运动内容的客观存在的自然历史过程,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当然不能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外。事实上,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实行对外开放和现代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个“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种“参与”由自发变为自觉,推进同社会主义并行不悖的“全球化”,抵制以“世界资本主义化”为目标的“全球化”。

二、“全球化”具有内在的两重性,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克服盲目性和提高自觉性,才能真正抓住机遇和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对“全球化”进程的客观分析,可以看到:“全球化”不仅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和潮流,而且已经成了无可争辩的客观存在的现实,几乎世界各

国都在不同程序上参与了“全球化”进程。为了提高我们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自觉性和克服盲目性,首先必须认清“全球化”的原生本质。众所周知,“全球化”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率先倡导和至今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系统工程和世界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人们争取奋斗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从根本上而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推行“全球化”,是其利益所在,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的。资本的产生和存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线,而资本的扩张及其对利润的无限冲动和追求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发展的推动力。所以,马克思早就指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①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过程有力地说明了“全球化”有利于资本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这一原生本质。因为:第一,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看,“全球化”的大量资本输出和扩张,有利于满足资本主义内在要求和动力——追求利润的欲望;第二,“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而言,极为有利于其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部门间的平衡;最后,从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的基本矛盾来看,“全球化”显然有利于矛盾的缓和,“合法地”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他国(特别是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从东南亚开始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如此。

然而,“全球化”的原生本质与再生本质是统一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是“全球化”具有的内在两重性的主要表现。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迄今为止的“全球化”的主导者,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则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对前者有利,对后者也有益。就我国而言,可以看到并非巧合的事实:我国对外开放并取得显著成

绩的 20 年,恰恰是全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 20 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世界性的资金、人员、贸易、金融、科技在各国流动,特别是自由、规范的流动,对各种类型的国家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我国而言,“全球化”是一种机遇,不可放过而要抓住。我们不应持狭隘的眼光看待“全球化”和它的原生本质。应当客观地看,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②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为社会形态的更新准备了物质条件。如前所述,“全球化”的第一个浪潮是由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开始的,而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及其伟大的历史作用。他指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由此可以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对以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通讯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作出更高的评价,看到它在全球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世界各国走共同文明大道的作用,坚定我们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决心,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我们揭示“全球化”本质的两重性之后,还应进一步看到“全球化”在另一层面上的两重性。这就是“全球化”对于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和整个第三世界各国而言,确实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如果说,“全球化”的上述进步作用是一种机遇和益处的话,那么,“全球化”同时

带来了风险和消极影响,这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全球化”内在的两重性。首先,以跨国公司的生产、世界市场和自由贸易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来看,不禁使人想起马克思当年对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的“重大的变化”所作的分析,他认为富国依据国际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时就剥削了穷国,富国与穷国交换虽然“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③当今“全球化”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是铁的事实。正如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于1998年亚罗会议指出的,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工业化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他们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跨国公司的主体,世界500强中,1990年美、欧、日占405家;到了1997年,西方经济则占了99%。“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地削弱了本国政府的管理经济职能。还有资料表明,当今西方以占20%的人口消费着全世界的80%资源,而把破坏生态的影响留给第三世界;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270万人中,第三世界占90%。截止于1998年11月,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约50%以上经济化为乌有,而美国则发了横财,有7000多亿美元转入它的腰包。连美国的一位学者也说:“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是由美国以及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门徒们的极端自由市场准则造成的”。“全球化”中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自身利益为前提制订的。在西方国家主导下,非洲的私有化浪潮使6000多家国营企业近半数转入私人,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却大多落入西方之手。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

大多落入黑党和外国公司手中,使60%居民处于贫困线边缘,又使在1991—1996年中的资金达3000亿美元流入西方银行。1998年7月,西方一次性地全面收购了巴西的电信产业;阿根廷80%以上国有企业被西方资本收购,外债高达1200亿美元。与此形为对照,美国却富起来,仅美国比尔·盖茨一个人的财产净值达51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乌克兰5000万人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520亿美元)。许多资料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热衷和追求的“全球化”,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实现其经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最终使世界各国“一体化”为资本主义。对此,应当有足够的警惕。“全球化”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便利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全球化”扩大了南北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全球化”使南南合作面临严重的挑战。这些都是“全球化”带来的严酷现实,许多弱国、小国为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在“全球化”中的竞争能力,往往以地理、文化等等共同因素进行了区域国家的联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至90年代,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地区性的经济组织,形成经济集团化。于是在世界上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地区化并存的现象,两者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这至少说明“全球化”不是单一化,也并非资本主义一体化。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将存在多元化的“全球化”形态,至少存在资本主义形态与社会主义形态这二种基本形态。

三、“全球化”是充满社会矛盾的过程,不管历史如何曲折,决不能改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世界终将在共产主义形态中实现大同。

在估量“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深远影响时,应当坚持经济是基础而政治则

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马列主义观点,事实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变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推行政治霸权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美国霸权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它向全球推行以它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经济模式、法则和协议,凭借资本、技术的优势实施世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加剧了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它实行的政治霸权主义就是侵略战争,科索沃危机就是典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在推行霸权主义的单极化,千方百计地阻挠世界多极化进程,北约东扩与东欧西归是西方霸权战略的第一步,而压挤俄罗斯是第二步,最后的矛头是指向社会主义的中国。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足以暴露其真面目。由此可见,由经济全球化到霸权主义,说明以西方大国所主导的“全球化”,目的在于实现世界的资本主义化,把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从地球上消除掉。这既加剧了“全球化”进程的矛盾,又为当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增加了困难和曲折,对此应有足够的估计和准备。

然而,上述情况,并不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不能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正如不能否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一样。历史终将证明,经济全球化愈发展,就为实现世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更为充分的物质条件。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二次大战后又普遍采取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资本主义在当代产生了不少新特点,尤其是资本主义市场总体有着更为成熟的形态,包

括:资本国际化的全面发展;生产资本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商品资本国际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货币资本国际发展和国际信贷的发展,跨国公司和资本国际化的发展,等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现代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全球化的发展,各国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使之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也无法解决“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目的发生的冲突”(马克思语)。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这仍然适用于今天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分析。这是因为,“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文明和进步,使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带到了世界各地,既不断造就了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扩大了资本主义挖墓人的队伍,资本主义私有制终将转变为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也将从国家范畴的社会主义转变为社会范畴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真正的大同世界。这也就是“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必然联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7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401—402页。

责任编辑:何蔚荣

新世纪社会主义辩证法反思

□ 张江明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教授, 广东 广州 510050)

[关键词] 社会主义辩证法 反思 创新

[摘要] 本文认为, 随着新世纪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会出现一些新特点, 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概括, 主题是“创新”,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 也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灵魂。

[中图分类号] B0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049-03

21 世纪是个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世纪, 是个世界经济一体化滚滚向前, 知识经济一步步光临的世纪, 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关系出现新格局的世纪。世界的矛盾、磨擦、斗争、对抗虽然很复杂, 但在斗争中求妥协, 在竞争中求合作, 避免全面对抗, 仍然是当前各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逆转, 通过社会主义的新途径, 全人类解放的曙光将会在 21 世纪显露出来。

近 10 多年来, 在中国和广东出现以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矛盾、结构、协调、变革、发展和运动的辩证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辩证法已经召开 14 次全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研讨会, 遍及 10 个省市, 出版了一大批社会主义辩证法著作。广东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中心之一。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辩证法著作由广东学者撰写, 中国第一次社会主义辩证法研讨会在广东召开, 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由广东学者任会长, 并挂靠于广东。

所以, 在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方面, 广东要共同努力做好和担负更多更重的任务。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 对社会主义辩证法提出新的要求, 要有新的思路来认识社会主义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要有创新精神开展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

一、历史命运的血肉相连

社会主义辩证法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而发展, 也随着社会主义遭受挫折和处于低潮而出现困难。它是同社会主义共命运和血肉相连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前途, 社会主义辩证法这门学科不再存在, 这是不对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不是社会主义失败, 而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模式的失败, 是贪污腐败侵蚀入党和政府肌体, 造成党的异化的结果, 也是违背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结果。今天最重要的是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从辩证法的理论和实践结合

上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怎样是一个“经常改革的社会”(恩格斯语),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符合辩证发展的有理论、有对策、可供咨询的研究成果。这样,把社会主义辩证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血肉相连起来,就会大有前途,就会发挥重要作用的。

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来看,无论如何曲折和艰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不会改变,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以来,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的矛盾关系,出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新方法和新途径。它们既有根本对立的一面,又有共处、共存、合作、互利、互补和共同性、全球性问题,需要共同来解决,彼此寻求利益的汇合点。世界经济发展的集团化、区域化、一体化和知识经济到来,既有利于资本主义,又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预示着 21 世纪的革命和 20 世纪着重于武装夺取政权不同。一般上它不采取外部的冲突的突变形式,而是通过较长时间的逐渐的部分质变即渐进性的质变来实现。美国著名学者华伦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到了它生命的秋天”,预言新世纪 50 年代后期,会有新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是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通过议会内还是议会外,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依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而定。革命人民正在寻找和总会找到 20 世纪未曾出现过的新的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总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到来,要求以哲学理论创新作前导,加强

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和创新。展望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辩证法,是有着美好前景的。

二、“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也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灵魂

社会主义辩证法是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书本可以照抄。它是靠创新而存在和发展,通过创新来开辟道路的。“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江泽民语),也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灵魂。在新的世纪,更要重视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创新,充分发挥创新的作用。

怎样创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一是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新理论和社会主义辩证法新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总结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问题上“左”和右,尤其是超阶段的经验教训并将之概括起来而形成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的新发展。马克思只讲过共产主义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辩证发展和“三步走”发展战略。“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辩证法在国家理论中的活生生体现,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使之统一起来,通过矛盾的结合和融合,经过较长时间的缓慢的渐进过程,融汇到社会主义中来,建立新的统一体。

二是在继承基础上作出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在恢复和继承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作了创造性发展的。他把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发展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又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指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

泽东思想的精髓;将实事求是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集中体现;高度评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大作用,是关系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这就把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发展到新境界。

三是从正反对比的剖析中提炼出新理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辩证发展是一个典范。这个理论既把长期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市场经济的观点改正过来,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到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灵魂和精髓。

创新,要有正确的途径。一方面亲自深入实践,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大量材料,去粗取精,由此及彼,发现事物的规律;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基础理论,掌握理论武器,融汇贯通,学会应用,同实际相结合。这是从群众实践中的创新,主客观相一致的创新,具有巨大的功能。

创新,要有正确的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引,朝着现代化的目标来创新。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已经过时,予以否定,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发展,充满新时代的精神、现代化的气息,把握现代化的脉搏,通过探索吸收最新的科学成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慧支持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哲理论证和辩证思路。

三、在新世纪的创新中发展社会主义辩证法

新世纪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和创新包括多方面内容,最需要的是把社会主义辩证法规律的研究和创新放到重要位置上来。因为规律是事物的内在联系

和客观必然性。认识规律就能知道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明确方向,认清前途,坚定信念;按规律办事,可以使主观符合客观,适应历史潮流,无论多么遥远、曲折和困难,都能如顺水行舟到达彼岸。现分两方面来阐明。研究和创新哲学规律、社会主义辩证法规律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三大规律的研究和创新。这三大规律是从总结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中概括出来的普遍规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都不会过时,但有新的重大的发展。以创新精神,从实际出发,弄清辩证法三大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新发展的表现、内容和观点,应该是研究的着重点。例如:(1)对立统一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新发展的突出表现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新型社会矛盾,它的本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只在一定范围长期存在对抗性矛盾,这和旧社会的本质矛盾是对抗性矛盾根本不同,由此引出了很多新观点。马克思、列宁和刘少奇早就说过,这种非对抗性矛盾可以采取“矛盾融合”、“矛盾调和(或和解)”、“矛盾结合”的方针来解决。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现在应该恢复本来面目,使这种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方针、方法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这并非否定斗争,而是要采用非对抗性斗争方式来达到融合与和解。(2)质量互变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质变的渐进性。从社会主义的这个历史阶段到另一历史阶段,从旧体制到新体制,都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渐进性进行,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质量互变的一系列新观点新理论。(3)否定之否定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发展是:强调自我否定、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自我更新和革

关于社会主义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新思考

□ 刘景泉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10)

[关键词] 辩证法 规律 新思考

[摘要] 本文认为, 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基本规律必须注意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质量与结构互动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波浪式前进规律。

[中图分类号] B0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052-05

近年来, 我国理论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及其基本规律, 并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在这过程中, 难免存在不同意见, 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基本规律的理解和表述, 更是众说纷纭, 张江明同志把它概括为有九种不同表述(见广东省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编辑的《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资料》总第17期), 可资对此问题有兴趣的

研究者参考。我对此问题也曾经过长期思考, 现写出一些看法就教于诸学者。

我觉得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基本规律, 必须解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因为只有大家持相同或近似的方法论, 才可能有共同视角和语言, 不然就难免“各吹各的号”, “各敲各的锣”。我认为,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及其规律, 首先必须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具体来说

故鼎新, 自己创造条件否定自己过时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事物, 不是让别人来否定(推翻)。这种“自我”是和群众, 尤其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相结合, 因而保持旺盛的新陈代谢的朝气和活力, 不断更新、前进。

另一方面是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创新精神、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探索和提出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新规律、新范畴、新理论。例如: 社会主义竞争与协同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改革、新陈代谢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质变渐进性滚动波浪发展规律; 社会主

义人、自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 等等。这些概括、提法不一定很完善, 可作为抛砖引玉。

如果我们以创新精神, 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三大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发展研究清楚, 又对社会主义辩证法新规律的探索比较准确地掌握, 并把这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 这就会对社会主义辩证法有所创新, 提高到新境界, 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新的重要的作用,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责任编辑: 何蔚荣

有下面三点:

一是要深入研究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与社会主义辩证法基本规律之间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共同的、一般的规律,而社会主义辩证法基本规律则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一个部分,它们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辩证法基本规律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应当是一致的,而不能相互排斥或相互脱离的,不然,它们之间就没有共性。然而,它们在表现形式或具体内容上是有区别的,不然,它们之间就没有个性。有的研究者把它们割裂或混同都是不妥当的。

二是要深入研究人类科学、思维、智力发展史。辩证法三条基本规律,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科学、思维漫长历史的凝结。早在古希腊或我国先秦,有些思想家(如赫拉克利特、老子、庄子、孙子等)已经有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许多思想家(如德国康德,我国宋朝的朱熹等)又有新的贡献。特别是德国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综合了人类思维智慧的成果,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了辩证法三条基本规律。他在《逻辑学》一书中,“存在论”阐述了质量互变规律;“本质论”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概念论”阐述了辩证逻辑;整本书体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辩证法基本规律建立在唯物基础上。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普遍适用的形式表述出

来,这始终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勋业。”^①我们今天探索社会主义辩证法基本规律,也要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认真研究人类智力发展史、科学发展史,特别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有关研究成果,不要轻易放过每个细节,更不能“另起炉灶”。须知,任何一个研究成果的突破,一个发明、发现的提出,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获得的。抛弃前人,只能否定自己,或者把比前人相形见绌的东西当作“伟大发现”。

三是要深入研究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自从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充满着艰难、曲折的过程,但也获得了许多丰富的成果和经验。我们只有系统地历史地分析国内外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和经验,才可能在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基本规律方面受到启示,获得珍宝。如果只靠思辨,或把某些已有的东西凑合,那也不会有新的进展的。

考虑到上述三方面的高要求,我觉得目前诸学者可以大胆探索,各抒己见,但不必匆忙做结论,有些结论再放10年、20年或更长时间再做,恐怕更为适宜。为了与大家交流,我在唯物辩证法三条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辩证法三条基本规律,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质量与结构互动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波浪式前进规律。这三条基本规律既是唯物辩证法三条基本规律的体现,但又有它自身的特点。说具体一点就是:

1.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发展规律。它主要是研究通过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联系。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仍然是

正确认识和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这里包括正确认识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与霸权主义矛盾,等等。否定这些矛盾的存在,或不能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正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得好:“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②我国当前依然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只有进行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前进。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同志把改革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10年和下世纪前50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④还要看到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际风云变幻无常,霸权主义还在兴风作浪,我们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与霸权主义展开斗争,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⑤

有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强调统一(和、合),不应当强调斗争,这种意见值得商榷。对立与统一构成矛盾关系,只有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斗争),在对立(斗争)中把握统一,才能解决各种

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斗争,而是要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例如处理“法轮功”问题,就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同李洪志的斗争,是敌我性质的斗争;对广大练功者的批评教育,属于人民内部的斗争。那种把统一和斗争绝对割裂开来,用统一代替斗争,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和过去只强调斗争,忽视统一的思维方法都是各走极端的片面性。

2. 社会主义社会质量与结构互动规律。它主要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改革与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质与量的关系,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质量与结构的互动关系。

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改革与建设过程中的质与量的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国防建设,无论是对内开放,还是对外开放,都会碰到质与量的矛盾。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有不少产品质量差,在国外市场没有竞争力;伪劣商品多,损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造成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邓小平同志早在1975年就指出:“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军工产品。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⑥江泽民同志总结了我国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指出“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⑦

质量与结构,也有密切的关系。质与量不同,会影响事物的结构;结构不同,也会影响事物的质与量,因此,质量与结构存在互相制约、互相推动的关系。当前,我们国家强调改善或改革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等等,因为它将极大地提高我们各种事业的质量,而质量提高了,又将推动各种结构的完善。在历史上,国内外许多哲学家、科学家曾煞费苦心研究结构,提出许多合理结构思想,如化学的同分异构论,经济学的不同分工和组合提高劳动生产率论等等。现代有一种结构主义,虽然有不少错误,但也不乏合理的思想。我们现在要建立新的结构科学,与辩证法基本规律结合起来,毫无疑问会有益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们不要把质量互变规律与结构论、系统论对立起来,它们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应当从辩证法整体上去把握它们。

3. 社会主义社会波浪式发展规律。它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改革与建设的发展节奏及其相应的领导艺术。

恩格斯把辩证法三条基本规律统一起来,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⑧毛泽东同志同意否定之否定规律,并认为“否定之否定表示过程发展的一个循环之终结,另一个循环之开始。”^⑨毛泽东同志还把事物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称之为“波浪式的或者叫做螺旋式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我国多年来发展的经验教训,认为“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⑩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能否遵循、应用波浪式前进规律,至关重

要。譬如我国经济建设,经过几年大发展,要来一个调整(整顿),然后再上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发展——调整——新的发展,已经成为普遍规律。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总结了我国发展的过程和经验,指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⑪有的同志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好不要调整,一直向上为好。这个愿望虽然是好的,然而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的道路不可能毕直又毕直,不可能一帆风顺。由于客观事物矛盾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发展过程必然是波浪式前进的。

在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方面,波浪式前进规律也有重大的、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会面临各种复杂的局面,在对内与对外的交往过程中,肯定要碰到各种矛盾斗争,挑战与机遇并存。这就要求高明的领导者,刚柔相济,张弛交替。邓小平同志谈到对于国际局势时指出,“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⑫这就告诉我们凡事不要急,要冷静,埋头实干,把握时机而干,这就是有节奏、有张有弛的领导艺术。

上面说的社会主义辩证法基本规律,并不是平列的,也不是割裂的,而是以矛盾发展规律为核心的有机整体,还是毛泽东同志说得好:“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⑬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只看到对立统一规律重要,否认其他辩证法规律的作用,这是天大的误解。从上面这段话中,毛泽东同志只是强调不要把辩证法诸规律、诸范畴割

裂开来,要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其他辩证法规律和范畴(顺便说一句:范畴与规律在逻辑上是不分的,范畴的联系和展开即是规律)。

毫无疑问,本文完全是在辩证法基本规律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没有探索出更多更新的“规律”,似乎没有什么新意。但我觉得:辩证法三条基本规律,经过人类漫长历史考验,经过自然、社会、思维各方面实践的检验,证明它们是普遍规律,找不到任何理由否定它们的普遍性和对今天的适用性。当然,辩证法基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和应用,具有许多特点,这是我们要着力研究的。本文根据作者的调查材料和依据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核心的有关论述,也作了

一些新的思考和论证,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其中新意的。

①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51、490、521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1986年版,第769页。

③④⑤⑩⑪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131、353、368、377、321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页。

⑦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1996年7月1日第1版。

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988年版第126页。

⑬《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7页。

责任编辑:何蔚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研讨会综述

□ 卢黄熙

(海军广州舰艇学院政教室副教授, 广州石井 510431)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3-0057-0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 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哲学学会、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省社科联、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理论研讨会, 于 1999 年 10 月下旬在上海召开。有 15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命运从来都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从社会主义实践中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吸取营养。

许多学者联系建国 50 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 指出,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离开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革命和建设都要走弯路和受损失。有学者认为, 50 年来中国的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50 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 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

的理解和把握上, 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第二, 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 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第三, 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 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体性。

与会者认为,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务实”、“求是”、“致用”、“创新”、“为人民”十一个字。还有学者指出, 邓小平理论作为时代的辩证法, 最突出的体现有三点: 一是更加注重综合方法; 二是更加注重协调、协作和动态平衡的解决矛盾的方法; 三是更加强调“抓住机遇, 发展自己”。有的学者认为, 哲学工作者要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 思路有三: 一是立足中国,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二是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 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多方面结合起来研究, 进而升华为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是研究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 探索一种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求真与务实相统一的科学思维方式。

有学者认为运用社会主义辩证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提升到普遍性,找出它们的辩证规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国建设事业服务的中介形式。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的新规律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来研究。首先应重视研究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的新规律;其次要研究新规律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这些思维方式和方法有:系统性、开放性、层次性、阶段性、动态性、信息性、多维性、创造性、矛盾分析、调查研究、民间测验,从实践经验到理论总结和再回到实践中去。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辩证法思想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社会主义系统的辩证法,一是社会主义过程的辩证法。前者包括对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矛盾系统的认识,以及中国与外部环境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在这方面,邓小平阐发了一系列辩证统一的范畴,诸如,和平与发展、战争与和平、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建设与改革、稳定与发展、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民主与法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变革与继承、探索与创新、封闭与开放、挑战与机遇等等。后者包括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性与阶段性、社会主义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社会主义的量变与质变、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过程等。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后发展的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和应用性将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挥前导性功能的同时,反思功能将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将更加突出。有学者预测,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在 21 世纪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哲学研究主要课题而且获得重大的发展。有学者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成一个开放体系,即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经典著作开放,向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开放,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放,向全球性问题开放,向现代科学开放,在开放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学者认为,经济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 21 世纪发展的最好的结合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当发展经济哲学;市场经济的推进呼唤市场智慧和经济理念。

责任编辑:何蔚荣

关于翁同和一封密函的订正

□ 孔祥吉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教授, 美国)

[关键词] 翁同和 密函 伪作 考订 张子扬

[摘要] 本文作者对 1957 年 7 月 21 日《光明日报》史学专栏第 61 期所刊载的张子扬先生所收藏的翁同和戊戌政变后写给友人的一封信进行考订后认为, 此密函是伪造之作。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059-03

一、问题的提出

1957 年 7 月 21 日的《光明日报》史学专栏第 61 期刊载了张子扬先生的大作《关于翁同和与康梁关系的一件史料》。张文刊布了作者所收藏的翁同和戊戌政变后写给友人的密函一通。该函内容至关重要。故自刊布报端后, 颇引起国内外学者重视。汤志钧先生《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全文收录了该密函及《光明日报》编者所加的按语。①1970 年台湾学者黄彰健于《戊戌变法史研究》第三篇“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策略的转变, 并论转变以后, 至曾廉上书以前康的政治活动”一文中, 对张子扬先生所刊布的密函内容表示怀疑。黄氏指出:

“张子扬此文为余所未见。此处系据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P. 105 转引。这封信札的真实可靠性有问题。我的理由有三点:

一、坊间出版的《翁松禅手札》影印本收有翁罢职后, 在常熟写给友人的信, 其信纸边未见印有‘十二灵鹊馆笺启’字样。

二、翁并未荐梁。此信说, 翁力举梁, 恐与史实不符。

三、康《自编年谱》说, 翁欲康归。此信所记与康《自编年谱》抵触。……张子扬所藏翁此信恐非真迹。”②

我之所以详细征引黄氏论说, 是因为我个人以为, 其说颇有道理, 所可惜的是黄氏并未对密函本身的内容进行考订。所谓张子扬刊布的翁氏密函, 我以为应是伪造之作。然而, 近年来国内有关翁氏与康、梁关系的论文或著作, 仍有将此密函信以为真, 不断引用者。因此, 我决定再撰斯文, 对此密函予以考订, 希望能引起重视, 或予以批评指正。

二、关于翁氏密函内容及编者的按语

1957 年 7 月 21 日《光明日报》史学专栏刊布的翁氏密函内容如下:

“今日太后临朝, 问康梁事甚急, 略有怒容。弟之举康、梁也, 衷心无一毫不能告人者, 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见也。康、梁有其经世之才, 救国之方, 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 必欲其才能得所用

而后已也。近遭时忌,必欲抑之,使不能行其素,究何为哉?是何心耶?太后且有不得康、梁,翁某亦有罪咎之语。呜呼!翁某岂畏罪之人哉?徒以有梗在喉,不吐不快耳。足下知我最深,将何以教之耶?方寸已乱,书不成句,惟知我者谅之耳。敬颂尊安,弟同和上言。阅后乞付丙丁。”

据编者按语称:

“这件翁同和的密信,原件经张子扬借给我们看过,信上的笔迹与影印的翁同和手书《日记》相同,可以肯定是翁的手笔。原件是绛色的便笺五张,笺上印有朱红格,笺边印有‘十二灵鹊馆笺启’字样。这也是翁自用的笺纸。因此,这封信是可靠的。”^③

非但如此,史学专栏的编者,还对翁氏此密函写作时间进行初步考订,认为“可能是在戊戌八月初六日政变发生,康、梁逃出后的数日内,翁可能在常熟原籍接到北京友人电告:‘今日太后临朝,问康、梁事甚急……且有不得康梁,翁某亦有罪咎之语’,因而,‘方寸已乱’,书不成句,(翁氏遂)向其密友请教办法。”^④

对于史学专栏编者所加按语,我以为有欠恰当之处。我怀疑的理由如下:

首先,编者说:“信上的笔迹与影印的翁同和手书《日记》相同,可以肯定是翁的手笔。”我以为编者“肯定”二字,不无轻率之嫌。须知晚近以来,由于翁同和书法遒劲,自成一格,故模仿翁氏手书者颇不乏人,以至于在今日的文物商店里,每每可以见到翁氏之书法作品,但属真迹者已是寥若晨星。有的临摹高手的作品,往往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因此,我担心编者的“这封信是可靠的”结论,是靠不住的。

其次,关于这封密信的写作时间,史学编者考订时说:“政变发生,康、梁逃出

后的数日内,翁可能在常熟原籍接到北京友人电告:今日太后临朝,问康、梁事甚急”云云。在此处编者按语忽略了戊戌前后,清政府对电报控制很严,而且,不像今天这样,有事可以打私人电报。当时的电报均在总督、巡抚等衙门的控制当中,由地方官吏严加掌握,试问翁同和当日的处境,他怎么能接到“北京友人电告”?

退一步讲,即使翁氏可以辗转接到“北京友人电告”,试问像这样犯忌的内容,谁个又敢在电报中拍发?

因此,我推断史学专栏编者所加按语是靠不住的。“肯定是翁的手笔”的推断,同样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据编者称:“翁同和的密信原件借给我们看过。”由此线索似乎可以推测,该信原件仍由张氏保存。因此,常熟附近的学者们可以寻访此原件,交给方家们再作鉴定。

三 翁氏密函本身的疑窦

本文上引翁氏密函所涉及内容是十分重要的,故一经刊布,便引起学者们之重视,多次被引用转述。然而,如果仔细推敲,便不难看出这是一封疑窦丛生、漏洞百出的伪作:

其一,该密函之首句称:“今日太后临朝,问康、梁事甚急,略有怒容。”这句开头的话,是很令人生疑的。首先,翁同和当时被罢职归里,不在京师。翁氏对北京的消息获得,不是那么便捷,至少要三五日或更长一些时间。而此函一开头即称:“今日太后临朝”,给人一种印象,仿佛翁当天获知消息后,即愤懑填胸,怒不可遏,于是给友人写了这样一封密信。作伪者忽略了时间、地点,故有此误。

其次,“问康、梁事甚急”句亦有问题。康、梁并称,是后来的事。百日维新之际,康有为是老师,梁启超是学生,无

论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翁同和,或者是康有为的维新同伴,很少以康梁并称者。更何况据清宫档案及实录所记,戊戌政变发生后,相当长时间内慈禧并没有追问梁启超的下落。请看如下事实:

八月初六日,清廷颁谕称: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八月初七日,清廷又颁谕称: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现经降旨革职拿办。兹据步军统领衙门奏称:该革员业已出京,难免不由天津航海脱逃,著荣禄于火车到达及塘沽一带,严密查拿。

八月初八日,清廷的上谕称:谕军机大臣等,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治罪。^⑤

可见,直到八月初九日,慈禧虽然临朝数日,却并没有问及梁启超的事。甚至于把军机四卿、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抓了数日,还没有想到梁启超。可见,密信称“问康、梁事甚急”,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再有,密函提到了“太后且有不得康、梁,翁某亦有罪咎之语。呜呼,翁某岂畏罪之人哉?”这种语气给人一种印象:翁同和于政变发生,并不畏罪,然而,这与史实亦不相符。

戊戌政变发生后,翁氏如惊弓之鸟,非常担心厄运降到自己的头上。因而发生了他改删日记,消泯与康氏往来之痕迹的事。据称他还在故居挖了一口井,随时准备投井,以防不测。翁氏怎么可能称自己为“岂畏罪之人哉?”

翁氏身居高位,正色立朝,行政经验丰富,故其言行一贯谨慎小心,生怕惹祸。无论在朝,还是下野,他都循规蹈矩,如履薄冰焉。戊戌四月,光绪帝令其

找康有为呈递变法新书时,翁氏百般推托,惟恐引火烧身。了解了翁同和的这种谨言慎行的性格,就知道政变之后,他是不会贸然给友人写这种惹事生非的密信的。至于“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利用而后已”,更不像翁氏口吻。

另外,梁启超系徐致靖于戊戌四月二十五日保荐。徐氏称赞梁“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⑥是梁氏并非翁荐。翁氏不可能在戊戌政变后说“弟之举康梁也”这样的话。

四 张子扬其人

《光明日报》所刊翁氏密函,系张子扬提供。那么,张子扬是何许人也?这对判断翁氏密函之真伪亦颇有关系。

我在研究晚清史过程中,曾多次引用清代的私人函件。在实践中我体会到,考察函件的出处与来源,是首先要注意弄清楚的,不然往往会出差错。因此,我曾询问过《光明日报》史学的诸位先生,希望得到1957年《光明日报》刊发该函之底稿,答称已无保留。

我也曾就此问题,向翁同和之后裔万戈先生请教。万戈先生称:

“常熟未见有张子扬其人者,倒是有位王子扬先生。但不知王子扬与张子扬是否同为一人?王子扬先生故居常熟,而后迁往沪上。王氏通文墨,精字画。”

万戈先生还称,王子扬曾向他出示过不少翁同和墨宝,其中有真的,亦有假的。王氏初见到万戈先生时,出示者以伪者居多。又据称,这位迁居沪上的王子扬先生因年事已高,已于近年过世。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否则他也许会帮助我们澄清伪函的出处问题。

1998年9月常熟召开翁同和与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时,我曾将此文转呈

罗孝全索赔事件及其影响

□ 吴义雄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 罗孝全 索赔要求 中美交涉

[摘要] 1847年5月, 罗孝全在广州的住所和教堂失窃。这本是一个普通的治安事件, 但在处理时却升格为关乎条约权利的交涉, 因为其所失财物的索赔对象不是偷盗者而是中国政府。罗孝全的索赔要求经过长达11年的争论, 经过几任美国公使的努力后, 最终由新的不平等条约予以满足。这是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政治势力相互利用、攫取侵华权益的典型事例。本文对这一国内学界未见讨论的事件的发生、交涉过程及其影响等进行了阐述。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062-08

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因他与洪秀全的交往, 向来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所注意的人物。由于洪秀全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跟罗孝全研讨基督教神学, 而他后来领导的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又在思想上吸收了基督教的教义, 他与罗孝全的关系自然成为太平天国史和中外关系史上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但罗孝全的另一个对中外关系产生过长远影响的行为, 即本文将要探讨的他向中国政府索赔的事件, 尽管国外的一些学术著作早已论及, 国内学界却未见讨论。这里, 笔者根据所见到的史料, 参考国外的有关研究成果, 对这个事件的发

生、交涉的过程及其影响, 作一简要的论述。

—

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士。他于1802年2月出生于田纳西州桑穆纳县的农庄。他的母亲是浸礼会信徒, 他的哥哥莱维·罗伯茨(Levi C. Roberts)是当地浸礼会的一名牧师。其家庭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这对罗孝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①19岁那年, 他受洗加入田纳西州舍尔比维尔浸礼会, 后成为一名业余的神职人员。^②他做过马具工, 当过教师, 1827年又到南卡罗莱纳州的一所学校进修过

翁万戈先生过目。先生返美后电话相告: 他同意我的这封密函是伪造的看法。他认为他的高祖翁同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信来。翁万戈先生的意见应该是正确的。

^①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上册, 第286-295页。

^②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 1970年“中研院”史语所版, 第150页。

^{③④}《光明日报》, 1957年7月21日。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 光绪二十四年秋季档。

^⑥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 1953年神州国光版第二册, 第335页。

责任编辑: 郭秀文

一个学期的神学课程, 约在 1828 年前后被正式按立为牧师。在这之后, 他又决定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当时正值美国新教各派纷纷对中国发生兴趣之时, 到中国传教是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在此背景下, 罗孝全于 1835 年初决定到中国传教。

此后, 罗孝全与美国浸礼会的传教机构多次联系, 希望浸礼会海外传道会派遣他到中国。但一开始美国浸礼会认为他“资质平庸”, 拒绝了他的要求。罗孝全没有放弃努力。他自己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创建了“罗孝全基金会”(Roberts' Fund)。又以他为首, 成立了一个“密西西比谷地中国传道会”(China Mission Society of the Mississippi Valley), 作为他到中国传教的组织和后援机构。在这之后, 罗孝全以在经济上自给为条件, 说服了美国浸礼会接受他为传教士。1836 年 10 月, 罗孝全乘船离开波士顿, 第二年初到达南洋的巴达维亚, 在那里学了一段时间的中文后, 于 1837 年 5 月来到澳门。^③

罗孝全与先期到达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叔未士(J. Lewis Shuck)夫妇, 在澳门附近的乡村和商船上进行传教活动, 历时 5 年之久。在这期间, 他与德国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也有密切的交往。^④罗孝全鼓吹扩大对华传教, 在写给美国宗教人士的信中说, “我认为如果有一打勇敢的传教士来到这里, 精诚合作, 再有一打勇敢的本地皈依者, 甘冒生命危险, 在他们的努力和神的保佑下, 福音将像电流一样传遍这个国家。”

^⑤由于美国浸礼会海外传道会此时不向他提供经费, 为了弥补他的“中国传道会”资金的不足, 他甚至重操旧业, 利用自己制造马具的技艺赚钱。到 1841 年, 罗孝全自己的财产和“中国传道会”的其

他资助已不能满足他在经济上的需要。所以他写信给设在波士顿的浸礼会差会, 要求成为该会的正式传教士, 由差会提供经济资助。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这样, 在 1841 年, 罗孝全就成了美国浸礼会的正式传教士。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对香港的占领引起了叔未士和罗孝全的强烈兴趣。1842 年 2 月, 罗孝全从澳门搬到香港。叔未士和他的夫人则于 3 月份搬迁。他们向英国香港当局租赁了地皮, 在香港的皇后大道等地修建了教堂。罗孝全开始时在香港岛南端赤柱的英国驻军和中国村民中传教。但不久, 他就对那个狭小、人口不多的乡野感到厌倦, 在 1843 年 2 月离开了赤柱。此举激化了他与叔未士等之间从在澳门活动时期就已开始积累的矛盾。1844 年 5 月 14 日, 在当时任港英殖民政府中文秘书的郭士立的鼓动下, 罗孝全离开香港, 带着他的两名助手, 次日抵达广州。这样就开始了美国浸礼会在广州活动的历史。^⑥

罗孝全到广州后, 花了很大力气进行传教活动。1845 年 7 月 26 日, 罗孝全在广州南关天字码头东石角成立了“粤东施蘸圣会”(The Uet-tung Baptist Church)。这是罗孝全自己成立的浸礼会组织, 牧师为罗孝全, 成员开始时有 5 名中国教徒, 此外, 还设了 4 名长老。^⑦这个“粤东施蘸圣会”, 又隶属于罗孝全在 1845 年成立的“广州浸礼会传道会”(Canton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这是他自己建立的传教组织, 由他自任“总干事”, 并由 5 名在广州的外国人, 加上他自己, 组成董事会。他在佛山也建立了另一个传教站。他还以“广州浸礼会传道会”的名义, 向在广州的外国人筹到数千元活动经费。^⑧

19 世纪 40 年代, 美国南部以及边

疆的蓄奴州与北部的自由州在维护还是废除奴隶制的问题上,形成越来越尖锐的对立。影响所及,美国浸礼会也发生分裂。南方浸礼会的人士另行成立了美国“南部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并相应成立了海外传教差会。1846年1月,罗孝全改属南部浸信会差会。^⑨但罗孝全与这个差会的关系也处于不妙的境地。差会因叔未士等人的影响,对罗孝全另眼相看。而罗孝全个性又偏执刻薄,行事荒谬。到1851年,罗孝全被美南浸信会差会除名。之后,他作为独立传教士继续在广州活动,曾应洪秀全的邀请,到南京逗留过一段时间。

二

罗孝全在40年代后期,一直以他设在广州东石角的“粤东施蘸教会”为活动基地,在广州进行传教活动。但他在东石角修建的教堂和住所,距广州外国商馆区——外国人聚居的地带,有数里之遥,事先并没有得到中国官方和美国领事官员的许可,因此违反了《望厦条约》的规定。他在此居住后,与周围邻居的关系也相处不好。他在他的教堂顶上安了一座从纽约运来的钟,在从事宗教仪式时敲打,与附近佛寺的钟声相冲突,引起了附近居民的不快。^⑩这些,与后来发生的事件有间接的关系。

1847年5月23日,罗孝全的住所和教堂失窃。具体情形有不同的说法。罗孝全自己说,他在白天拒绝见一群“愤怒地跟他吵嚷”的人,而在晚上,很可能是这些人乘他外出,闯进他的住处和教堂,窃去了那口钟、罗孝全的个人文件、家具和存放的传道书,并将罗孝全的一艘用于传教的小艇毁坏、弄沉。^⑪据说,那个小艇乃“一紫洞艇,在海面作浮水讲堂”。^⑫而番禺县令的告示则说,当天因“听经人等(向罗孝全)索钱不遂,混行吵

闹,毁坏门窗桌椅,并掠取衣服物件。”^⑬总之,罗孝全的个人物品和传教工具遭到了一番洗劫。

事发时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Alexander Hill Everett)在澳门,故罗孝全在第二天早晨向美国驻广州领事福士报告了这个事件。罗孝全一开始声称他失窃的物品价值“五千到一万元”。但不久中国地方官员通知福士,已经抓住十多名盗窃者,他们偷窃的物品也已追回。但罗孝全向义华业报告说,被追回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物品,他对此远远不能满意。义华业问他到底损失了多少东西,罗孝全开列了一份清单,声称大约价值2800元。这比他起初所说的数目大大降低了。^⑭义华业虽然相信罗孝全所失物品未能全数追回,但对这个数目仍然表示怀疑。他在6月19日照会耆英,其中说道,“据罗孝全称,当时所失家伙、书籍、衣服、快艇、毁屋各项,总共估计约值银三千有余元,今尚未能全追,其给还之物,不过约值百余元云云。然本公使不能断其所报失之数是否的确,自应设法查出真妥数目,照追给足。”他建议由双方共同派员,联合调查,得到耆英的同意。耆英委派署南海县候补知县施禹泉,与伯驾和福士一起,查实罗孝全所失数目。^⑮7月19日,这3人在福士的“领事衙门”进行查讯,认为“赃值所开约该银二千七百三十元之数,未免过多,因公同核定该失赃物约值银一千两,若能将罗孝全所失之自撰书籍追回给还,则于所失一千两之数内,扣回四百两,以抵书价……”^⑯由此可见,罗孝全原来是打算乘此机会漫天要价,狠敲一笔的。

6月28日,在上述数字核定之前,义华业在广州去世,在新任公使到广州前,由专职外交官伯驾任美国驻华代办。他在一段时期内负责处理罗孝全被窃事

件。伯驾在7月24日给耆英的照会中提出:1000两之数,“此系两国委员凭公酌夺之议,似可照数追赔。”^{①7}耆英等理所当然将“追赔”理解为,由中国政府负责通过司法手段,使被定为窃犯的中国人交出赃物,或进行赔偿。对此,耆英在复照中表示,“自应在于获到各犯名下切实讯追。”但伯驾在7月27日照会中又要耆英“早日转饬照数给与本国领事,传交罗孝全收领。”7月27日伯驾再次照会耆英,说根据《中美望厦条约》第19条“嗣后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安分贸易,与中国国民人互相友爱,地方官自必时加保护,令其身家安全’等语,可知若是地方官失于保护本国民人身家安全,则合众国惟有望中国赔还而已”,要耆英“勿延给还”。^{①8}这就是说,罗孝全所失财物的索赔对象,不是那些偷盗者,而是中国政府;而提出这种要求的根据是中美条约。按伯驾的解释,中国对美国政府在美国公民在中国因治安原因而造成的财产损失,负有如数赔偿的条约责任。

对此,耆英在照会中予以断然拒绝。他指出,伯驾对条约的援引和解释是片面的,紧接伯驾所引条约文字后面的,还有如下文字:“(中国地方官)并查禁匪徒不得欺凌骚扰,倘有内地不法匪徒呈凶放火,焚烧洋楼,掠夺财物,领事官速即报明地方官派拨兵役弹压查拏,并将焚抢匪徒按例严办。”另外,条约还载明,美国商船在中国海面被劫,中国地方官亦有惩凶追赃的责任,同时写明,“但中国地广人稠,万一正盗不能缉获,或有盗无赃,及起赃不全,中国地方官例有处分,不能赔还赃物。”^{①9}据此,耆英指出:“此案罗孝全被匪掠抢,当时起获各赃,业经给领,其未经起获者,自应仍向该犯等严追,地方官不应赔还。来文所称,核与条约不符,碍难照办。”^{②0}

伯驾不甘罢休。他在8月4日再次向耆英发出照会,说“地方官保护美国人身家安全”的意思,就包括赔偿其因治安原因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内,否则,“若合众国人被匪徒毁抢,而但望匪徒人、不法人、贫人赔还,又何能得其身家安全。”这样的解释,已近于以一国使者的身份而无理狡辩。伯驾也深知其要求是完全缺乏条约根据的,所以他在照会中又提出,中国地方官赔偿外国人因盗窃所造成的损失,是有先例的,“如道光廿二年十一月初六日闹事,本国商人喝等失去赃物,于廿三年四月廿八日,中国令赔还银二十四万六千六百八十元半。又香港英官报纸云,去年福州港闹事,英人四名失却赃物,中国赔还银四万六千元各在案。”他认为这就表明,“失去赃物,中国赔还,历为条约成规。”而耆英所引的《望厦条约》第26款关于海盗抢劫造成损失不赔偿的条文,伯驾认为不能使用于陆地城市。他再次明说“失去赃物,惟望中国赔偿,不望犯人赔偿。”而耆英则没有答应伯驾的这种无理要求,只表示“惟有严饬该县迅向所获各犯名下着追,以期速结。”^{②1}

此后该案拖了3个多月,伯驾见久无下文,于11月15日又发出照会向耆英追讨,所陈述的“理由”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强调中国必须赔满罗孝全1000两,“若不足此数,则断难照收。”由于耆英在照会中强调“地方官”不能答应这一类的赔偿要求,伯驾在第二年1月的几份照会中,除重弹老调外,还特别声明他“未曾问及地方官赔还,但知问中国赔还而已。”他甚至说条约并没有规定要“向犯追赔……因为犯人多系贫苦,如何能赔几万银两。”那么索赔的对象只能是中国政府了。他并威胁说如再拖延下去,“则合众国必要按照加息,以昭公道。”^{②2}耆

英在历次复照中,都照例予以拒绝,至于伯驾提出的所谓“先例”,耆英说一宗是在中美条约签订之前,不能用以解释条约;另一宗他则未曾听说。他两次通知说,番禺县已向犯人分别追出 170 元和 240 元,还会再追下去,但“中国赔偿”之说,他则始终不肯答应。^{②③}

从伯驾和耆英在罗孝全索赔事件中争论的过程来看,伯驾突然提出要“中国赔偿”,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看到在被逮捕的 12 个人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被毁坏的房屋和小艇是赔不出来的,因此起意将索赔的对象转为中国政府。但更为野心勃勃的动机,显然是想通过这个案件向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并将这种利益与条约联系起来,从而使原本就不平等的条约更具掠夺性。他所着眼的不是罗孝全那 1000 两银子,而是将来要涉及到的“上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利益。^{②④}而耆英虽然在办理交涉近十年的时间中签订了不少屈辱的条约,但这一次他却不再让步,因为他认识到这将使中国陷入一个赔偿的无底洞,仅对美国一个国家就将穷于应付,而一旦承认“中国赔偿”是一种条约利益,其他各国势必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同样要求“一体均沾”,后果不堪设想,道光帝也是不可能批准的。

三

就在伯驾喋喋不休之时,1848 年 3 月,耆英被道光帝召去北京(中途改赴南京处理青浦教案),终于得以摆脱罗孝全失窃一案,以及更为麻烦的英国人进入广州城问题。伯驾交涉的对象变成了新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徐广缙。他在一段时间内放下此事,直到 8 月 16 日,才为罗孝全之事照会徐广缙。但这次他却不是催讨赔款,而是告知,据罗孝全禀称,修建房屋欠工匠周插、张贵银两,而

周张二人又欠店铺银两,罗孝全改请工匠后,这些店铺却要求罗孝全还清欠二人之款,以便他们能够讨债,否则不准修缮工程继续下去。伯驾的照会是要求对铺户阻挠工程之事“设法禁止,使罗孝全获保身家安全,一如条约所载。”他还特别声明,“本摄理原不欲再为罗孝全之事吁恳中国为之保护”,^{②⑤}说明他已经暂时放弃“中国赔偿”的要求了。

但这并不是说他放弃了原来的目的。罗孝全本人也没有放弃索赔的要求,他与伯驾一样,也将索赔的对象定为中国政府,并不断重申他的要求。伯驾之所以改变了态度,一方面可能是看到无望实现目的,知难而退,另一方面是因为新任美国驻华公使德威士(John Wesley Davis)即将抵达,交涉之事将由德威士负责。

德威士于 8 月 21 日到广州,伯驾不久就提请他处理罗孝全索赔之事。德威士开始时听信了伯驾的建议,但他对此案加以研究后,就对这起索赔事件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他认为从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来看,中国政府不应该对被盗贼偷窃的外国人负赔偿责任;而《望厦条约》第 19 条实际上也不包含伯驾所说的那种意思;同时他还认为罗孝全在这个事件中也有责任,他没有遵守该条约第 27 条的规定,未经中美官员的同意就在东石角建房子。在此情况下,他要求美国国务院给他明确的指示,在接到指示前他不向中国官员提出要求。另外,原来支持罗孝全的美国领事福士也采取与德威士同样的看法,他在 1849 年初写信给德威士说,罗孝全和伯驾滥用了条约规定的权利,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使中国官员日益关注传教士的行为,而使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利益都受到损害。这封信也被德威士寄给了美国国务院。^{②⑥}与此

同时,罗孝全自己写信给国务卿布坎南,坚持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他向中国政府索赔。伯驾也在给布坎南的信中阐述他的上述立场,继续主张采取措施要“中国赔偿”。但当时的美国政府正面临换届,布坎南并没有给德威士明确的指示。^⑳而继任的美国政府处在南北分裂趋势日益加剧的考验中,更无力顾及一个传教士价值 1400 元的索赔。

德威士 1850 年辞职,伯驾以“美国副使”的名义再次代理馆务,为时两年多。他虽没有向广州当局重提罗孝全索赔一案,但却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将远征日本的佩里舰队召到中国水域,以帮助实现美国人向中国的索赔要求。在当时,罗孝全的 1400 元索赔额,是几宗美国人索赔案中最大的一笔。^㉑

1852 年,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被任命为驻华公使。在他赴任前,美国国务院指示他研究处理几个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的索赔要求。包括罗孝全仍继续坚持的索赔要求。^㉒1853 年 7 月 10 日,马沙利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将核定的 1400 元“即行发给,并按自定案之日为始,至给银之日止,清算利息,一总交给。……但一时未便,请即订明期日复达。”^㉓7 月 30 日,他又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他认为“中国政府有义务根据条约满足”包括罗孝全在内的美国人的索赔要求,否则美国应封锁广州口岸,或从支付给中国的关税中截取相应数目,或采取其他除战争以外的手段,来迫使中国就范。他甚至提出或是中国赔偿,或是美国撕毁条约的主张。^㉔但他这种强硬的主张却没有得到实现。叶名琛在复照中简单地说,“再查来文所称第一件罗孝全被抢之案,业经前大臣徐于戊申年照复德前公使结案,此时毋庸再述。”^㉕可知德威士也作过试探而被徐广

缙拒绝。美国政府对马沙利狂妄的建议也没有理睬。于是这一轮索赔又没有下文。

继马沙利任美国驻华公使的麦莲(Robert M. McLane) 1854 年到中国后,也没有就罗孝全固执的索赔要求采取行动。次年,伯驾升任驻华公使,当时美国政府正关注所谓“修约”问题,国务卿马西(William Marcy)在要求他关注索赔之事的时,警告他不要让这件事冲击“更重要的事务”,禁止他采取激烈的行动。^㉖1857 年 4 月,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列威廉(William B. Reed)到中国。罗孝全像历次新任公使履新时一样,又向列威廉递交了请求索赔的文件,他要求赔偿的数字变成了 2400 元。列威廉则认为这笔钱连本带息,已达 2800 元。^㉗

1858 年 6 月,《中美天津条约》签订。11 月 8 日,花沙纳和桂良等与列威廉又在上海签订了《赔偿美商民损失专约》,其中规定,将美国船只在广州、福州和上海交纳的所有货税和船钞的 1/5,总额在 60 万元之内,用来偿付尚未了结的美国人向中国的索赔款项;“拟于咸丰九年正月初一起,由广东、福州、上海三港海关,将该银 50 万两分别立单,颁给美国使臣所定应收之人领取;其三港该派之额数,现拟定:广东 30 万两,上海 10 万两,福州 10 万两,以上款项于中国征美国出入口货税、船钞,以 1/5 扣抵,言明作为清结历年至今中国赔偿美国各口商民之数。”^㉘罗孝全的索赔要求,在经过长达 11 年的争论,经过几任美国公使的努力后,终于由新的不平等条约予以满足。^㉙

四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罗孝全索赔事件的历史影响。

很明显,罗孝全向中国政府索赔是

在西方列强对中国恃势凌迫的背景下提出的无理要求,而他最后的成功则更是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新一轮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前提的。因此,这个事件是传教士借助西方政治和军事势力来实现无理和不义要求的一个典型事例,为近代基督教传教士与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注脚。可以说罗孝全索赔事件开了传教士依靠本国政府向中国地方和中央政府勒索“赔偿”的恶劣先例,这样的事件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屡见不鲜,而在《辛丑条约》签订时达到了顶点。不过,伯驾和罗孝全坚持“因地方官保护不力,外国人财产受到损失,须由中国政府赔偿”的要求。虽然在近代还有不少外国传教士效法并取得成功,但以后历次不平等条约,均没有正式作出这样的规定。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要求蛮横无理的程度。^⑦

从另一方面来看,伯驾将一个普通的治安事件的处理,升格为关乎条约权利的交涉,是企图通过推动这个索赔事件,达到攫取新的条约利益,扩大美国人在华特权的目。除了同情罗孝全的处境外,伯驾主要是着眼于这个事件的政治意义。所以,这个事件也是近代列强利用传教士达到新的目的的侵略模式的一次早期预演。罗孝全也看到了他个人行为的普遍政治意义。他在1849年1月为重申索赔要求而写给美国国务卿布坎南的信中就提出,如果他获得成功,将为其他美国人和外国人树立一个“有益的先例”。^⑧

因此,罗孝全索赔事件是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政治势力相互利用、攫取侵华权益的典型事例。当然,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其他方面,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慈善事业等方面,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们在中外关系中所起的

负面作用,也是颇为明显的。

①Margaret Morgan Coughlin, *Strangers in the House: J. Lewis Shuck and Issachar Roberts, Firs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ies to Chin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72, pp. 37—38. 此书以下简作: *Strangers in the House*.

②Clifton Judson Allen, ed. *Encyclopedia of Southern Baptists*, Nashville, 1958, Book 2, pp. 1056—1057.

③George Blackburn Pruder, *Issachar Jacob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h. D thesis, American U., 1977, p. 31—34; *Strangers in the House*. pp. 41—43.

④见 *China Mission Advocate*, Louisville, Kentucky, vol. 1, pp. 46—47, 56—63, etc.

⑤罗孝全致约翰·琼斯(John T. Jones), 1838年2月8日,同上,第57页。

⑥以上见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s. 22—24, 有关对华传教部分。

⑦罗孝全:《粤东施蘸圣会历史》,转引自王庆成:《洪秀全与罗孝全的早期关系》,《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⑧罗孝全:“广州浸礼会传道会1845年度报告”, *Strangers in the House*, Appendix No. 7.

⑨Lida Scott Ashmore,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A Historical Sketch of Its First Cycle of Sixty Years*,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1920, pp. 7—8.

⑩Issachar Jacob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 107.

⑪Ibid., pp. 107—108.

⑫王元深:《圣道东来考》,香港1907年版,第10页。

⑬《番禺县示》,道光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四国新档·美国档》,台湾“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 1986 年第 2 版, 第 85 页。

⑭ *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 108.

⑮ 义华业致耆英照会, 耆英致义华业照会, 见《四国新档·美国档》, 第 72—74 页。

⑯ 伯驾致耆英照会, 《四国新档·美国档》, 第 75 页; 后伯驾将罗孝全书籍文件之价值更正为 400 元, 同书, 第 76 页; 另据《罗孝全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美国对华外交》, 第 109 页所引伯驾致美国国务卿布坎南 (James Buchanan) 信, 双方核定的数目为 1400 元, “如果罗孝全所失文件和日记能够追回, 则可在这数字中再减去 400 元。” 则当时将 1000 两折合为 1400 元。

⑰ 《四国新档·美国档》, 第 75 页。

⑱ 《四国新档·美国档》, 第 76 页。

⑲ 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 第 54—55 页, 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⑳ 《四国新档·美国档》, 第 76—77 页。

㉑ 同上, 第 77—78 页。

㉒ 同上, 第 86、100、104 等页。

㉓ 见同上, 第 87—88、101、106 等页。

⑳ 转引自 *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 110.

㉕ 《四国新档·美国档》, 第 120 页。

㉖ 参见 Te-kong Tong,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60*,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1964, PP. 100—103; *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 111.

㉗ *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 113.

㉘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60*, P. 116.

㉙ *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 114.

㉚ 《四国新档·美国档》, 第 134 页。

㉛ *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 115.

㉜ 《四国新档·美国档》, 第 137 页。

㉝ *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P. 117, 135—136.

㉞ *ibid.*, 117.

㉟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 第 142 页。

㊱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60*, PP. 249—250.

㊲ 《中美天津条约》第 11 款也只是规定: “大合众国民人在中华安分贸易办事者, 当与中国人一体和好友爱, 地方官必时加保护, 务使身家一切安全, 不使受欺辱骚扰等事。倘其屋宇、产业有被内地不法匪徒恐吓、焚毁侵害, 一经领事官报明, 地方官立当派拨兵役弹压驱逐, 并将匪徒查拿, 按律重办。” 并未有伯驾、罗孝全等“解释”的那种规定。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 第 91 页。

㊳ *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 119.

责任编辑: 郭秀文

宋庆龄与基督教

□ 盛永华

(中国文物研究所, 北京 100000)

[关键词] 宋庆龄 基督教 平等 博爱

[摘要] 由于家庭的关系, 宋庆龄青少年时受基督教的影响较大。后来她逐渐淡化了宗教的观念而强化了国家、民族及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博爱精神是她民主主义思想的元素之一。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070-03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较早便传入中国。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 亦有相当部分受到这种舶来宗教的影响。孙中山在少年时代就受过洗礼, 而宋庆龄亦复如此。在他们后来长期的革命生涯中, 基督教义中的平等、博爱精神, 成为他们民主主义思想的元素之一。

—

宋庆龄的青少年时代, 较为深切地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

她的母亲倪桂珍的先祖徐光启, 是著名的天主教徒。他在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研讨教义的同时, 亦向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并合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之后, 他陆续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介绍给国人。至于他的宗教信仰, 显然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 即借以“补儒易佛”而“教化风俗”。徐光启的后人几乎每代都有男性充当传教士, 有一些成员则改信了基督教。

宋庆龄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父亲宋耀如少年时代即随亲戚赴美国, 14岁受洗于北卡罗莱纳州卫理公会, 后入美国威尔明顿的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

神学, 一年后转至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继续研修神学直至毕业。1886年他回到上海从事传教活动, 两年后成为正式牧师。母亲就读于上海美国圣公会开办的培文女子高等学堂, 毕业后曾任教于教会学校, 毕生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

宋庆龄受教育的过程也与宗教相关。少年时代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 这是外国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收费的女子学校, 宗教课程及活动占有一定比例。她的大学生活是在美国乔治亚州附属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私人性质学院——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度过的。因之, 她的思想与活动在一定阶段带有明显的宗教印记, 博爱精神, 在她的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然而, 宋庆龄的家庭并非纯粹的宗教家庭。在宋庆龄出生的时候, 她的父亲已参与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母亲亦承担了秘密任务。曾受到善良的美国人民关怀、爱护和帮助而深信在基督面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宋耀如, 在神学院毕业后, 即初尝种族歧视的苦果。神学院及其所属教会的领导人拒绝他继续

留美学医(他希望在传教时也能满足劳苦民众治病的要求),令他马上返国。他在上海传教时,这种歧视变得更为赤裸裸,以至这位有美国学位的神学院留学生,只能在农村赤脚巡回布道;所得工资大大低于一般神职人员,绝对不足以维持家人的最低生活水平;他的许多合理要求,仅仅因为他的黄皮肤而被他的上司——美国卫理公会在上海的负责人林乐知——通通拒绝,他不得不同步时开办实业以维持生计。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对教义中描绘的美好天国的向往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祖国的残酷现实的矛盾,使他不得不思考探索通向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的真正途径。在此前后,他结识了正在为反对外国侵略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而斗争的孙中山。思想上的一致使他们很快成为挚友和同志。宋耀如的印刷所在印制圣经的同时,也印刷反清的革命传单。他的居所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地点。在创建和捍卫中国共和制度的斗争中,宋耀如长期追随孙中山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隐君子”。与孙中山一样,在宋耀如的思想中,平等与博爱成为基督教义与社会变革观念的交融点。

二

宋庆龄深受父亲的影响。他使她深信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正义性。当宋庆龄留学美国,浸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后,她更坚信孙中山是使封建专制主义长期君临的祖国通向平等、博爱的彼岸的导师。因之,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帝国并建立了共和制的时候,她欢呼这一“廿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宋庆龄天真地以为共和制度的建立即意味着国家和人民已获得了自由和平等,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促使博爱得以实现。她企望着自己祖国的人民

彼此以兄弟相待,因为“缺少了兄弟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她认为“博爱为自由、平等两者的基础”。而“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宋庆龄更多的是接纳基督教义中有关伦理道德的原则以及博爱的思想,而对于教义中其它部分及繁琐的宗教仪式却是比较淡漠的。她曾向友人述及在美国学习时的一些情况:一到星期天“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生赶到教堂里去,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舍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爱泼斯坦:《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第50页)可见她对宗教并不迷信,只是作为自己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的一种精神寄托。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和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宋庆龄愈益淡化了宗教的观念而强化了国家、民族及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辛亥革命的迅速失败,使她不得不进行新的思索并作出相应的选择。她给自己一直遵奉的基督教教义所提倡的献身精神,赋予了时代和社会的内涵,不再仅仅认为留学生只应在教育及扫除社会陋习方面为国家尽力,明确认识到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要为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而战斗。虽然辛亥革命的果实已为大地主及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攫夺,孙中山再次成为流亡者而在国外惨淡经营,但宋庆龄仍然深信只有孙中山才能拯救中国。基督教义中提倡的平等与博爱,成为他们进行革命的武器。宋庆龄对于作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深为理解——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说来,社会革命就是把

基督教义付诸实施。”(《斯诺文集》I, 第 109 页, 新华出版社出版)

三

在宋庆龄的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 基督教无疑对她有过较深的影响, 甚至在她的晚年, 她仍然十分坦率地剖析自己, “在我的头脑中, 还残留着《圣经》的博爱思想。”但是在她追随孙中山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后, 她的宗教观念不断淡化, 科学与民主成为她思想的主流。与此同时, 她对于宗教的消极意义有了愈益深刻的认识。她曾不止一次以讽刺的口吻指出宗教的伪善: “因为我不去教堂, 传教士认为我不是基督徒了。但是, 他们说(蒋)委员长是基督徒。”而恰恰“正是信奉基督教的委员长把我们最优秀的青年活埋了。”蒋介石“应对所有的屠杀事件负责。……如果他也算是个基督徒, 我就不做基督徒。”(《斯诺文集》I, 第 103 页) 她指出在标榜自由、平等的美国, “美国人不让黑人儿童和他们的子女在同一个学校上学, 但是, 他们却称自己是基督徒。”由此, 可以看到宋庆龄从一个爱国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者的过程中对于宗教的认识与关系的演变轨迹。正如她的挚友爱泼斯坦所分析: “宋庆龄是个无神论者。……不能说基督教的思想对她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至少在二十岁以后, 她不信基督教了。”(《爱泼斯坦的证言》, 见《关于宋庆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载《辛亥革命研究》[日文版]第 4 号) 当宋庆龄在中国革命的潮流中奋进不已, 不断自我超越, 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以后, 合乎逻辑地将原来信奉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奉献等原则, 加以吸取改造和拓展, 赋予新的社会涵义, 使其成为谋求中国民族独立、为人民

大众谋幸福的彻底的人民民主主义和为全人类求解放的国际主义精神。

四

宋庆龄对于宗教的认识过程, 与孙中山有着十分相似之处。

孙中山曾在香港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拔萃书室读书时受过洗礼, 皈依为基督教徒。后来, 他在革命过程中愈来愈感到“余于耶苏教之信心, 随研究科学而薄弱。……颇感耶苏教之不合论理, 因不安于心”。结果, “大倾向于进化论。”([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 5 卷, 第 4 期) 他后来绝少参加宗教活动, 他的战友们几乎“永不见其至教堂一步。”但他在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真理、锻造自己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的时候, 却吸收了基督教教义中提倡的平等、博爱的精神。特别是在他的民权主义中, 博爱精神尤为明显。他认为博爱精神应理解成“为公爱而非私爱”, 因而应加以推崇而造就真正的平等、自由。基督教义已经被他“非神化”并赋予民主主义的内涵。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与宗教的关系上竟然如此相似, 其实并不奇怪。当中国的革命者们决心起来推翻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候, 他们必定要从外部吸取一切新鲜思想和理论, 加以改造, 为我所用, 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被爱国者、革命者们所掌握以前, 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以及基督教的博爱等思想理论, 曾经是反对封建主义的鲜明旗帜和口号。这种情况恰恰从一个角度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与多姿多彩, 并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律。

责任编辑: 郭秀文

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

——兼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

□ 蔡少卿 刘平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江苏 南京 210093)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3-0073-06

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由于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存在许多禁区。其中,工人运动与帮会势力之间的关系,人们更是讳莫如深。

这种现象,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引发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出现了转机。此后,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开始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土匪、帮会关系的一些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还经常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最近,刘明逵、唐玉良两位同志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面世,因为书中有些地方谈到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同样遇到了某些人的质疑。

我们认为,质疑者是从关心学术研究角度提出问题的,也许他们认为,揭示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有损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在此,我们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有关部分作一些评论。

一、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

在整个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作为“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帮会,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所有革命者所面临的一个艰难复杂的政治问题。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与帮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想避而不谈,恰恰是对唯物史观的嘲讽。

我们先从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谈起。在此,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行帮、帮口、帮会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长期地存在是客观事实;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开展工人运动,必须做好帮会工作,才能有效地打开局面。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帮会势力浸润于工人阶级队伍之前,手工工场、厂矿企业中业已普遍存在着行会、帮口。明清时期,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商人会馆、行业公所渐兴,它们是业主用祀神、义举、订立行规等手段团结成员的组织。随着雇佣劳动的扩大,

在雇工中也出现了行会组织,一般称为“行帮”。行帮的功能主要是为了维护雇工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同雇主发生矛盾、开展斗争,另一方面又同其他行帮或帮外的雇工以及“潜在的雇工”发生矛盾、冲突。①尽管行帮组织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产物,但它与雇主的矛盾、斗争作用,使之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情况下向工会转化。

帮口是晚清以降城镇工人中的一种地域性组织。拿全国工业中心上海来说,工人大都以地缘祖籍来划分,如安徽帮、宁波帮、广东帮、湖北帮、苏北帮之类。即使是同一行业,也是帮口林立,如20世纪20年代初的汉口铁路工人中,有所谓湖北帮、福建帮、安徽帮、江南帮等。这种组织,按照邓中夏的说法,“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②

由于生存土壤适宜,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上述封建行帮、帮口都未衰减灭绝。相应地,他们与帮会复杂交织,在近现代工人运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主题与篇幅所限,我们在此主要论述帮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

中国帮会最初主要活跃于广大农村地区。迨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南的三合会、三点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中下游地区以“红帮”闻名),运河沿线的青帮,在广大城乡地区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这种状况与中国日益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进程是一致的——一方面,由于外国侵略、兵燹、苛政、灾荒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经济凋敝,农民大量离村;另一方面,在沿海及华中等地区,

一批近代化城市兴起。在城市无产阶级发育成长的过程中,各种帮会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及其它地区的工矿、运输业中伸展触角,发展势力。

由于近代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性,以及城市行业多种多样,竞争剧烈,人群庞杂,流动频繁,统治者力量较强等因素,决定了城市帮会有许多不同于农村帮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 分布范围更加广泛,系统更为庞大。如上海、武汉等地的青红帮,上至官府,下至里弄,从工厂码头到摊贩商店,从赌场戏馆到澡堂妓院,无处不有他们的势力。2. 分帮分行,各分地段。这种情况与原有的行会、帮口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3. 组织严密,帮规复杂。4. 具有更强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就城市帮会的社会功能来说,除一些基本点与农村帮会相同外,它在为帮中失业者介绍职业,以及在开展经济斗争等方面,也还有某些特殊的作用。③

民国年间,城市帮会势力之强大,我们可从以下一些数据得到印证。据1930年国民党方面的调查,人口并不多的芜湖市,青红帮分子的总数有二三万人,大多散布在水陆运输和码头苦力工人之中。青红帮势力最大的上海市,据《时报》1914年的报道,仅红帮已达数万人之多。青帮的人数更多,1920年,上海的青帮人数在10万以上。据1930年中共上海市地下党组织对上海的棉纺、丝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机器等22个产业及各业职工的基本状况的调查,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织以外,多数产业部门的工人中都有青红帮组织。像棉纺系统,男工十分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④中国工人队伍中包含了大量的帮会分子,帮会组织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工人

队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工人运动一直是它关注的重点。1921—1927年的情况更是如此。但是,这项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重大困难——与欧美工人运动情况不同,中国工人阶级中基本上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有的只是行帮、帮口和帮会这类固有团体。这些封建地域性质的帮口和封建宗法式的帮会,直到现代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依然拥有极大的势力。因此,如何排除工人中的帮口矛盾和帮会障碍,重新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进行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成了摆在年轻的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与此同时,中外反动势力非常注意利用帮口、帮会组织尤其是它们的头目,以达到控制工人群众、破坏工人运动、镇压罢工斗争的目的。大革命时期上海青红帮组织的“中华共进会”,解放战争时期杜月笙、向海潜、范绍曾等人组织的“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就是统治者利用帮会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凶恶工具。

那么,如何排除帮会障碍呢?从现代工人运动的实践来看,中共对于帮会及其头目的策略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总的来说,其主要方法不外乎两种:1. 派共产党员亲自加入帮会,“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当小兄弟,先低头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如李启汉在上海开辟工运。^⑤2. 争取、利用工人中的帮会头目。如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中,李立三动员红帮首领与罢工配合行动;在“二七大罢工”时期,包惠僧、陈潭秋积极争取汉口铁路工人中的湖北帮首领杨德甫、江南帮首领黄桂荣等,使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罢工风暴迅速掀起。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开展工人运动,如果忽视中

国工人中帮会势力,不注意排除帮会势力的障碍,单方面去搞工人运动,往往遭到失败。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成功与否、进步与否,往往与帮会、帮口障碍排除得如何有着直接关系。如果说,以往的工运史研究,人们忽视和回避这一点,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那么今天,我们就完全有必要正视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

二 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可行性

既然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与帮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一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条件。

第一,文献资料不断结集出版,研究力量渐趋成熟。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开展工人运动的各种文献资料不断公布,有关回忆录、文史资料、厂矿企业历史资料的出版也令人鼓舞。值得注意的是,各级档案馆有关档案的开放,为我们了解当时政府、警察机关的态度和行动步骤提供了窗口;当时的报刊杂志如《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向导》等相继影印出版,也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线索。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各级工会组织、有关科研院所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完全有可能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这类曾经为人忌讳的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第二,国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在中国学术界将工人运动史仅作为政治史和革命史来研究的时候,欧美及日本的一些学者即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研

究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了,如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所著《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一书,主要是从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等方面对工人运动进行深度研究的。⑥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于1993年出版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该书共分地域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三大部分。作者在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和政党等问题的同时,还运用“新工人史”(“new labor history”)观点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结果,“作者得以成功地探索社会反抗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⑦其视角、方法、论证的新颖独特,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广泛声誉。澳大利亚学者布赖恩G.马丁则从青帮大亨杜月笙入手,对青帮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作了精彩的个案研究。他认为,1932—1937年间,尤其是1934年后,杜月笙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调整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产阶级,以及劳工组织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⑧他们的某些观点尽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仍然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借鉴。

第三,可以将帮会史研究的成果引入工运史研究。在中国帮会史研究领域,近20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已经作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方面,蔡少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会党问题概述》⑨当不失为一篇拓荒之作。其后,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才赋著《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也都论及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们是从“帮会史”角度开展研究的,但是他们所揭示的帮会与工运关系的成果,可以充分借鉴利用。

第四,我们已经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大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践证明,思想的禁锢,人为的禁区,只能将学术研究带入死胡同。不可否认,在研究中,人们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只要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错误,研究出来的东西能够总结历史的规律和经验教训,那么,任何疑团都不难化解。

三、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评价

如果将日人长野朗于1925年所著《支那劳动者及劳动运动》(北京燕尘社)视为最早的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专著的话,70余年来,对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研究,尽管艰难曲折,仍然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立三、邓中夏、刘少奇等人不但亲自领导工人运动,还撰写了不少足以指导当时、遗教后来的工运史论著。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遇到了很多干扰,工运史研究依然独树一帜,成果喜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刘明逵、唐玉良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得以出版。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该书都引起了出版界、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工人运动史》凡六卷,洋洋250余万言。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看,这套书包含内容之丰富,是屈指可数的。同时,它大量运用第一手资料,充分吸收国内已有的工运史研究成果,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壮大、对中国工人运动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对中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都作了清晰的、历史的叙述。它给人们的基本感觉有两点,一是自始至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突破了旧的框框,勇闯禁区,对许多有争议的人与事作了客观公正的论述。应该说,这套书将工运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对这套

书作出全面具体的评价不是本文的旨趣,我们相信,有关专家和读者会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这里,只想就该书对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论述谈些看法。

列宁曾经指出,“唯物主义者任务是正确地 and 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⑩既然在历史上中国工人与帮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末,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就不能回避它。本来,这个问题,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的论著中,并不避讳。如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开篇就是讲“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行会、帮口、秘密结社诸问题。国民党工运史专家马超俊在所著《中国劳工运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年),也用了相当篇幅叙述帮会之对于工运的影响。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许多人出于政治压力,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进而成了研究的禁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在,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敢于突破禁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是值得称道的。书中对共产党排除困难,将工人运动与帮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有关论述不但无损于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而且从深层次说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复杂性、艰巨性,概括了中国工运不同于外国工运的特点,从新的角度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这正体现了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

当然,从书中叙述的有关内容来看,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该书第一卷第五章第二节“早期工人中的秘密结社”用了43页(第495—537页)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主要致力于“帮会”源流的叙述,而在帮会与工运的结合点上,却着墨不多;即使在有限的探讨帮会与工运关系的篇幅中,作者实际上引用的大多是后来的史料,与“早期”有冲突。据我们

所知,“早期工人运动”一般指的是中共创建或“五四”运动以前,如何协调这种前后关系值得注意。再比如,作者在上述第一卷有关章节中提出该问题,就有必要在其余各卷中适当穿插,而实际上却显很薄弱。此外,当时的其它政治派别尤其是国民党也十分注重利用帮会,帮会势力成了它们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一个得力工具。这一点,在书中似乎也未有很好的反映。

所以,我们认为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论述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够不够、深不深的问题。

顺便还应指出,从政治史研究角度而言,该书的成就值得肯定,但从社会史研究角度来说,该书还有深入探索的必要。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研究勃兴,其理论与方法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在工运史研究领域,这种“影响”似乎既缓且微。如果继续用旧的眼光、旧的框架去研究工运史,就难以取得更多的突破。诚如刘大年所说:“现在民主革命胜利、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只是简单地重复原有的正确道理,就显得缺少了什么,不教人贻足。”^⑪如何“整体”地再现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历史面貌,将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已成为工运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诚然,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若干时间以来国内外同类题目中一部值得注意的书”(刘大年语),在许多领域有所突破,但我们认为,作者还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作进一步的研究,如工人阶级的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等。该书卷帙浩繁,但相当的篇幅在于描述政治背景,尤其是中共的会议、决议等内容,在谈到工人运动本身时,多侧重于“过程”的描述。实际上,工

人阶级的形象并不是单纯的“苦难—反抗”构成的。上引谢诺的著作就专辟“社会与文化生活”一节,他说“有些工人家庭尽管很穷,但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宗教习俗,观音像或其他杂糅不同教派教义的神像被悬挂在主屋或仅有一间屋子的墙上。他们还非常热衷于在节日期间演京戏,舞狮子,耍龙灯”。^⑫同样,上引裴宜理著作也辟有“民间文化”一节,对上海工人中的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烧香拜佛等行为作了研究,她提到:上海“许多丝厂女工都爱唱越剧”。对于工人中的结拜习俗,作者认为:“兄弟结拜、姊妹结拜与秘密结社有助于为这些如同无根浮萍的工人们提供某种社会认同感。”^⑬确实,如果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等方面有深入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他们的心态、价值取向、他们本身在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正反作用,等等,从而使工运史研究更加丰满,更加生动。一句话,工运史研究完全应该借鉴其它学科尤其是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开展研究。

从总体来说,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一部成功之作,衷心希望她的作者们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①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4页。

^②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页。

^③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7—28页。

^④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4页。

^⑤《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6—67页。

^⑥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 - 192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英译本)。该书原版为法语,1962年出版。

^⑦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⑧澳)布赖恩 G. 马丁(Brian G. Martin):《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1927—1937)》,载《历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5期。

^⑨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330—370页。

^⑩《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第1版,第143—144页。

^⑪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刘大年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⑫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P107.

^⑬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PP. 187-188.

责任编辑:郭秀文

互证以求真

——试谈《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之史料运用

□ 董少新

(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3-0079-03

蔡鸿生先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虽然是一部“早孕而难产”的著作,但正因为如此,它堪称是近年国内史学著作中的“罕见珍贵儿”。在这部“谈胡说番”的作品中,蔡先生精益求精,以卓著的才识,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使得一部不到三百页的著作,给人以厚实之感。

季羨林先生在《序》中有云:“他(蔡先生)使用资料必求其完备详实,论证方法必求其周密无隙。”这既是对蔡先生治学态度的高度评价,也是对蔡先生书中一贯恪守的互证原则的客观评价。本文试就蔡先生此部著作中史料运用的互证原则,谈谈自己粗浅的学习心得。

蔡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所运用的文物史料,包括古城遗址、墓志、碑刻、古钱币以及各类出土文物;文献史料包括中国历史文献(如正史、政书和相关专著等)、外国文献(如俄文、英文、法文、日文乃至粟特文、突厥文等文献)和佛教经典。这些史料相互比勘与参证,构成了《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的史料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文献处于中心地位。文物和诗文均要与文献记载互证,在证明文献记载属实(有时是证伪)的同时,强化了对历史真实的阐释。只有在文献失载的情况下,才只用考古材料或诗文材料来证史。

文献材料是治史者的主要参考。但是,对于历史的方方面面,文献失载或记载错误、以讹传讹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的。如果文献上的记载,能够有文物的支持,那么此则记载就几近于真了。中国传统史学对文物证史一向重视,并有金石之学。陈寅恪在《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说:“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①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文物证史的范围愈来愈大,重要性也更加突出。蔡先生在《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使用了大量的文物史料。几乎在每一个问题的论述中,都有文物和文献两方面的证据。如果缺少物证或文献失载,则一一指出。^②

例如,在论述突厥社会家庭状况时,

蔡先生首先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游牧人中心父权制家庭出现的历史条件的科学论述,再考察突厥社会的具体情况。通过《太平广记》中有关记载和考古资料石制磨盘的互证,证明突厥妇女已沦为“操劳家务”的从属地位了。接着通过《隋书·突厥传》、《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和《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碑文记录,分析突厥家庭的亲属观念,不但证明了突厥社会中存在母权制的残余,而且印证了恩格斯“母权制的遗迹直到中世纪后期也还被发现”的科学论断。接下来引用新、旧唐书的有关记载,用实例证明突厥社会贵族妇女可敦“参政”的习俗。最后再利用《旧唐书》、《巴尔立克二号碑》及《新唐书·突厥传》的记载,证明突厥社会中存在着收养制和寄养制等母权制残余。通过以上文物与文献的反复论证,最终得出了6至8世纪突厥家庭的本质和特征:“它是带有大量母权制残余的父权制家庭。”这样的论述所得出的结论更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令人信服。

在将出土文书、碑刻等文物资料与文献进行互证时,蔡先生十分重视当时的译例。根据当时的翻译通例来考察文献记载与文书、碑刻记载,对考史,尤其是“正名”,十分重要。例如,关于康国袄教的记载,《隋书·康国传》称“有胡律置于袄祠”;《经行记》和《太平寰宇记》称神祠为“拔”或“跋”。对此,前人如丁谦、王国维、白鸟库吉等都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均未令人满意。蔡先生根据 Ferghana 译作“拔汗那”或“跋贺那”这一隋唐译例,提出《经行记》和《太平寰宇记》中的“拔”或“跋”似可求之于 $\beta - wnt\acute{y}'nk\acute{v}'s\acute{i}'ny$ 的第一音节。这样就向“袄”、“拔”的更近于真的解释,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蔡先生运用的诸多文物史料中,

有一类值得特别注意,就是古代图画。图画的艺术表现形式是艺术史的研究范畴,但其所表现的内容,却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蔡先生在以图证史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仅在上编就运用以图证史十多处,有片治肯特壁画、敦煌石窟壁画、出土石皿刻绘画等。例如,书中第36页,蔡先生运用敦煌第45窟的一幅画,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一段记载互证,说明脱离商队的胡商所面临的风险与威胁。

互证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是诗文与文献的互证。引诗入史,宋代即有,而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以诗证史、以史释诗,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陈氏以诗证史之法在蔡先生这部著作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书中引用了大量诗歌,仅上编就引有三十余首。此外,全书还引用过词、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以达证史补史之目的。这些都体现了蔡先生“向集部进军”的主张。^③

在《九姓胡丛考·服饰》一节中,蔡先生首先引用《全唐诗》中刘正言的一首《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从中概括出胡服的整个形制:“帽、衫、带、靴”。然后按此顺序,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逐项分析胡服结构。类似的例子还见于《九姓胡的贡表和贡品》一章,引《全唐诗》鲍防《杂感》一诗,从中引出贡道、贡期和贡品三大问题,然后再运用文物、文献和诗文等材料,对此进行逐一讨论,融诗于史,诗史一体。在讨论胡贡郁金香时,用《说文》、《本草纲目》来证明其宗教用途之外,又先后引用了李白、段成式 and 花蕊夫人的诗歌,来说明郁金香在酿酒、香衫和世俗礼仪方面的用途,使人读史与赏诗同步,犹如品味郁金之香。

陈寅恪治史重视共性真实与个性真实的分析。一则史料,不能因为个别地

方记载错误,就将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通篇虚构而一概抛弃。而要作具体分析,从“假”中分析出真实来。蔡先生这部著作中,对史料一贯采取谨慎分析的态度,通过互证,去伪存真。例如,书中第21页,蔡先生对敦煌文书伯希和3813号一则胡商判例的分析,指出尽管其出自虚拟,并无个性之真实,但其中却反映了九姓胡作为商业民族的特殊性格,具有共性之真实,故仍不失为珍贵的社会史料。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作为史料,也是因为文学作品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蕴涵着共性之真实。例如,蔡先生用《红楼梦》贾府门前那对石狮子作为狮在华夏家族化的一个例证;用晴雯、秋纹众丫头讥嘲一副媚骨的花袭人为“西洋花点子哈巴儿”这一情节,更生动地描绘了“通晓百戏”的哈巴儿的狗态。在上编《贡品类释》一节中,蔡先生用北齐志怪小说中的一段文字,来证明髹髹较髹髹工艺更为上乘。在《“饽饽”及其汉化》一节中,蔡先生用元剧《琵琶行》中以“米皮饽饽”充饥这一情节,来说明胡食饽饽已成为中华饮食文化中的一分子。对于史料短缺的研究领域,从集部发掘出的史料宝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在寻求史料中的另辟蹊径,对史料学本身亦意义非浅。

中外史料的互证是此部著作互证原则的又一重要方面,书中使用的国外材料,占有使用材料的一半左右。这也体现了蔡先生“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的治学眼界。

在中编《突厥事火和拜天》一章中,蔡先生首先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一段记载,与拜占廷史家狄奥菲拉特《历史》中的一段著录相印证,来说明“突厥事火无庸置疑”。在探求突厥事火起源过程中,首先通过对《周书·突厥传》记

载的突厥祖先之传说深入分析,寻出两条线索:到“索国”后裔的宗教迷信中寻找突厥时代信仰的遗存;从“突厥”一词的语义构成中挖掘“火”的因素。接着运用波塔波夫、伊凡诺夫和科诺诺夫等人在民族学、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拨开文献的云雾,把神话分解为历史”,得出了“突厥人拜火之俗,有它自己的起源史”这一崭新结论,相对于白鸟库吉所断言的“突厥事火是通过中亚昭武九姓向伊朗学习的”之说,蔡先生的结论更能反映历史真相。

陈寅恪曾郑重指出“吾国史乘”重考胡姓而忽略胡名。半个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改变。而国际学术界对粟特人名的研究已有长足进展。针对这种情况,蔡先生在探讨“胡俗”中之“胡名”时,先后借鉴和采择了蒲立本、里夫什茨、哈马塔、高本汉、亨宁、韦伯、拉德洛夫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爬梳穆格山粟特文书和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及中国文献,将其中胡名进行比勘研究,使中国的胡名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陈寅恪在评价王国维学术成就时说:“然洋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④可见,无论是王国维还是陈寅恪,对互证这一史学原则,都非常重视。而蔡先生在《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一书中所一贯坚持的互证原则,无论是在史料种类上还是在互证形式上,对互证原则都有所发展。

蔡先生所研究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这一课题,本属冷僻,资料极难收集。但是在蔡先生这部研究成果中,

论当代西方国家思想道德教育方法

□ 郑永廷

(中山大学理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 当代西方国家 思想道德 教育方法 方式 特点

[摘要] 西方的思想道德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 古代到 19 世纪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同宗教紧密结合而以宗教为手段, 19 世纪到二战期间是权威教育起主要作用, 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则受杜威、皮亚杰、哈特肖恩、霍尔等多个教育学派和学科的影响。因而, 当代西方的思想道德教育形成了不同于东方的许多特点, 如宗教方法的传承、学科方法的多样、教育方式的渗透、选择方法的自由, 并形成了道德认知发展、价值澄清、社会学习等主要的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3-0082-06

一、当代西方思想道德教育特点

1. 宗教方法的传承性

信奉宗教, 一直是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 伦理与宗教结合也一向是西方国家道德教育的特点。进入 20 世纪之后, 虽然西方国家改变了宗教教育的主导地位, 大力进行世俗道德教育的探讨,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当代西方道德教育就

是以反对宗教教育, 促进道德教育世俗化为特征的。然而, 在西方, 宗教与道德毕竟有血肉联系, 正是基督教最初规定了道德的基本准则, 确立了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 宗教教育也即道德教育。随着资产阶级民主的不断扩大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宗教与民主、科学发生了剧烈冲突, 一方面, 宗教受到了批判和限

仅尾注就有六百余条; 若将书中已注明出处之材料也包括在内, 则所引材料估计不下八九百条。著作中每一个小问题都有相当的史料支持。苏联史学家 E. M. 茹科夫曾说: “历史研究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史料不限于一种(如考古发掘的结果, 文献的利用, 等等), 而是使用了提供互相补充的信息的各种史料的总和。要把与某个过程或事件有关的史料配合在一起, 这种配合越是广泛, 越是形式多样, 研究者的结论便越可靠。”^⑤蔡先生以雄厚的史料基础, 保证了整部著作结论的可靠性。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第 1 版第 230 页。

②原著第 88、118 页就有两例。

③蔡先生曾在学术报告中强调, 在“经、史、子”向为史家所重的情况下, 要注重“集部”的开发, 到“集部”中寻找史料。

④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稿序》, 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第 219 页。

⑤E. M. 茹科夫著, 王王瞿译:《历史方法论大纲》,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 1 版第 206 页。

责任编辑: 郭秀文

制,世俗道德教育大发展;但另一方面,宗教影响并没因此结束。西方国家允许信奉宗教,利用教会为政府服务,在学校开设宗教课,系统传授宗教教义和宗教信仰。这种世俗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并存发展的状况,反映了西方社会现实与传统、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矛盾。

在西方国家,宗教还深刻影响了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如赫尔巴特的教育学理论和管理学生的方法,就具有明显的宗教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道格拉斯·麦格雷戈所提出的管理理论—X理论,也继承了一个类似原始罪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坏的,有好逸恶劳、逃避工作的特性。因此,对工人要采取类似于宗教的强制、监督、威胁、惩罚的办法,才能控制工人的行为。虽然麦格雷戈提出了与X理论相对的Y理论,但他也认为两种理论和方法都是有用的。因此,在当代西方国家中,宗教教育方法,仍然是道德教育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或者说,西方国家道德教育方法,具有明显的宗教性特点。

2. 学科方法的多样性

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从学科角度研究、探索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另一突出特点就是多样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学科开展对道德教育研究,理论与方法种类繁多。美国约翰·埃利亚斯指出:“道德教育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领域,仅仅通过一门学科来探讨这一领域既是有限的,也是危险的。”^①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主要有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宗教和历史等,尤其试图从哲学和心理学的结合上研究道德教育的理论与方法,特点突出,成果最多。如法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美国伦

理学家柯尔伯格等,都是从哲学和心理学结合上建构道德教育理论和方法体系的。道德哲学为道德教育提供概念、理论和目的,道德心理学为道德教育提供方法。此外,也有分别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如分析哲学家威尔逊,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贝尔,心理学家班图拉、罗杰斯、斯金纳等,都分别从哲学和心理学方面,提出了各自的道德教育理论和方法。同时,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还建立了道德教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各种关于社会、家庭、社区文化、大众传播媒介、学校等对群体、个体道德社会化影响的实证研究,更是五花八门。另外,在企业范围,对人们思想、道德、动机、行为进行研究的也有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心理学等学科。

第二,有关道德教育和思想行为控制的理论与方法纷呈各异。道德教育和思想行为的研究,不仅涉及众多学科,而且同一学科里,还有多种理论流派。如心理学领域对道德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或间接产生影响的,主要流派就有社会学习理论、人本主义理论、行为主义理论、精神分析学派、认知发展学派等。这些流派,既有各自的观点,还提出了各自的一套方法。在行为科学领域,就有人群关系论,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X、Y、Z理论,这些理论流派,各自都提出了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方法。它们都为道德教育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基础。

第三,选择、使用教育方法多样化。西方各国在道德教育与企业管理中,允许使用各种不同的理论与方法。一个学校,一个企业可以同时使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一个教师,一个管理人员,可以根据不同的教育内容,不同的管理对象,使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教育、管理方法的选择、使用不拘一格,多种多样。这

种多样性特点,反映了西方个人本位、自由竞争的社会本性。同时,理论与方法的繁多,也造成选择和使用上的混乱,容易导致道德教育上的相对主义。

3 教育方式的渗透性

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提出,对儿童的道德教育主要通过开展讨论,组织活动进行。亚里士多德也强调要在行动中,在实际练习过程中培养德行。当代西方的教育家、心理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反对向学生灌输道德理论和道德原则,而主张学生通过自主的理智活动和实践活动获得道德上的发展与提高。杜威根据他的教育理论,最先提出取消道德教育课,通过让儿童参与社会生活、结合业务教学活动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杜威的这种渗透教育方式,后来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像柯尔伯格的“新苏格拉底法”、“公正团体法”、价值澄清学派的“自由选择”、贝克的“反省方法”、“问题中心法”等,都是以个体参与和自主活动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促进道德发展的方法,都强调道德教育的渗透性。

在企业方面,企业对工人的道德要求和思想行为控制,更是通过技术、经营、财务、安全、计划、人事等管理来进行的。管理制度、程序和手段,规范着工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而思想、道德的表现则全面具体地渗透在管理中。

此外,西方还更多地继承了把宗教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的传统,采用隐性方式进行道德和思想的渗透与熏陶。渗透的途径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在各地建设纪念馆、艺术馆、博物馆、国家公园等多种场馆,动用现代化手段布设环境,形象生动地宣传资本主义传统与文明;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强大的大众传媒,把个人主义淹没在铺天盖地

的广告和文艺节目之中;通过遍布全国的宗教团体和广泛的宗教活动,把民众的宗教信仰巧妙地转化为对政府的顺从;按照资产阶级教育家提出的“教学的教育性原则”,发挥隐性课程作用,寓德育于智育和校园生活之中等等。西方国家教育渗透的这些特点,是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它显示了西方国家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隐蔽性、巧妙性。

4 选择方法的自由性

西方在道德教育方面由于存在科学方法的多样性,强调受教育者使用方法的自主性,因而导致另一突出特点——选择方法的自由性。因为学科方法多样,使用方法的自主性和选择方法的自由性,内在一致地反映了西方社会个人本位的社会性质。同时,选择方法的自由性,还直接与相对主义思潮影响有关。20世纪以来,西方兴起了相对主义认为,道德教育也具有鲜明的相对主义色彩。道德个人相对主义认为,在特定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都是相对的,不存在评判个人行为正当与否的客观标准。因此,对个人的行为和判断无法进行道德上的评价,或企图把社会或其他价值标准强加给个人的任何做法都是错误的。这种道德个人相对主义,强调个人价值的独特性和权威性,反对道德原则、规范和方法的传授,主张人们通过自由自主的选择来获取价值。例如,价值澄清学派的倡导者认为,道德价值是相对的、个人的道德价值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选择的产物;存在主义者认为,道德只能来自我们内心,人人都有绝对的自由把自己的价值赋予这个世界、赋予人的行为,教育所能做的至多只能是为提供各种选择的机会,让他们去自由选择。所以,道德相对主义实际上取消了道德教育,奉行的是放任的教育方式。

事实上,在道德领域,个人不论是确定道德认知方式,做出道德判断,还是选择道德原则,寻求行为依据,都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都要受文化、教育的影响,受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

二、当代西方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

这里只对当代西方的道德教育中影响较大、运用较广的方法略作介绍。

1 道德认知发展方法论

道德认知发展方法论是以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为基础建构的方法体系。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是美国道德教育家科尔伯格吸收了社威、皮亚杰的研究成果,于50年代创立的。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道德发展与认知发展有密切关系,认知发展是道德发展的基础,道德发展不能超越认知发展水平;道德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阶段进行的,儿童道德判断水平发展是有阶段性的;道德发展的本质动机在于寻求社会接受和自我实现,有赖于个体对社会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柯尔伯格提出了两种主要教育方法。

第一,道德讨论法。这是柯尔伯格早期提出的。它是通过引导学生对道德两难问题开展讨论,诱发认知冲突,促进积极的道德思维,从而实现道德判断发展的方法。在运用这一方法时,教育者按照一定程序实施道德讨论,一是根据柯尔伯格制定的道德判断测验量表测试学生的道德发展阶段;二是按测试结果分组,每组10人左右;三是选择道德两难问题;四是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讨论;五是对道德两难问题开展讨论、争论。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所讨论的道德问题,把握好讨论的方向。在讨论的深入阶段,要支持和澄清重要观点,引导道德水平阶段相近的学生进行观点比较,促进较低阶段的学生趋向较高阶段的推理,从而达到提高道德判

断水平的目的。

第二,公正团体法。这是柯尔伯格经过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之后,于后期提出的一种道德教育方法。这一方法十分强调团体的教育力量和民主管理的教育作用。其方法要点:一是在创设公正团体中培养团体成员的公正观,努力提高团体的公正水平;二是发展团体的民主管理,建立平等公正的人际关系,给每个人提供参与管理和承担责任的机会;三是创造团体的民主风气,形成相互之间的良好感染环境;四是发展团体中的自我教育,保证团体教育法的落实并取得成效。从这一方法同道德讨论法的比较可以看出,柯尔伯格从局限于儿童的道德教育扩展到社会团体的道德教育;从只重视道德认知判断,发展到重视道德行为二者结合;从根据形式特征界定道德教育,到重视道德内容的传授,他的道德教育方法是有所发展的。

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方法论还包括价值分析法、问题探讨法等。这些方法在西方运用比较广泛,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公正团体法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广泛运用后,提出了隐性课程设置与开发问题,这对于发挥学校和教师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颇有意义。当然,道德认知方法论在西方也不断受到批评,如过分强调道德认知、道德判断的作用,容易导致脱离实际;过分追求道德判断的形式,忽视了道德教育的内容;等等。

2 价值澄清方法论

价值澄清学派在西方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为适应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变的选择需要,于60年代产生。价值澄清学派提出了价值澄清的理论假设:人们处于充满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的社会中,这些价值观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发展,而现实社会中根本就沒

有一套公认的道德原则或价值观。根据这一假设,价值澄清学派认为,教师不能把价值观直接教给学生,而只能通过分析评价等方法,帮助学生形成适合本人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正如价值澄清学派的基尔申·鲍姆所说的,价值澄清可被定义为利用问题和活动来教学生评价的过程,而且,帮助他们熟练地把评价过程应用到他们生活中价值丰富的领域。

在运作过程中,价值澄清方法论强调四个关键因素:一是要以生活为中心,主要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二是要接受现实,即原原本本地接受他人,不必对他人的言行进行评价;三是要求进一步思考、反省,并作出多种选择;四是培养个人深思熟虑地进行自我指导的能力。除了要考虑这四个因素外,还要按选择、珍视、行动三个阶段,七个步骤(即自由选择、从多种可能中选择、对结果深思熟虑的选择、珍惜爱护自己的选择、确认自己的选择、依据选择行动、反复地行动)来进行操作。当这种操作模式由于过分强调价值观形成的个体性,忽视社会文化作用而受到批评之后,价值澄清学派又对以上程序进行了补充,加了思考、沟通的环节,在选择中考虑了社会因素的制约。尽管如此,新的操作程序并没从本质上改变价值观形成的主观性与个体性。

价值澄清方法论结合实际,设计了价值澄清的具体方法,除交谈、书写、讨论、预知后果的扩展等四大策略外,还有19种其它策略。如价值表书写策略,就是为那些不适于讨论,便于人们书面自由作答的问题设计的。受教育者在表格中填入问题,写出自己的看法,再按七个步骤进行评估。由此来帮助受教育者选择、确立适于自己的价值观念。

价值澄清方法在西方各国传播很快,应用较广,对西方现代道德教育影响

较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方法重视现实生活,不是像其他道德教育流派一开始就以一种哲学理论为依托,而是针对西方无所适从的道德教育实际提出来的,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因而受到人们的欢迎。但这一方法论的局限和错误是明显的:一是把相对主义价值观作为方法体系的基础,把个体经验作为确定价值观的标准来衡量和评判自身的社会行为,否定社会的客观价值标准,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成员各行其事。二是忽视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要求和道德行为的培养、训练,也易导致形式主义。

3. 社会学习方法论

社会学习方法论是以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的一种道德教育方法体系。社会学习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班图拉、米切尔等人,吸收认知发展理论的某些观点,从行为主义心理学中演变发展而来的,也叫观察学习理论和认知——行为主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观察学习是行为获得的基本学习方法,认为学习既是反应过程,也是认知过程,还是自我调节过程,人的复杂行为就是通过观察、模仿、再经认知过程而逐步形成的。社会学习理论注重强化的学习意义,认为人可利用外部直接强化从环境中学习,可利用替代性问题强化观察他人行为进行学习,还可利用自我强化,从体验自身行为的可能结果的预期中学习。社会学习理论还创立了自我效能理论,即强调建立有利于学习的道德环境和心理调节机制,为更好、更多的学习创造条件。

社会学习论者根据上面这些理论,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方法,其中两个方法比较突出。第一,示范榜样方法。班图拉认为,榜样对发展道德倾向具有重大影响,示范榜样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在现实社会中示范榜样是广

泛存在的,不仅包括人,如家长、教师、同辈人等等,还包括文字符号、图象信息、语言描述、艺术形象和环境,如大众传媒、学校气氛环境等。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利用示范榜样,引导帮助受教育者观察、学习、模仿、认同好的榜样。第二,强化手段。社会学习论者继承和发展了行为主义者关于强化的研究,把强化作为道德行为形成的重要手段。班图拉认为,行为结果,如成功、失败、奖励、惩罚等对道德行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为这些结果使人产生相应的期望,它使特定行为再现的可能性随预期的奖励而提高,随预期的惩罚而降低,前者为正强化,后者为负强化。教育者巧妙有力地使用强化手段,教育就可成功。

社会学习方法论还包括行为矫正、

文化传递等方法。社会学习方法把文化环境与人的道德发展联系起来,揭示榜样对道德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以及影响道德行为的形式与途径,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重视自我评价能力的培养,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它们在西方一些国家也被采用。这一方法论确立的理论基础,拼凑的痕迹比较明显;对社会因素、社会环境的界定,只是指人际关系和社会风俗习惯,没有涉及社会物质生产这一主要因素;而且具体方法缺乏操作的程序,实施有一定难度。

①J. Elias Moral Education: Secular Religion, P. 56.

责任编辑:陶原珂

当代外国教学思想述评

□ 吴 坚

(华南师范大学校办副主任, 广东 广州 510631)

[关键词] 杜威 布鲁纳 赞科夫 布卢姆 巴班斯基 教学思想

[摘 要] 本文评述了杜威、布鲁纳、赞科夫、布卢姆和巴班斯基的教学思想, 并认为他们的教学思想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外国教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088-05

当代外国的教学思想流派众多, 但我们认为杜威、布鲁纳、赞科夫、布卢姆和巴班斯基的教学思想最具代表性, 以下就他们的教学思想分别进行述评。

首先, 分析杜威的教学思想。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理论家和心理学家。19世纪下半叶, 在欧美, 随着工业和经济的日益发达,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知识总量的成倍增长, 客观上对传统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杜威在教育理论中对这种要求作了充分的论述, 他认为, 再也不应该“把教学看作把知识灌进等待装载的心理的 and 道德的洞穴中去填补这个缺陷的方法。”

①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儿童的智力和具体操作能力, 培养有创造精神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杜威从他的经验论、本能论以及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 结合当时心理学的成就, 对形成训练说作了具体分析, 他十分重视观察力的培养, 要求学校和教师为学生选择适当的观察材料。他还提出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杜威在自己的教育理论基础对发展儿童智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进行论述, 同时, 对传统的教育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在教育思想史上是一个引人注意

的问题, 在当时也是客观的需要, 这些意见对教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杜威在教学理论中除了提出“智力说”外, 他的“提倡活动作业课程”理论也是影响很大的, 他对传统学校课程作了尖锐的批评, 并提出自己的“活动作业课程。”他说:“以‘机会均等’为理想的民主主义, 要求一种教育, 这种教育要把学问和社会应用, 理论和实际, 工作和对于所做工作的意义的认识, 从头就融为一炉, 并且大家都一样。”②杜威就是据此理论和结合儿童的特点及学习需要, 试图进行他的“活动作业课程”这种“新型教材”的工作。杜威企图把儿童的活动和社会目的, 儿童经验中的理智方面和实践方面通过作业有机结合起来,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解决问题, 而是走了极端, 认为“除非是活动的结果, 别无真正的知识。”对于杜威的课程理论, 几十年来有过各种批评, 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它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要正确估计社会、儿童、知识系统等几方面的因素对编制课程和教材的意义。此外, 杜威非常注意发现式的学习方法。传统教育认为知识与技能是一种既定的事实, 教学就是传授和灌输这种知识技能。杜威针锋相对地指

出:为灌输知识而组织起来的教学方法都是不好的,把结论告诉儿童,“这对于儿童没有什么教育价值。”③杜威反对知识灌输,主张“启发式的教育方法”,以便儿童“掌握处理经验中各项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积聚许多现成知识。”④杜威还强调,在发现式的学习中,他所注重的是创造精神。所谓创造,不是要儿童去创造科学的原理和事实,他们虽不能成就由成人、科学家、高等学校学生立足点看去的那种发现,但是只要能真正的学习,他们也能成就由他们的立足点看去的发现事业。⑤杜威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要求进行教学改革,采用发现法的学习方法,让儿童主动地探索和积极地思维,从而培养儿童的创造精神,使儿童从小就接触科学研究的方法,这是合理的,但杜威离开系统科学的学习来讨论发现法,把它作为唯一的方法,基本上否定了复现法——讲授法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学生独立探索的作用同教师的讲授知识、指导与训练学生智力活动的必要性割裂开来,这又是片面的。尽管如此,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教学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教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教学方法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杜威“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中关于“发现法”的讨论,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综观杜威的整个思想,虽然他的教育理论是实用主义的,其哲学基础是唯心的,但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教学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符合教育规律的合理性。

其次,分析布鲁纳的教学思想。布鲁纳是美国著名认知派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主任。他十分重视把心理学的研究和教育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应该把学习理论的研究成果在

课堂中付诸实践,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教学论的教学理论。我们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来分析布鲁纳教学思想的内涵。教学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研究教学理论首先必须予以回答的基本问题。布鲁纳是认知发展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陈述知识和发展各种能力的双重任务学说,认为教学不仅应使学生学习和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获得优良的学习成绩,还要帮助每个学生获得最好的智力发展。在发展学生什么智慧能力的问题上,布鲁纳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过去在教学中只重视发展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今后应重视发展直觉思维能力。布鲁纳说:“机灵的推测、丰富的假设和大胆迅速地作出试验性结论——这些是从事任何一项工作的思想家极其珍贵的财富。”关于教学目的,他还提出了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强调让学生亲自经历知识之成为知识的过程。他说,学生“学习如何学习”本身要比“发现什么”来得重要,只要他们学会如何学习,将来便自然有机会发现什么。关于教学内容,布鲁纳认为,任何教学理论总是要涉及课程问题,课程问题总是要涉及到教学内容问题。他说,如果说教学一定要让学生学到些什么的话,那么,“不论我们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布鲁纳所说的学科基本结构主要是指每门学科中的主要命题、大概念或基本原理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由这一套主要命题、大概念或基本原理便可导出许多有关的知识。他不只要求学生理解学科的基本结构,还要求学生掌握研究这一学科的基本态度或方法。布鲁纳在60年代提出这个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至少他引出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些课题,如某些学科的哪些概念

是基本的,教材到底应该如何编写等。布鲁纳的教学方法也是他教学思想中的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他强调教学要考虑学生认知发展的阶段。他认为,教学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而“在发展的每个阶段,儿童都有他自己的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的独特方式,给任何特定年龄的儿童教某门学科的任务,就是按照这个儿童观察事物的方式去表现那门学科的结构。”布鲁纳教学方法,称“发现教学”,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学习方法,是在教师引导下“发现学习”。布鲁纳说:“发现不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布鲁纳并非发现法的创始人,但他比任何人都善于抓住发现的精神,为之提供理论基础,并把它传播开去。他认为,采用发现法的好处很多,它能不断地提高智慧并发挥其潜力,增强学生对学习过程本身的兴趣,使学生学会科研的方法,同时还有利于巩固对知识的记忆。事实上,发现法太费时间,且教师难以掌握,凡教学必用发现法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启发学生对所要学习的东西的兴趣”,也是布鲁纳教学方法之一,布鲁纳说:“美国今天的教育,重新强调追求优异成绩……这不但同我们教什么有关系,而且同我们怎样教和怎样引起我们学生的兴趣也有关系。”布鲁纳把儿童学习的各种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是寓奖赏于活动本身之中或者活动成功结束之中的动机,外部动机是指奖励、竞争之类的外在刺激。布鲁纳认为,学习的最好动机乃是对所学材料本身的兴趣。他建议增加教材本身的趣味,使学生有新发现的感觉,把必须要说的东西转化成为儿童思维的形式,以启发儿童对正在学习的东西的兴趣,

并随之一般地发展他对智育活动的适当的态度和评价。我们认为,内部动机固然重要,但社会与家庭的要求、教师的评价、奖励与惩罚等推动学生学习的外部因素对学生的学习也起着激励的作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认真研究学生的各类学习动机并善为引导,使教学顺利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三,分析赞科夫的教学思想。赞科夫是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是当代著名的前苏联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缺陷儿童学家和教学论专家。他毕生的精力主要放在教学论的研究上,他热心于研究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相互关系,并成功地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机地应用到教学论的研究中来。赞科夫并没有讨论教育学或教学论的全部问题,他只是以“教学与发展”为课题对改革小学教学进行实验探索。他在教学目的、教学原则、课堂生活、教师工作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以唯物辩证法为教学论的指导思想。他把从学生和生活实际出发,和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作为教学论思想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赞科夫在谈到教学目的时指出:教学旨在促进学生的一般发展和学习。所谓“一般发展”是相对于某一门学科或某一组学科引起的独特的发展(即“特殊发展”)而言的,指的是由各门学科引起的共同一致的发展,是学生身体和心理的全面发展,即包括了智力发展,情感、意志、道德品质、个性特点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展及身体的发育等各个方面,是所有这些方面“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由旧的质状态到新的更高的质状态的上升运动,更新过程,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死亡。”^⑥赞科夫打破了教学实际上只传授知识、技能和技巧相联系的旧模式,把教学同发展联系起来,建立了一套新的

教学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掌握知识和技巧的能力,把教学推上一个新阶段,这是教学论中一次根本性的改革。根据以教学促进发展的主导思想,赞科夫在长期的实践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指导各科教学工作的五条“教学原则”。即以高难度进行教学的原则,以高速度进行教学的原则,理论知识起指导作用的原则,使学生理解学习过程的原则,使全体学生都得到发展的原则。赞科夫指出,以上这些原则各有其作用,同时又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整体。它的特点是强调培养学生学习的内部诱因,并在保证共同的思想方向性的前提下,给予个性以发挥作用的余地。研究课堂教学是教学论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课程的结构、类型以及怎样备课和上课等这些问题,人们已谈得很多,赞科夫不重复前人的提法,他提出“课堂上的生活”这样一个小学课堂教学方面不大为人注意的或者完全没有探讨过的问题,这也是他独到的一种教学思想。他认为“如果真正的、广阔的生活冲进教室的门而来到课堂上,教室的天地就开阔了”。赞科夫的教学理想是:儿童在课堂上应该过着一种积极的、有血有肉的、甚至可以说是沸腾的精神生活——即真正的精神生活。赞科夫对教师的工作要求是: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所谓创造性,就是一种不断前进,向着更完善、更新鲜的事物前进的志向,并且实现这种已产生的志向。”^⑦他认为:“每一个教师身上都有一种创造性工作态度的火花”,关键是要点燃起教师这种创造性工作的思想火花。

赞科夫和美国的布鲁纳、西德的根舍因一同被国际上誉为“课程现代化”的三大典型代表,他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将自己的教改指导思想付诸长期的实验研

究从而确实创立了一套他自己的“小学实验教学体系”。

第四,分析布卢姆的教学思想。布卢姆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家。他在教学理论中侧重于教学过程的变革。他建树的基础理论是教育目标分类学,运用这个分类学强调教学过程中的评价的“形成性评价理论”,运用形成性评价理论使所有学生完全达到教学目标的“掌握学习”理论等,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布卢姆学派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将教育中应当达到的全部目标分为三大领域:由知识的掌握与理解及智力发展诸目标组成的认知领域;由兴趣、态度、价值观与正确的判断力、适应性的发展诸目标组成的情意领域;由各种技能和运动技能诸目标组成的精神运动领域。通过教育目标分类的尝试,雄辩地证明:一门学科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是可以作出由简单到复杂的一系列等级的分类的。以教育目标分类学为基础,布卢姆强调了教学过程中的评价——形成性评价,从而更新了教育评价的概念。布卢姆认为,运用教育目标分类与形成性评价,就有可能使绝大部分的学生完全达到教学目标,于是提出了为掌握而教和为掌握而学的“掌握学习”教学思想。“掌握学习”的基础是布卢姆的新学生观。布卢姆说:“只要提供适当的先前与现时的条件,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学会一个人在世上所能学会的东西”,而且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速度、进一步学习的动机等方面将会变得十分相似。^⑧对于掌握这种教学思想,要注意以下因素:学习者、教学材料、家庭环境和同伴小组、教师,因为这些因素是影响“掌握学习”的关键,因此,要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必须配合“掌握学习”的“反馈——矫正”程序,要围绕这四个因素,

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布卢姆的“掌握学习”是适用于学校教育的,有助于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学理论。它巧妙地采取了集体教学与适应个别需要的“反馈——矫正”程序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教学思想使学生不仅在认知方面得到发展,同时在情感等心理的其它方面也相应有了提高。布卢姆的这种教学思想是把传统的课堂教学改变成可以容纳他的新学生观的模式,适应普通学校,有普及性,跟传统教育不同,但又不脱离传统教育。

最后,分析巴班斯基的最优化教育教学思想。巴班斯基是前苏联当代一位颇负盛名的教育学家。多年来,他致力于教学教育过程最优化理论的研究,由此形成的教育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巴班斯基的最优化教育教学思想是寻求教学与教育的最佳方案,用辩证的系统方法研究教学教育过程,巴班斯基说:“学校这个有机体是这么复杂,对于它来说,所有环节的协调是如此的严密,以至稍微夸大其中的某一环节或对另一个环节估计不足,都会马上影响到效果。”^⑨换句话说,学校教学教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作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巴班斯基特别强调整体性观点、互相联系观点、动态观点等。如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巴班斯基说要以最小代价取得相对最好的教学教育效果。研究学生个性是最优化的最重要条件,最优化要在教师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实现,巴班斯基还强调说,为了实现教育过程最优化,应该运用教学过程最优化程序。巴班斯基的教育思想集中论述实现教学教育过程最优化问题。以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作为方法论基础并

吸取现代系统理论和相邻科学的研究成果,把辩证的系统方法引进教育理论的研究,对极其复杂的教学教育过程进行综合考察,以大面积提高教学教育质量作为努力的方向,坚持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尽管巴班斯基的教学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如:他对教学规律的揭示还不够深刻,对教学方法的分类略嫌繁琐,对教学形式的论述也嫌粗糙。但巴班斯基的“最优化”理论是对世界教育的一大贡献,他以最优化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在前苏联教育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性质和意义,在世界教育史上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综上述评,不管是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布鲁纳的“学科基本结构”说、赞科夫的“一般发展和学习”、“课堂课外活动相结合”理论、布卢姆的“掌握学习”教学理论,还是巴班斯基最优化的教育教学思想,他们的教学思想都自成理论体系,并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世界各国教学教育的发展,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外国教学思想。

①②③④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141—142、35、135页。

⑤杜威著,邹恩润译:《民主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61页。

⑥⑦赞科夫:《和教师的谈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251页。

⑧参见《布卢姆掌握学习论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⑨巴班斯基和波塔尼克合著,利兰译:《教育过程最优化问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1页。

责任编辑:叶金宝

东亚儿童文学百年回眸

□ 蒋 风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浙江 杭州 321000)

[关键词] 东亚 儿童文学 中国 日本 朝鲜

[摘要] 东亚儿童文学百年来走过坎坎坷坷的道路,遭遇战争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步履虽甚艰难,但终于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随着人类即将步入全球化的今天,它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尽管作为书籍形式的儿童文学日趋萎缩,但它决不会消亡。儿童文学可以在孩子们中间充当大使的角色,加强国际交流,有利于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人民从小得到感情沟通,增进了解,为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明天作出伟大贡献。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093-08

萌芽于民间文学

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其他如日本、朝鲜(包括韩国)也有着悠久的文学历史。但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独立形态出现,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产物。它大大晚于西方各国,也晚于本国的成人文学。

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总是和民间文学分不开的。在独立的儿童文学诞生以前,不是说儿童没有文学的需要,事实上,有儿童的地方就会有儿童文学。这种广泛意义的“儿童文学”就是人类祖先创造的口耳相传、不断加工的民间口头文学中能为儿童所接受的那部分,如民间口头文学中有不少是适合儿童年龄特征的童话、故事、儿歌、童谣、谜语等。最早的儿童文学作家,往往也都是从民间口头文学中得到启迪,从民间口头文学中选取适合儿童的素材加工而成。法国的贝洛、德国的格林兄弟就是代表,亚洲的情况也不例外。

在亚洲,儿童文学的萌芽,日本起步稍早,明治维新促使日本生产力迅速发

展,19世纪末就开始重视教育普及,这为儿童文学起了催生作用。被誉为“日本的格林”的岩谷小波(1870—1933年),是日本儿童文学的先驱,他为博文馆“少年文学丛书”写了第一本童话故事《黄金丸》(1891年)。该书一出版,他就一跃成为文坛名人。进入本世纪初,他不仅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进行加工改写,还以极大的心血编辑出版了《日本民间故事》、《世界童话》等丛书,树立了他在日本儿童文学界的权威地位。在他身边团结了一批有志于儿童文学的青年作家,如黑田湖山、生田葵山、武田樱圻、久留岛武彦、永井荷风、竹贯佳水、木村小舟等,他们以岩谷小波为核心成立了俱乐部式的木曜会,后来押川春浪也加入了。这个群体主要为博文馆出版的儿童文学杂志撰写童话,而这些作品也大多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加工创作而成。

稍晚于日本,中国也在19世纪末掀起启蒙运动,这是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直接驱动力和时代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半个世纪,列强纷纷入侵中国,

丧权辱国的惨痛事实,惊醒了中国人,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试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道德以至价值观念诸方面革新,在“开发民智”声中,提倡普及教育,把强国的目的落实到儿童教育,把儿童教育落实到新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因此,儿童文学随着儿童教育被提出而受到重视。商务印书馆从教育下一代的高度,早在1909年就由孙毓修主持创办《童话》丛刊。1909至1919年出版了由孙毓修主编的初集和二集共98册,其中孙毓修编写77册,沈德鸿(茅盾)编写了17册。其题材大多取材于中外典籍,不少间接来自民间文学,如《河伯娶妇》、《中山狼》、《女军人》、《除三害》、《红线》、《木马兵》、《点金术》、《狮子报恩》、《能言鸟》、《如意灯》、《大拇指》、《红帽儿》、《玻璃鞋》、《睡公主》等,严格地讲都不是创作,而是民间文学的改写。

在朝鲜,儿童文学的萌发又稍晚于日、中两国。19世纪末,它正处于李王朝封建的末期,西欧列强和邻国日本都虎视眈眈企图入侵,李王朝政权穷于应付侵略,内外交困,经济发展停滞。儿童文学直到20世纪初才在多种形态爱国启蒙运动中开始萌芽,《少年半岛》、《少年》先后于1906、1908年创刊。后者由日本留学归国的崔南善主编,后来还得到也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李光洙、洪命熹等人的协助,也刊载了一些取材于民间文学的作品,无疑也是受到日本的影响和启迪。到1910年8月,《少年》遭到当局封闭,崔南善等又创办了《红色巧克力》、《孩子的读物》、《新星》等杂志,虽也努力革新内容,但未能超出启蒙的范围,缺少有生命力的作品。

从日、中、朝三国儿童文学萌芽的历史看,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儿童文学都是在民间口头文

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

从西方译介 汲取营养

由于亚洲各国儿童文学起步比较晚,当人们开始认识到需要向儿童提供精神食粮时,除了一方面从本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寻找素材进行加工改写外,另一方面就是向儿童文学起步较早的西方国家借鉴,通过翻译以应急需。这是东亚各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另一个共同的特点。

在日本儿童文学萌发史上,与岩谷小波倡导从民间文学改写而成儿童故事(御伽噺)不同,另一支脉流是以严本善治和若松贱子夫妇为代表,以《女学杂志》为阵地的一支儿童文学翻译队伍。严本善治在1882年2月的《女学杂志》上开辟了《儿童故事》栏,就介绍了不少欧美儿童文学名作,如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等。严本善治夫人若松贱子翻译巴内特的《小公子》,也于1890年8月开始在《女学杂志》上连载,立即引起文坛注目,后来被日本儿童文学史家鸟越信教授誉为四大名译之一。另一名译的《十五少年》,是儒勒·凡尔纳的作品,由森田思轩译出,1896年3月开始在《少年世界》连载,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当年10月连载结束,便由博文堂出版全译本。

与此同时,岩谷小波、川田河山人、黑田湖山合译了《乞丐王子》(马克·吐温)、小松武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兰姆姐弟)、北田秋圃译的《小妇人》(路易莎·M·奥尔科特)、藤井白云子译的《小公主》(巴内特)等都是明治时代介绍到日本的西方儿童文学代表作。此外,富山房出版的《少年世界》也刊登了不少西方儿童文学作品,如土肥春曙和黑田湖山合译的《狼少年》等。坪内逍遥也动员其门下的文学家做了这一项具有

先驱意义的工作。这些西方儿童文学名著的引进,对处于萌芽期的日本儿童文学,在想象力、题材、内容、结构、文体以至伦理、价值观等都曾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铃木三重吉(1882—1936年)主编的《赤鸟》带动下,集结了一大批第一流的作家参与儿童文学创作,终于迎来了大正期儿童文学的春天。

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初期,也曾出现过译介西方儿童文学的热潮。阿英作过统计,从光绪元年(1875年)到辛亥革命(1911年)共译介出版了600多部外国小说,其中就有了不少西方儿童文学作品,如林纾译的《爱国二童子传》、《鲁宾逊漂流记》、周桂笙的《新盒谐谭》(其中包含《格林童话》)、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包天笑的《馨儿就学记》(即《爱的教育》)等。鲁迅、周作人兄弟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开始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鲁迅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周作人译介了王尔德童话。

五四前后,从西方译介儿童文学更是风行一时,特别是安徒生热。《新青年》1918年就专题介绍安徒生。1925年《小说月报》连续编印了两期《安徒生专号》。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和王蕴章主编的《妇女杂志》分别开辟了“儿童文学”和“儿童领地”专栏,源源不断地译刊了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梅特林克、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郑振铎、穆木天、赵景深、顾均正、赵元任、严既澄、徐调孚、陈伯吹等,都做了大量译介工作。这都反映了当时文学界普遍感受到儿童缺少读物,认识到中国需要向西方儿童文学学习、借鉴,借以促使本国儿童文学的成长。

朝鲜儿童文学也有相似的发展轨迹,只是在它起步之初,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不仅物质条件较艰难,且思想

被统治者禁锢,有良心的作家又不愿粉饰太平,因此在严重缺乏儿童文学创作的情况下,也多从事翻译改写、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事实上这也为后来朝鲜(包括韩国)儿童文学创作发展提供借鉴并起了促进作用。

从日、中、朝译介西方儿童文学的情况看,从思想内容到文学形式都对加速亚洲儿童文学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思潮

20世纪初,在东西文化碰撞中,东亚各国开始发现儿童,认识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纷纷借鉴西方、学习西方,加快了东亚儿童文学发展的进程。可惜好景不常,东亚儿童文学发展的机遇不久就被经济、政治等因素扼杀了。

从1927年春开始的日本经济危机,造成生产衰退,民生凋敝。日本政府为了摆脱困境,对外采取掠夺殖民地的政策,对内则加强镇压反抗。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诞生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这一文学运动,以《少年战旗》和《童话运动》为阵地展开,作为这一运动理论喉舌的楨本楠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后大部分收在论文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诸问题》(1930年)之中),主张将革命意识播撒在工农孩子的心灵。他从理论上否定赞美超阶级的儿童性的大正期儿童文学。尽管楨本楠郎所代表的这一理论,从其一贯性和构筑性上来讲,是明治时期以后各种儿童文学中最具系统性和高度的,但遗憾的是,在政治宣传优先于艺术性的理论指导下,除猪野省三、川崎大治等人少数几个短篇作品外,留下可读的作品不多。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帜下倡导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北斗》、《文学导报》、《萌芽》、《拓荒者》、《大众文艺》等杂志都刊登了不少儿童文学

作品和理论文章,与日本的情况相似,也由于过分强调政治宣传,忽视儿童文学本体的特性,因此有生命力的作品也不多。理论方面,鲁迅除提出散见于杂文、书信的主张外,对儿童文学的作用、意义、特点、创作方法以至插图方面,都有较为全面的论述,为后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立,构筑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创作方面,只诞生了张天翼这颗耀眼的明星。他的代表作《大林和小林》,从儿童的生活经验出发,用巧妙的艺术手法展开故事,刻划形象,说明了一个严肃的主题,但又丝毫不露宣传的痕迹。至今仍富有强烈的艺术生命力。

此外,巴金、老舍、叶圣陶、陈伯吹、董纯才等,在这时期虽也写出一些出色的带有社会批判性的儿童文学作品,但并非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旗帜下创作的。

这一时期的朝鲜,同样也受到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思潮的影响,如以《星之国》、《新少年》等杂志为阵地的无产阶级文学派,从比较强烈的阶级立场出发,在作品中反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倾向,也因为政治宣传高于艺术性的追求,又处于殖民统治的高压下,处境十分艰险,经过时间的淘洗,也没有留下多少值得肯定的作品。

上述情况说明:文学是无法摆脱政治影响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但是从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最根本的教训:儿童文学要发展、要繁荣,一定要按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办事。

二战期间的儿童文学

从1929年开始,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影响严重地波及日本。日本为了摆脱这一危机,有意向中国大陆扩张。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把下一代培育成“出色”的“战争后备军”,就有计划

地积极推行“儿童文化的国家统制”。

其实,日本儿童文学在思想上以侵略亚洲为目标的“极端国家主义”,可以追溯到明治时代的押川春浪(1877—1914年),他的武侠冒险小说《海底军舰》(1900年)、《日本武侠》(1902年)、《新建造的军舰》(1904年)等六部长篇,全都是充满军国主义侵略意识的作品,而且为他以后的中峰太郎、海野十三等创作的大众军事冒险小说开了先河,提供了范例。这些作家作品与30年代日本发动向中国大陆扩张的侵略战争,后又进而扩展到东南亚的侵略战争,从思想深处分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日本儿童文学史上值得深思的一页。

到1938年秋,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发布《关于儿童读物的指示纲要》,三年后,军国主义御用的日本少国民文化协会成立,儿童文学也被改为“少国民文学”,非肯定、赞美侵略战争的作品便不得出版。可悲的是连小川未明、北原白秋、吉屋信子等一批著名作家也走上了侵略战争的帮凶道路。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直接为强化法西斯意识和对外侵略扩张观念服务,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东西,也就没有艺术价值可言,却给日本儿童文学史留下了耻辱的一页。

当时的日本儿童文学,由于受大正期开始的《赤鸟》影响,富有诗意的文学性作品,如小川未明、浜田广介、坪田让治、新美南吉等人的作品还是处于主流地位的,但有的受军国主义统治思想影响,多少受到信奉神国日本的局限,甚至成了侵略者的帮凶。只有少数作家在烽烟弥漫中因寻找心灵寄托而执笔为孩子创作。如在战争后期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而成了亚洲唯一获得安徒生大奖的女作家松谷美代子(1926年—),在太平洋战争最为严峻的1944年被征入海军

水路部,在空袭的弹火下,“是活还是死?在战争情况下,只有在小便条本里写童话。”^①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心灵的安慰,也是一种感情的寄托。又如壶井荣(1900—1967年)于1944年出版的第一本童话集《葫芦花的话》,就有不少作品生动地描写了对和平的向往,流露了对战争的一种消极反抗情绪。

战争给中国人民,也给儿童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家仇重在他的《春风这样说》中,曾真实地记录过河北丰润县大惨案,日本侵略者把1000多名手无寸铁的群众赶进万人坑集体屠杀。贺宜在他的《野小鬼》中,也曾描写过日军进攻上海后残杀无辜的惨象。硝烟弥漫的中国,整个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正常进程被打断了,面临一个艰难的困境。但是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要生存下去,不能不关心下一代的抚育和教养,尽管环境恶劣,作家也无法静下心来在艺术上作锐意的追求,但为孩子们提供必须的精神食粮,还是不能遗忘。这一时期的作品质量虽不能令人满意,但创作数量还是不少的。其中也有少数受到小读者青睐的,如张天翼的《金鸭帝国》、老舍的《小木头人》、黄庆云的《月光的女儿》、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苏苏的《小癞痢》等。

在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处境比中国更困难。以“9·18”事变为契机,朝鲜总督府加紧了对朝鲜的奴役,几乎所有报刊都被关闭了,儿童报刊也不例外。取而代之的是以总督府为依靠由金素云主编的日文版《木马》,主要向孩子灌输皇国臣民化的思想。儿童文学已沦为贯彻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工具。进入40年代以后,朝鲜的儿童文学、儿童读物都被抹上了清一色的亲日色彩,能发表的全

是御用文学,如《少年国民进军歌》、《庆祝天长节》、《感谢皇军的辛劳》之类媚敌文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自由为孩子创作的权利已被剥夺净尽,有良心的作家也只得愤然搁笔了。

战后的儿童文学

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覆亡,拯救了日本人民,也拯救了日本儿童文学。许多在战争中站在军国主义立场和讴歌日本侵略者的儿童文学作家,受到全社会的谴责。而那些拒绝为侵略战争效力的儿童文学作家,则高举“民主主义儿童文学”的旗帜组织起来,成立了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协会纲领的第一条就是“民主性儿童文学的创造和普及”,他们成为战后日本儿童文学的中坚和主流,创作出版了《阿信坐在云彩上》(石井桃子1947年)、《缅甸的竖琴》(竹山道雄1948年)、《二十四只眼睛》(壶井荣1952年)、《谁也不知道的小小园》(佐藤晓1959年)、《树荫之家和小人们》(乾富子1959年)、《小卡姆历险记》(神泽利子1961年)、《不不园》(中川李枝子1962年)、《两个意达》(松谷美代子1969年)等等,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许多著名作品与战前作品比,在艺术性上提高了审美层次,在趣味性上加强了可读性,而且还呈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笔伸向现实深处,对社会和人生作出了作家的思考和探索。

同一时期的中国,开始由于国内的战乱,后又遭受十年浩劫,大大限制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六、七年中,蓬勃向上的政治社会氛围,曾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生态环境,有一大批优秀作品问世,如刘真的《我和小荣》、徐光耀的《小兵张嘎》、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臧向真的《小胖和小松》、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

《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的《“下一次开船”港》、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洪汛涛的《神笔马良》、柯岩的《小兵的故事》、郭风的《蒲公英和虹》、老舍的《宝船》、任德耀的《马兰花》、高士其的《我们的土壤妈妈》等,作家们以多彩的笔描绘了一个个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使这些作品发出耀眼的光彩和激动人心的力量。可惜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局面,很快受到政治的冲击,未能持续发展下去,十年“文革”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一场浩劫。

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台湾文学,1945年光复后,1949年就因政治的原因与大陆隔绝,儿童文学的起步更晚一些,一直到60年代,基本上还处于改编和翻译为主的阶段,只是杨唤的儿童诗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朝鲜1945年因日本战败而获得解放,但外来干涉使它长期处于南北分治的格局。这不仅给儿童文学带来灾难,也给朝鲜民族造成悲剧。在北朝鲜,儿童文学虽有发展,但缺少令人瞩目的作家作品。在南韩,儿童文学走过一段坎坷之路后,到70年代才进入发展期。

儿童文学的繁荣

从70年代开始,东亚各国经济先后开始迅速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儿童文学也进入繁荣期。

近20多年来,日本社会对儿童文学的认识有很大提高,儿童文学专业和业余创作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儿童文学设立了种种奖励(如赤鸟文学奖、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奖、野间儿童文学奖、岩谷小波文艺奖、讲谈社出版文化奖、小学馆文学奖、山本有三纪念路旁之石文学奖等数十种),儿童读物出版业兴旺,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的全集和著作集整理出版,战前的儿童文学古典杂志

相继翻印出版,古典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也被一再翻印问世,儿童文学更多的进入大学讲坛,学校、家庭、社区少年儿童读书和亲子读书运动普遍开展,儿童文学创作、翻译、评论、教学、研究组织及其活动十分活跃……这无疑都有助于儿童文学整体品位的提高。

近20多年来,由于日本经济推行高度成长政策并取得成功,更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也给文化手段带来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日本儿童文学向两个方向发展。一种是受市场经济支配,追随着大众儿童文化的儿童文学。出版商从利润出发,要求奇特、怪异、刺激、趣味性和故事性都强的读物。例如以《走吧,愉快的三个小伙伴》(1978年)开始的那须正干的《愉快的三个小伙伴》系列丛书之类读物,阅读起来轻轻松松毫不费力。山下明生著、杉浦茂画的《睫毛海上飞船》(1983年)、阪田宽夫诗、织茂恭子画的《小莎莎和老爷爷》(1984年)等,也是颇具声誉的作品。另一种是沿着纯文学的道路所确立的思想和文学信念继续不断追求的作品,如灰谷健次郎的《兔子的眼睛》(1974年)、黑彻柳子的《窗边的阿彻》(1981年)、杉乾子的《小镇风景》(1983年)、竹崎有斐的《逃兵》(1984年)等,都是受到人们称赞的优秀作品。

1984年获奖的《魔女快件到家》是日本儿童文学颇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作者角野荣子,1935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英语文学科。该作1984年获得“野间奖”和“小学馆奖”两个重要的权威奖,所表现的美学思想反映了时代的潮流。这部童话中所描绘的魔女是西方民间文学中的形象,快件到家(宅急便)却是当代日本社会的产物,既洋又土,融东西于一炉,既表现了这位女作家非凡的才华,也象征了今天儿童

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向。

中国进入 80 年代以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带动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的嬗变,儿童文学也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无论在创作、出版、理论研究、教学等领域都获得了可喜的收获。

中国儿童文学已经形成一支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创作队伍,中国作家协会 5000 多名会员中,以从事儿童文学为主的约 500 人。加上各省、市、自治区作协会员,儿童文学作者约有 4000 人。这支队伍中既有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郭风、徐光耀、任大星、萧平、柯岩、袁鹰、任溶溶、葛翠琳、洪汛涛、圣野、鲁兵、黄庆云、管桦、邱勋、金波、杨啸、孙幼军等,还有一大批中年作家如曹文轩、程玮、沈石溪、张之路、董天柚、董宏猷、陈丹燕、秦文君、梅子涵、周锐、冰波、彭懿、高洪波、吴然等,近年更有一批年青的作者如汤素兰、葛竞、庞敏、谢乐军、薛涛、张弘、邓湘子……加盟儿童文学。更为可喜的是,一直轻视儿童文学的观念,已在作家灵魂深处淡化。年前,明天出版社为了孩子出了一套“金犀牛丛书”,组织国内文坛一批大手笔,如张炜、王安忆、池莉、余华、刘毅然、陈村、莫言、苏童、铁凝、韩少功等参与其事,这些作家都是目前创作势头正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作家,他们都热心地为孩子们创作出称得上精品的力作。

目前全国共有儿童文艺报刊 120 多种,发行总数达 13 亿份,全国有 29 家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有 100 多家综合出版社设有少儿读物编辑室,每年出版的儿童读物有 4000 多种,发行数量超过 1.8 亿册。其中有不少受到孩子欢迎的作品,如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谢华的《岩石上的小蝌蚪》、曹文轩

的《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董宏猷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十四岁的森林》、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从维熙的《裸雪》、金曾豪的《青春口哨》等,其实在这里可以列出一长串书名,限于篇幅,只能略举一二作为代表。

进入 80 年代,特别是近 10 多年来,中国儿童文学还形成了一支有实力的研究队伍,成立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等一些学术团体,全国各地高校陆续设置了一些专门的儿童文学研究机构,理论园地开辟和设置也有一定的进展,研究、教学活动也较前活跃。

属于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台湾儿童文学,它的萌发、发展与中国大陆基本上同步,但由于政治、地理等原因,又明显具有它自己的特点。1945 年光复后,知识界对儿童文学并不陌生,但在 70 年代以前,还是处于播种阶段。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杨唤的儿童诗《童话里的王国》,蓉子的《童话城》等。进入 70 年代,台湾的经济、社会开始结构性变化,现代台湾儿童文学应运而生。其中最突出的实绩表现在儿童诗的创作,一批诗人如蓉子、林焕彰、薛林、舒兰、林武彰、林武宪、林清泉、方素珍等热心参与,并得到洪建全儿童文学创作奖、中山文艺奖等奖项的激励,并从儿童诗出发,推广到童话、儿童剧、儿童散文、少年小说等领域。

在台湾儿童文学作家中,林良是起步较早涉及面最广的一位著名作家,儿童诗、童话、小说、广播剧、散文、图画故事、理论研究,都有出色成果,一生从事儿童文学事业。他的观点和作品影响了台湾几代儿童文学作家,这种影响至今犹在,还在扩大。

推动台湾儿童文学发展的,除上面提到的各位外,人们当然不会忘记谢冰莹、林海音、潘人木、严友梅、林仲隆这几

位元老,也不能忘记马景贤、黄基博、杜荣琛、陈木城等这批热心的中坚力量,当然更会铭记李潼在儿童小说,黄海在儿童科幻小说、桂文亚在儿童散文、木子在童话等方面创造的业绩,更可贵的还有管家琪、孙晴峰等一辈年青人崛起。

朝鲜儿童文学兴起于1945年,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在清除殖民文化流毒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复苏。遗憾的是由于复杂的政治等人为因素,使朝鲜处于南北分治的悲惨境地。北朝鲜发展较滞缓,韩国自7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发展、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促进了儿童文学的繁荣。进入70年代以后,先后有《儿童文学》、《儿童文艺》、《儿童文学评论》等刊物创刊,并系列地推出《韩国儿童文学丛书》、《今天的儿童文学》、《优秀童话选集》等,培养了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如郑镇埰、曹大铉、朴淑姬、申铉得、金穆、李周勋、李永浩、方正焕、金锡镐、金英子等,全国现有儿童文学作家600多人。

儿童文学人才的培养已引起韩国社会的关注,全国已有五所大学开设儿童文学课程,还有一些教育大学都开设儿童文学讲座。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就是檀国大学的李在彻教授,1967年他出版了韩国儿童文学史上第一本理论专著《儿童文学概论》,曾引起国际儿童文学学术界的重视。1990年8月,由李在彻教授发起的首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在汉城召开,1997年8月又再次在汉城主持召开世界儿童文学大会(第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这不仅使韩国儿童文学进入一个新阶段,也为亚洲儿童文学的国际交流铺平了道路。

进入信息时代的儿童文学

在进入全球化的今天,新技术层出不穷。它已经开始并正在改变着人们日

常生活的机制,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变。国界仿佛在消失,时空观念在变化,资源特别是智力资源让人们共享,一个划时代的文化变迁正在加速,即从书籍时代到超文本时代,把人们引入一个变幻莫测的生活空间。

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其意义和作用都在萎缩。电视已在东亚各国普及,孩子们看电视、影碟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且开始有更多的孩子把时间花在电脑上。孩子已渐渐远离书本,原本用书籍提供的文化功能,正在被电视、影碟、电脑所取代。而且这新一代的“数字化了的年轻人”,他们并不使用互联网去进入安徒生、卡洛尔、王尔德……他们更迷信阿童木、奥特曼、狮子王之类,甚至更粗俗的《超短裙的特警队》、《警花出更》、《处女妈妈》之类大众文化。这类大众文化已成了世界范围的时尚。

另一方面,由于人类之间的传播和交流发展的结果,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包括儿童文学在内,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全球化的势头在这世纪之交正超速高涨,人类开始认识到和平才是生活的正常,战争是一种罪恶。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促使人类觉醒,信息革命不仅正在逐渐改变人类竞争的方式和态势,而且促进人类合作登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也为儿童文学带来一种新的机遇。

——由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主体创作儿童文艺将成为可能,成为现实且将越来越普遍。

——儿童文学的传播,将越来越多地利用全球信息设施,真正成为共享。

——在儿童文学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成为相互参照的镜子,人们不仅可以从本体文化出发去分析外来文化,而且可以借助异国文化认识自身的固有文化,从而达到推陈出新的目的。

台湾微型小说论

□ 赵 朕 赵 焱

(唐山师范学院教授, 河北 唐山 06300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 北京 100000)

[关键词] 台湾 微型小说 艺术 情节 手法

[摘 要] 本文认为, 台湾微型小说崛起的外因是“报禁”, 内因则与台湾社会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因而, 本文以台湾社会为背景, 进而深入分析、揭示了台湾微型小说的审美取向、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2000) 03- 0101- 06

台湾的微型小说的异军突起是一种历史机遇和文学选择的必然。70年代后期“台湾报纸处于报禁的限制下, 每日最多只能出纸三大张。联合报副刊于是率先推出‘超短型副刊实验’, ……以容纳更多内容并扩大作者群”。①1978年2月25日台湾《联合报》副刊首辟“极短篇”专栏。“联副”主编症弦亲自撰写倡导文章指出:“极短篇是一新尝试, 希望以最少的文字, 表达最大的内涵, 使读者在几分钟内, 接受一个故事, 得到一份感动和启示。”②他们的这个创举得到了《中国时报》和《中华日报》的响应, 也相继在副刊开辟“极短篇”专栏, 为微型小说鸣锣开道, 使之逐渐引起台湾文坛和读者的重视, 吸引了许多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参与创作。如著名作家杨逵、高阳、李昂、吴念真、袁琼琼、平路、非马、林

今开、苏伟贞等都涉笔投入, 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微型小说的创作水准。尤其是“联副”设立的年度“极短篇”文学评奖, 更为它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滋润的雨露, 使其愈益受到读者和作者的青睐。

其实, 台湾当局的“报禁”只构成了微型小说崛起的外在因由, 其内在因由则与台湾迈向都市化和进入后工业社会, 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化息息相关。由于都市化进程的影响, 台湾文学对现实关注的焦点发生转移。一些作家不屑于将自己的写作置于政治功利主义的麾下, 于是就注意从普通的平民生活中捕捉性灵的感悟与褒贬情愫, 写成微型小说, 以作者的情绪宣泄来激活读者的感情共鸣, “使读者在几分钟之内, 接受一个故事, 得到一份感动和启示”; 同时还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 大众休闲方

——对文艺创作、传播和鉴赏所施加的政治权力愈来愈困难, 这为儿童文学作家创造了一个更加自由的创作环境, 让他们发挥个性, 创作出有永久生命力的精品。同时, 也让接受者在鱼龙混

杂中锻炼鉴别能力, 提高审美水准。

东亚各国儿童文学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十分相似。摆在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面前的是何去何从的问题。

责任编辑: 陶原珂

式的多样化,“大家实在很忙,忙股票忙电动玩具或是忙着撞车,能够有闲情余兴读完一本文学作品的人并不多”。③于是,追求“娱乐”功效的读者偏爱于字数少,文意浅,影象多,内容熟悉的作品。④这种内在与外在因由的交汇及融合,就构成了台湾微型小说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和文学选择的客观环境。

文学不只是社会物质形态的折射,更是社会精神状态的映现。台湾的微型小说是合着都市文学的节拍逐渐发展的,它所撷拾的题材较为广泛,涉及的社会生活面也很大。既有对都市生活的机遇、竞争、发达的展示,又有交通混乱、道德沦落、婚恋危机、观念冲突等社会问题的回响。当然也没有排除对作为普通人的思想闪光点的捕捉。这么广泛的题材,对微型小说来说似乎是难担其负的。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作家往往是就某种感悟,捕捉一瞬,恰如诗的意境创造一样,使外物与内情相撞击,使境与意相融合,并以一种幽默而调侃,深刻而轻松的笔触,抒写性灵,宣泄情绪,从而构成微型小说介入社会的独特风采。

伴随着后工业社会发展的脚步,台湾社会的物质生活空前丰富,但也催发了物欲的恶性膨胀,伦理精神的堕落,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污秽的滋生与蔓延。如孟慧的《节》,写一个往日的学生,路遇老师,请老师搭乘自己的轿车。在交谈中老师得知她当了妓女,工资高出自己几倍,还有汽车和洋房。老师气愤至极,在痛斥学生失节的同时,也反省了自己只顾教书而疏于育人的“失节”行为。这篇千字小说对失节的描写是以个人的失节来映射社会的失节,教育制度的失节,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颇能发人深省。胥黎的《金字招牌》,写一个打着“金字招牌”的“20年的老店”,以“打五折”的投机,

销售劣质产品,牟取暴利,揭露了在商业经营上的道德失衡,灵魂扭曲的现象。苔岑的《我得奖了》,写一青年作家将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寄给大奖评选会,被评委誉为“永恒而伟大”的杰作,但作者却被易名,巨额奖金被他人占有。他据理力争,无济于事,原来这是一个“串通好的骗局,拿我最杰出的作品颁给早已内定的人”。与这篇作品堪称姊妹的《所费不多》(白灵),是写新调任的机构主管,要裁掉“脾气大得很”,“没人敢惹”的冗员,结果被上级以私人身份相告:“所费不多,宜暂闲置,免生枝节。”这两篇作品都是立足于此而意在彼,以局部的污秽来折射社会的龌龊,宣泄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不辨正邪的愤懑情绪。

台湾工商社会形态的日益膨胀,贫富差距日渐悬殊,在都市化的阴影下各种矛盾纷纷浮现和激化。如林文煌的《三代》写一个陌生人“一手牵着一个刚会走路模样的小男孩,一手牵着一个步履蹒跚的年老中风病患”,在行进中既要保护着小孩,又要照顾好年迈的老者。小说虽没有展示三代人的生活背景,但其艰难的步履足以映射出他们孤独无助,贫困拮据的生活侧影。苔岑的《鸳鸯盗》中的文雄和美玲相恋三年,却结不了婚。为筹措父亲要的30万元聘金,美玲策划了一场现金抢劫行动,要文雄劫持从银行提的款。殊不知文雄作案时听出美玲的声音,几分钟后他又来救她,却落入法网。这种因爱而作案,又因爱而失陷的故事,读来令人啼笑皆非。从中不难看到封建余孽对青年的戕害,也可看到被逼无奈的恋人铤而走险的悲哀。平路的《爱情屋》比《鸳鸯盗》更为悲惨。一个营造公司的职员为客户设计、建造了不少的样品屋,自己却没有一个单门独户的家。当他按妻子的意愿制作出宅邸

造型时,他妻子却因积劳成疾而命丧黄泉。这些工薪族青年的悲剧,并非因为他们品行不端或者能力不强,而是由他们自身无法抵御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道德观念不断受到挑战,新的道德标准尚未建立,健康的新观念也未形成,这就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在婚恋问题上更容易误入歧途,导致婚姻、家庭的悲剧。台湾的微型小说对这种悲剧一般是采取调侃的方式进行揶揄和讽刺。如,应凤凰的《美丽之旅》,写李先生带夫人及公司秘书郝梅意到东南亚旅游,一路上对夫人照顾周到,体贴入微;这种假象蒙蔽了夫人,为李先生同郝小姐频频幽会提供了方便。张至璋的《两个女人》写雅如得知丈夫有了外遇,就去找好友美情请教;美情告诉她抓住丈夫的三个法宝:一是化妆,二是眼泪,三是智慧。雅如化妆,丈夫不感兴趣,就又化妆又用眼泪,结果吓跑了丈夫。可是美情用这三个法宝却赢得了雅如丈夫的爱。对这种第三者插足的婚姻悲剧,作者似乎并不大惊小怪,只是以平常的心态予以调侃。这说明类似的事情多有发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只不过以猎奇的态度宣泄一下而已。然而婚外情给予子女造成的心灵创伤却是难以平复的。清沙的《对话》中的四岁女儿幻想自己有“一个仙女的手杖”,“我一指,先把妈妈、姐姐和我变成陈兰翠,那么爸爸就和以前一样,好喜欢我们。”再一指,把陈兰翠变成妈妈,让爸爸打她,骂她,讨厌她。女儿对爸爸的情人陈兰翠的声讨,就充分说明婚外情伤害的不只是配偶,也摧残着幼小、纯洁的心灵。

交通拥塞,事故频仍,是台湾都市化进程中的一大弊端。在台湾微型小说创作中表现交通事故的题材占有相当比

重。如陈启佑的《永远的蝴蝶》、罗燕如的《红灯》、立寒的《与妻相看》、林文煌的《交通安全措施》、马晓玉的《呼唤》、钟玲的《车难》等。这些作品选材的视角有异,运用的表现手法不一,但作者们似乎无兴趣渲染车祸的残酷,而是注重揭示车祸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红灯》中那位女乘客因计程车司机闯红灯而勃然大怒,《呼唤》中孤苦的老妇在自杀前寻找20多年前失散的骨肉,都是在亲人遭遇车祸后,而对未来人生的孤独、焦虑、恐惧心理的反映。

台湾的微型小说多角度、多侧面、多棱镜般地映射了台湾社会的种种问题,但限于体裁的制宥,作者并不期望像中、长篇小说那样系统而厚实地反映社会问题,但是,它却“将情思细细勾出,如绣花针般,刺入情之幽微处,如当头棒喝,打落执迷,打开事理之真实。而这由情理中自然形成的开悟,无疑是极短篇迷人的地方”。^⑤

台湾小说历来以批判写实为主要基调,鲜少赞颂正面的人物或事物。但微型小说却别开生面,出现了许多讴歌、赞美平民百姓高尚品德的篇章。如《心传》(方杞)中的曲道范,台湾大学毕业,父为高官,家庭也很富有,还拿到哈佛大学深造的奖学金。为了替他的好友在山村小学代课,把学生送到毕业,他留在山村从教,并将这个山村学校建设成一所先进的小学,直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他这种“弃钟鼎富贵而不顾”的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实为难能可贵。《求职记》(刘楷群)中的陈逸和王志在同一家公司服务。当他们发现一家更有实力的公司招聘时,二人同去应聘,可是该公司只能录取一位,经理让他们自行决定。事后他们分别给经理写信,互相推荐对方,“不为自身利益着想”,使经理深受感动,破

例将他们同时录用。在工商经济膨胀的背景下,尔虞我诈,人人自危,互相拆台,以邻为壑的现象比比皆是,但陈逸和王志的互相谦让的品质,不是有助于修补日渐衰颓的传统道德么!遗产纠纷一直是困扰家庭的问题,《母亲的遗产》(詹益川)却以独特的构思展示了五兄弟闪光的思想境界。父亲去世后,母亲将父亲的遗产分给五个儿子,自己轮流在五兄弟家吃住。舅舅告诉五兄弟他们母亲有50万投资在他的厂里。母亲死后,舅舅又召集五兄弟说,他们的母亲并没有在他的厂投资,之所以撒谎,是担心你们对母亲不孝顺。五兄弟表态说,我们不是为遗产才孝顺母亲的,决定每人拿出10万元,捐给孤儿院,“把母爱分给孤儿们”,舅舅也深受感动,表示“捐出50万元,凑成100万元,用你们妈妈的名字捐出去”。这些作品都抓住了人物的思想闪光点,予以生发,歌颂了真善美的道德操守,同时也间接地鞭笞了那些道德失衡、行为失范的社会现象。

微型小说作为小说的四大家庭之一,应该具备小说的一般特征,如人物、情节、结构、语言等诸多因素。但也应看到,微型小说决不是中、短篇小说的故事梗概,也不是小说的缩微形式。正如微型小说作家沙黾农所说,微型小说是“小说与散文、诗歌、神话、寓言的‘模糊’”。^⑥其实,台湾自微型小说崛起之初,就提出微型小说是一种模糊的文类,非常重视微型小说与诗歌的关系,提倡创作具有诗化魅力的微型小说。台湾文学评论家齐邦媛在《袁琼琼的极短篇》中,就强调“写最成功的极短篇也许该有写诗的情怀”。如陈启佑的《永远的蝴蝶》,写“我”和樱子在一个雨天给母亲寄信,告诉她我们准备下月结婚。因为两人只带一把伞,樱子自告奋勇送信,过马路时遭

遇车祸。小说没有描写最为残酷的车祸场面,而是运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了“我”因剧烈的情绪冲击所产生的幻化感觉:“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好象一只夜晚的蝴蝶。”这就将最为残酷的场面赋予诗的情绪,令人回味无穷。结尾部分又写樱子穿着白色风衣,过马路寄信,又看到她走到街心。这种幻觉意味着她的永生,呼应了“永远的蝴蝶”的意象,并把“我”的无比沉痛和爱恋的情怀宣泄出来。张至璋的《会变金色的鸽子》,恰如台湾评论家李瑞腾所说:“在写法上特别着重含吐不露的效果,于是暗喻、象征等诗之手法便派上用场了。”^⑦这篇小说将鸽子的意象作为亡妻灵魂的象征,由此生发了生死相依般的感情。小说的第一部分写士宇由阳台上飞来一只鸽子,联想到亡妻雅文喜欢鸽子,就非常怜惜这只孤独的鸽子。第二部分写士宇去给妻子扫墓时,天上忽然飞过一群鸽子,在晚霞的映照下鸽子变成了金色。他想寻找落在阳台上的那只鸽子,却没有找到。这两个跳跃性的“诗节”,在递进的旋律中谱写了一首凄婉、忠贞的爱情之歌。尤其是那鸽子变成金色的意象,构成了情与景交相感应的意境,更突出了这种爱的珍贵与永恒的象征内蕴。台湾微型小说的这种诗化的追求,拓展了微型小说的表现领域,也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台湾微型小说的诗化无疑是出于抒写性灵,宣泄情绪的创作实验的需要,但并不是微型小说创作的唯一途径。微型小说,作为小说是应该刻画人物的,可是微型小说限于篇幅短小,无法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对此,台湾作家注意运用传统的单线勾勒的白描手法,寥寥数笔,就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如陈桦的《计程车司机》,写三个贵

妇乘客奚落司机这种职业,让家人感到脸上无光,激起了司机的不满,就开快车以泄愤。三个贵妇担心车祸,允诺付给100万元以降车速。司机问清了她们的姓名,并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三天后这三个贵妇收到孤儿院的感谢状,原来是司机所为。这里是通过司机代捐的闪光行动来突出他的善良、正直和无私的高尚品质的。高阳的《明明》,写仲方和梅卿夫妇因家境拮据,想把收养六年的明明过继给朋友,临行前梅卿给明明买了10个肉饺。明明只吃了三个就不吃了,并说:“明明吃饱了,不吃了。爸爸说的:有好东西不要一下吃完!”接着作者写道:他“重新伸出手来,推一推那剩下的七只肉饺,眼睛很快扫过他爸爸妈妈,然后又把手缩回去”。这个动作细节,通过“伸”、“推”、“扫”、“缩”等一系列动作,以及个性化的语言,极写明明的“懂事”和对父母的尊敬与热爱,从而突现了人物的个性。梅逊的《啤酒与黄瓜》,写老子虽为小富翁,仍然十分节俭,每次在外吃饭总是吃最便宜的,连一碟凉拌黄瓜和盐水花生都舍不得吃。有一天在饭馆用饭时,听到他的儿子正在划拳喝酒,大吃大喝,气得他“心一狠”吃起那碟凉拌黄瓜来。这是在节俭与挥霍的对比中衬托出父与子的不同性格。这种以典型的细节、行动、语言和对比等艺术手段揭示的人物个性,虽不够全面和立体化,却能“以一目尽传精神”。既适合微型小说的短小篇幅,也有利于抒写一种心态,宣泄一种情绪和扑捉一种感受。

台湾微型小说的情节结构一般都采用三段式,即开篇——发展——结尾。但在具体的操作中,有百态千姿,富于变化。择其要端,有下述几种:其一,意外结局。即,情节在发展到高潮时,骤然逆转,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这与美

国作家欧·亨利强调的“结尾惊奇”,日本作家星·新一主张的“意外的结尾”是完全一致的。如沈因的《梅莉的晚约》、俞丽清的《黄丝带》、清溪客的《旁白》、蔡碧航的《冰人有罪》、钟肇政的《自用车时代》、郭丽华的《化妆舞会》等,都是以戏剧性的意外结局来掀起情节的波澜,突出小说的思想魅力的。《梅莉的晚约》所描写的梅莉会见老同学前梳妆打扮的细节,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她在会见前对爱的兴奋、激动和憧憬;可是在与老同学见面后,他拿出钻戒和耳环给她带。她以为是给她的,也以为“等下要亲热”,殊不知一句“假如你要,我算便宜给”,使情节骤转,将他们的爱情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旁白》更是写得一波三折,结尾出乎意料。看电影时,前座有一女子不断地与一男士咬耳朵,议论电影内容;“我”忍耐不住,制止了她。妻却怕那男士报复我们。中间休息时,“我”去买饮料,那男士紧随其后,“我”心慌、发毛,就加快脚步,他也迅速跟上。“冷不防,他一手扳过我的肩膀”,使小说顿生悬念。接着写他“另一只手迅速握住我的右手”,对他说:“先生,谢谢你,我自己实在没有勇气对她这样说。”这种意外的结局,突出了小说的艺术张力。

其二,以点带面。即,抓住生活中的一个片断、一个场景,来抒写一种思绪、一种感慨,以期营造一种氛围,映射出生活的辉光。这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貌似散文或诗歌,带有鲜明的抒情性,侧重于性灵的体验,也往往颠覆了作品的功利主义。如吴念真的《新娘》、陈启佑的《永远的蝴蝶》、李捷金的《小白猪》、沈萌华的《葡萄记》、姚艺真的《钓金龟》、陈克华的《渍》等,都属于这种营构氛围,抒写性灵之作。《新娘》中的妻在未见到婆婆前,反复练习叫“妈妈”,可是见到婆婆

后,五岁就失去母亲的感触立时涌上心头,忘情地叫了声“娘”!小说所写的虽只是个日常生活中寻常的称呼,但却反映出妻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与升华,她与婆婆关系已成为骨肉般的相依为命了。《渍》则是抓住男人喝咖啡在杯沿留下的“渍子”,生发了一曲情爱的赞歌。因为有爱,女人对这些“浅棕色的咖啡渍子”,并没有产生反感,相反,在她看来这些“或长或短,一口一条,没有相同的位置,干了之后,像一幅水墨”,非常让人喜爱。写得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台湾的微型小说的艺术注意广纳博取,兼顾中西,既吸收了传统的象征、幽默等技巧,还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荒诞、黑色幽默、变形、拼贴等手法,丰富了微型小说的表现技巧,也把微型小说推向一个新的层次。如俞丽清的《黄丝带》,写衣凡在结婚前,对达妮脖子上的黄丝带充满了诱惑,结婚后他总想知道黄丝带的秘密,因久而不得其解,产生了厌倦情绪。后来达妮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伸手拉下脖子上的那条鲜黄的丝带,“丝带飘落到地上的时候,达妮的头颅也掉了下来”。小说以黄丝带为象征意象,运用荒诞手法表现了不信任和猜忌所导致的婚恋危机。与张至璋的《会变金色的鸽子》一样,小说还借鉴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以金色(黄色)构成衰败或死亡的象征,以象外之旨,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京之春的《等待》写一对“同是羞涩内向,个性保守”的青年男女滋生了灼灼爱意。女的等男的先开口,男的等女的先开口,结果错过了结婚的机会。50年后,他们都已白发苍苍,在女的病危时,男的来看望她,她把“一生中的疑惑与等待化成一句问话:‘告诉我,你究竟在等待什么?’”男的回答说:“等你先开口啊!”这种黑色幽默在引人发笑之

余,使人感到压抑,感到悲伤,并能撩拨读者的思绪,产生超乎常规的审美效应。苏伟贞的《东西南北》则是采用拼贴的手法,将不同时空的事件组合在一起。小说的前半部分写亭云在机场为赴美留学的贺正送行;后半部分写亭云和她的丈夫在高速公路休息站邂逅贺正。前者是写“东西”,后者是写“南北”。这种拼贴的意义就在于将昨天与今天拼接起来,把不同方位对应起来,打破时空界限,在对比中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生存境遇。

庸庸讳言,台湾的微型小说也存在着不足。如题材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主题的开掘也有必要进一步加深,艺术表现技巧中有多样化的趋势,但平庸、单薄之作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借此机会祝愿有志于微型小说创作的作家同胞,以自己的艺术杰作将台湾的微型小说园地装点得更加灿烂辉煌!

①周昌龙《台湾极短篇小说——回顾与前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新加坡作家协会 1996 年出版。

②痖弦《极短篇美学》,转引自《台湾极短篇小说——回顾与前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新加坡作家协会 1996 年出版。

③王孝廉《评审的话》,《联合文学》第 7 卷,第 1 期。

④郑明姍《80 年代台湾散文现象》,转引自《南方文坛》,1997 年第 6 期。

⑤张春荣《凡是虫——评俞丽清极短篇》,《极短篇美学》,尔雅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⑥沙屯农《微型小说的艺术境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文集》,泰国华文作家协会 1997 年出版。

⑦转引自林高《两个文体是乡亲——论诗歌与微型小说的关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新加坡作家协会 1996 年出版。

责任编辑:陶原珂

红楼香的空间暗示

□ 张世君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红楼梦 香 空间 建筑 暗示

[摘要] 《红楼梦》中的香, 有花草、香料、农作物、建筑命名等多种类型。它突出地体现着柔性美和女性意识, 构成各种空间意象和审美意趣, 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和小说情节的推进都起一定作用。

[中图分类号] I207.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107-05

一、香的种类

《红楼梦》描写了大量的香, 各种各样的香有不同的香型, 诸如“奇香”、“异香”、“清香”、“冷香”、“暖香”、“鼎香”、“药香”、“宫香”、“暗香”、“闷香”等。这些香型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 充斥着园林空间的各个角落, 形成不同类型的香的意象。

园林香的香源来自园林自然泥土花草所散发的芳香, 关于花草香的词语有“杜蘅”、“白芷”、“芳草”、“佳蕙”、“水仙香”、“花香”、“菊花香”、“香莲”、“蒲艾”、“茴香”、“香藤异蔓”等。关于土地香的词语有“香尘”、“土香”、“香屑布地”。这些自然物质的香弥漫在园林空间, 形成园中空气香。关于空气香的词语有“香风”、“香飘”、“异香扑鼻”、“寒香指鼻”、“屋里香”、“一阵香扑脸”等。

园中人使用的香料是另一个香源, 有关香料有十多种。诸如: “百合香”、“香油”、“香露”、“檀香”、“芸香”、“降香”、“沉香”、“速香”、“御香”、“冰片麝香”、“安息香”等。这些香料主要用于燃

香用的香火与女性的化妆品。它们与自然香源共同构成了园林的香气空间。

中国是一个烹调大国, 讲究饮食, 红楼饮食也是充满香气的。饮食香的词语有“稻花香”、“蟹肉香”、“香芋”、“禾黍香”、“香酒”、“香桃”、“香菌”、“香莲”、“茄子香”、“酒香”、“菱藕香”、“药香”、“鹿肉香”、“茶叶香”、“柚子香”等。

其他有关香的词语还有“遣香词”、“群芳髓”、“清芬”、“芬芳”、“红香绿玉”、“香护”、“香袋儿”、“香囊”、“香车”、“香烟”、“香妙异常”、“沉香拐杖”、“红香散乱”等。

从这些香的种类和命名中, 我们看到, 它们多是与中国农业文化相联系, 花草、粮食、蔬菜、水果以及香原料的香气直接从泥土中生成, 在园林中散发, 形成园林的嗅觉美。而以香命名的有“稻香村”(粮食香)、“藕香榭”(蔬菜香)、“梨香院”(水果香)、“冷香丸”(中药香)。这些带“香”字的命名都与农业联系, 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农业的美意识。我们在这里把中药冷香丸也归于农业香, 是

基于古代神话中的神农,既是农业之神,又是药神,很多粮食可以入药,中药又可以当食品。因此我们把中药看做是与农业有关的药料。

二、儿女香

《红楼梦》对香的描写情有独钟,让人沉醉于园林香之中。这是《红楼梦》文本一种很独特的空间意象的描绘现象,它体现了园林文化的审美意趣。

中国园林文化是一种柔性文化,《红楼梦》表现了园林的柔性文化意识。它的柔性表现遍布园林的每个角落,每个造园媒介都渗透了柔性。它的园林建筑重檐攒尖,飞檐翘角,墙垣蜿蜒,游廊盘旋,亭台错落,碎石铺路。整个造园风格是多曲折、多变化、多开畅,没有西方园林建筑规整的中轴线、直线形和方正的几何图案所表现出的阳刚之气,充满阴柔美。而在这阴柔美之中,园林建筑以香命名。以香命名的建筑如“会芳园”(芳即香)、“沁芳闸”、“蟠香寺”、“含芳阁”、“天香楼”、“暖香坞”、“稻香村”、“藕香榭”、“梨香院”、“红香圃”、“香棚”等,更把园林建筑的柔性推向极致。柔中带香,这是一种拟人化的女儿香的建筑风格,《红楼梦》文本推崇和看重中国园林建筑的柔性美。

《红楼梦》的诗词量大,这固然是因中国古典小说受诗歌传统影响所致,但也与园林和诗词相通有关。这些诗词是大观园风景的组成部分,并为园林风景增辉。大观园竣工后,贾政游园时说:“若干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足见诗词题对在园林中的重要性。大观园题咏就是园林中的诗词,诗词中写的又多是园林。比如宝玉咏《蘅芷清芬》:

蘅芜满净苑,萝薜助芬芳。
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

轻烟迷曲径,冷翠滴回廊。

谁谓池塘曲,谢家幽梦长。

这首诗是题蘅芜苑的,诗中描写了园林的花草、小径,弥漫在亭苑中的香气和冰凉的露珠,引用了诗词典故“萝薜”(屈原《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和“谁谓‘池塘’曲”(谢灵运《登池楼上》:“池塘生春草”)。这些诗歌意象描绘出了园林的景色。“花草”、“小径”、“香气”、“露珠”本身就是园林景致的特点,而写古典诗词又少不了用典,宝玉这首诗都具备了。它具体咏蘅芜苑,抓住了蘅芜苑的主要特点——冷和异草香,这是一首园林诗。

《红楼梦》的诗词,基本上都是园林中人写园林,可以说是像《蘅芷清芬》那样,既是园林中的诗词,又是诗词中的园林。无论是红楼女子诗社做的园林诗,还是作者直接写的太虚幻境的园林诗,都表现出中国古典诗词所具有的“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特点。大观园的诗词软而媚,文小质轻,委婉幽深,是柔性、春意、女性的表征。比如12支曲子词是柔性文化意识代表作,言爱情,即“风月情浓”,“怀金悼玉”,“香尘”,“风情”;言草木,即“世外仙姝”,“桃红柳绿”,“宝树唤婆婆”,“镜中花”,“春荣秋谢”;言天象,即“奈何天”,“伤怀日”,“水中月”,“霁月光风”,“云散高唐”;言人物,即“芳魂艳魄”,“才貌仙郎”,“气质美如兰”,“个性空灵”;言命运,即“叹无缘”,“枉悲伤”,“意难平”,“心事终虚化”,“冤冤相报”,“生关死劫谁能躲”,“昏惨惨黄泉路近”。凡此种种,都表现出园中词的柔媚,声韵凄婉,销魂醉魄。然而在这软而媚的词中,又添上了“香味”。以香入诗的诗句有20余句。以香入诗,媚中带香,使整个诗词更具浓浓的香艳情愫。贾政称之为“浓词艳赋”(第23回),一语

中的,这恰是中国古典诗词和园林文化追求的一种韵味境界。

《红楼梦》的诗词多是女儿所为,诗词香浸濡着女儿香。以香取名的人物,在贾府都是女性。有“香菱”、“蕙香”(四儿原名)、“芳官”、“花袭人”、“稻香老农”(李纨别号)。除了李纨外,带香名字的女孩都身为丫鬟下人,但她们是贾府一群天真可爱的女子,在才学德识上都不低于贾府的男子。香菱是其代表。第80回香菱有一段谈香的话。香菱说:

不独菱角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儿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

香菱所谈花草叶根的清香,其实是她自身品性气质的写照,表明女儿的香来自自然,与自然同一。这篇赞美自然花草香气的文字,也是作者对大观园女子女儿香的推崇。由物及人,文本描写女儿香的词语有“香魂”、“腕底香”、“(体)幽香”、“芳魂”、“甜香满颊”、“余香满口”、“香汗淋漓”、“香痕”、“嗅香”等。不言而喻,这些人体香主要指的是女儿香,它表现了《红楼梦》叙事推崇女性的话语立场。

宝玉喜欢说女子是水做的骨肉,他是把女子当香花看待的。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里论道:“宝玉无夜郎自大之习,所以有怜香惜玉之温存;宝玉之待十二钗,必个个以香花供之,方不可亵渎老天灵秀之气。”^①其实,宝玉把女儿当香花供奉,岂止是对12钗,就是对丫鬟丫头,他也是十分和气温厚的。宝玉爱女儿香,乐意为女性效劳。每次大观园女子集聚一堂,吟诗做赋,他都踊跃参加,为众女子布置几席,安排笔札,并指

挥嬷嬷丫鬟做准备工作。他并不在乎在做诗中争胜,而“在乎笑语之香也。”^②那笑语,是一股扫除世俗浊臭之香风,是闺中女子非功利的明心呈现,叫宝玉感到耳目一新,好不清爽。

黛玉是女儿香的代表。第19回宝玉从黛玉身上闻到的奇香是黛玉的体香。在第8回,宝玉曾在宝钗身上也闻到过香。“只闻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竟不知系何香气”。但宝钗身上的香气不是体香,而是药香。“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第19回的标题是“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即是指黛玉这个“香玉”身体本身生发的香气,这是对黛玉体香的赞美。作者以体香来象征女儿的清纯。黛玉不仅身体洁净,而且思想脱俗,不入仕途禄蠹之道。正如第32回宝玉对湘云所言:“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

不可否认,宝玉是有泛爱主义的,看见女子便动心,但他惟独对黛玉没有这种性意识。当他闻到黛玉的体香,只是一片纯情的喜欢。我们可以从宝玉对黛玉体香的推崇中看到作者对女性由衷的赞美之情。香是象征女性话语立场的一个暗示。

女儿香与园林香的联系十分紧密,可以说女儿香是在园林香中生成的,香与女儿合一,女儿是园林香的象征。在空间叙事层面中,由场景建构的实体空间和由香气建构的虚化空间都充斥着女儿香。像香花一样芬芳的女儿所到之处,都有香气香味和香的笑语,叙事的现实空间实则是一个女儿香的空间,也即女性空间。香在它的引申意义上把女儿与女性空间连接在一起。

如果我们把文本意义层面上的空间看作是一个女性空间,我们就可以对小说的题旨做一个新的解释。曹雪芹在确

定以贾府由盛及衰史和宝玉生活史的时间叙事主轴后,他着力在空间层面写一群女儿的故事,整个叙事空间都是女性,而宝玉则是这个女性空间的护花使者。尽管宝玉什么事情都没做好,哪个女子都没护住,但他从心里推崇和热爱他身边生活的这群女子。我们从叙事中感受着作者和宝玉对红楼女儿不可遏制的爱与忏悔。悼念女魂的焚香和嚎啕的哭声,已经随着香烟缕缕上升,震荡宇宙天际,香气、哭声与天地融为一体,整个空中弥漫的都是女儿香和女儿悲,真正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应该说,文本对香的描述是具有诗学品质的,它与中国诗学推崇的韵味说有相通之处。作者通过对香的描述,追求“香外之致”和“香外之旨”,它已经超出了对香的描写本身,离形得似,产生出“象外之象”的优美意境。

三、闻香入室

香在空间叙事中担负了一个特殊的功用,成为场景分节的一个分节点。也即在场景转换的时候,香成为场景分节的一个暗示,从嗅觉上把人物从一个场景引入另一个场景,人物闻香入室而进入新的叙事空间。

文本中闻香入室,形成场景分节的描写达13次之多。比如第5回,宝玉进入秦氏卧室,“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宝玉觉得眼饧骨软,连说‘好香!’”秦氏房内的“甜香袭人而来”形成了场景转换的分节,引导宝玉入室。脂砚斋甲戌本在“甜香”旁夹批道:“此香名引梦香”。③这是一个绝妙的批语,似乎表明脂砚斋对香气的分节点闻香入室是有所认识的。“引梦香”是脂砚斋杜撰的一种香名,它和我们所说的“闻香入室”都在用香“引”,用香作引导,作指引。

宝玉梦中再次闻香入室。警幻仙子“携了宝玉入室。但闻一缕幽香,竟不知其所焚何物。宝玉遂不禁相问。”这又是一个新的场景分节。宝玉在这满屋幽香的房里,品尝香茶“千红一窟”,香酒“万艳同杯”,聆听《红楼梦》12支曲。

这两个以香分节的场景描写都是在宝玉进门的时候出现的(“刚至房门”,“携了宝玉入室”)。它是极为典型的虚化空间的分节点,也是嗅觉香的最好的空间暗示,里面所含的寓意早已超过了物质香本身的香气,而成为整个文本人物命运的悲悯性暗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第6回刘姥姥进荣国府到凤姐屋,也是闻香而进的。文本写:“小丫头打起猩红毡帘,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辨是何气味,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一阵香扑了脸”的分节,立刻把空间充满的香气描绘出来,空气中的香几乎把刘姥姥熏倒。接下来的场景描写就是刘姥姥在这香的“云端里”对人与物的种种“头晕目眩”的感受。描写是非常有趣的,比如把平儿当作凤姐,把钟摆当作乱幌的秤砣等。

在上面闻香入室的描绘中,我们看到香对人的引导,文本描写了香气弥漫中的室内陈设,而在以后的闻香入室的场景描写中,也有仅用香来表征室内空间的虚灵性的。比如第26回写宝玉去潇湘馆,“走至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中暗暗透出。”在这里,“一缕幽香”成为室外幽闲气氛和室内春困幽情描写的分节。文本细致地描写了室外潇湘馆的竹影、竹声(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横匾(潇湘馆)、门帘(湘帘垂地)、“一缕幽香”使景色描写转向室内场景。宝玉进屋,文本再没有对室内陈设的描述,直接把关注的焦点对准两个男女主人公,叙述

他们的幽情。而这种幽情是在室外幽闲气氛和满屋香中生发的。试想,如果宝玉进屋后,文本仍然按照一般叙述的常规写室内的陈设,它会破坏黛玉已经“发”出来的春困幽情,并影响宝玉对这种幽情的体味。空气中的香替代了对室内陈设的描述,这是十分经济的空间描写笔触,且渲染了人物活动的环境气氛。以香把空间虚化的描写,和中国戏曲追求的舞台空间的虚灵性是一致的,具有浓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在描写室外场景的时候,闻香入园常有对香源的简略的景色描写。比如第40回贾母带刘姥姥去蘅芜苑。“一同进了蘅芜苑,只觉异香扑鼻。”“异香扑鼻”的香源皆因园中的香草。文本简略写了园中景:“那些奇草仙藤越冷越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园中花草的香衬托了园中主人宝玉的朴素和冷艳之香,在以下的室内描写中,贾母便在叹宝玉:“这孩子太老实了。你没有陈设,何妨和你姨娘要些。”

香也常常成为场景描写的一个话题。比如第87回,众姑娘到潇湘馆,“忽听得唿喇喇一片风声,吹了好些落叶,打在窗纸上。停了一回儿,又透过一阵清香气来。”“透过一阵清香”使众小姐的话题转向就桂花香谈籍贯的对话场景。文本写:“众人闻着,都说道:‘这是何处来的香风?这像什么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终不脱南边人的话,这大九月里的,那里还有桂花呢。’”由此,大家各自说着自己的出生地和生长地,以证明南北差异和人事的变迁。

这个由闻香分节改变的对话场景是十分富有机趣的,为场景描写又添了一景。其他谈香赞香的对话还有第51回宝玉说药香,第52回宝玉赞花香。

香,并非尽然都是有益的。当文本叙事进入贾府衰败之后,园中香的描写减少了,对香的赞美也没有了。过去贾府烧火盆总是加香料,潇湘馆烧火盆亦如此,及至黛玉焚稿,火盆不再加香,屋内香气不再。惟一的一次香气描写还是有毒的,这就是致人昏迷的闷香。第112回描写妙玉在庵内打坐,“自己坐着,觉得一股香气透入凶门,便手足麻木,不能动弹……可怜一个极洁净的女儿,被这强盗的闷香熏住,由着他掇弄了去了。”第120回,香菱因难产而死。昔日这个爱好花香,痴情花香,谈论花香,以香命名的女子带走了红尘的香,一部《红楼梦》再也无香了,叙事也到了结尾。由此可以看到,文本对香的描写也顺应着贾府由盛及衰的过程,在贾府兴盛时,香多,香有益;在贾府衰败后,香少,香有害,最后香被亡人所带走。应该说,这是有寓意的。

①②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王志良主编《红楼梦评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③《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千红一窟”旁批“隐哭字”,在“万颜同杯”旁批“隐悲字”,卷五第十一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

□ 李玉莲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97 级博士生, 北京 100875)

[关键词] 元明清 小说 戏剧 翻译 传播

[摘要] 元明清小说的翻译传播在亚洲是通过媒介组织即坊肆以印刷为媒介实现的, 在欧洲则是以更为先进的大众媒介即报纸、杂志、各种出版物为传媒完成的。其传播对象在日本、朝鲜经历了由精通汉学的知识分子到平民, 在欧洲则经历了由文化精英到民众的平民化过程。传播过程中的修订润饰加工在翻译传播中也多有表现。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112-06

一、小说内容的翻译传播

元明清小说在国外的翻译传播约始自 16 世纪中叶, 17 世纪进入高潮。此时正是中国的明清交替之际, 正是各体小说走向成熟、名著层出不穷的时代。“剪灯三话”(传奇小说)、“三言二拍一型”(话本小说)、以及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已广泛传播。文言小说的巅峰作品《聊斋志异》也在孕育之中。这一切均为小说的翻译传播准备了条件。

亚洲

最早的关于元明清小说翻译传播的记载可以溯至 1532—1555 年间, 日本对瞿佑《剪灯新话》的翻译。其时,《剪灯新话》中有 3 篇作品被翻译成和文, 收入《奇异杂谈集》。①朝鲜在 1444 年前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是利用汉文。中国的文学作品一般是以原本形式直接传入的。李王朝第四代王(1416—1450 年)世宗时完成了朝鲜文字《训民正音》的创制工作, 汉文转换成朝文的翻译工作也随即开始, 所谓“译学实国家重事”。至于小说的翻译传播, 较早的记载是 1543

年中宗王下令翻译刘向《烈女传》, 壬辰战争(1592—1597 年)前后, 中国小说的翻译传播得到发展, 17 世纪上半叶达到高潮。日本、朝鲜对元明清小说的翻译传播有一个共同特点, 即翻译过程中的改作。在日本, 称这种“换言、改写前人所作之趣意, 特指借用本国古典、外国小说戏曲等的梗概内容, 而在人情、风俗、地名、人名等方面加上己意的改作”(日本《广辞苑》)为翻案。例如李昌祺《剪灯余话》东传日本后, 很快有浅井了意(?—1691 年)将其中 18 篇译成日文, 收入其著作《伽倻子》。在《伽倻子》中, 原本的人名地名均已被改成日本式。我国近代林纾持翻译小说也是这样做的。

白话小说即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在日本、朝鲜的翻译传播比原本产生及传入的时间晚很多。这恐怕是受中国小说观念的影响。湖南文山在 1689—1692 年间翻译的《三国演义》的日文全译本《通俗三国志》是比较早的翻译传播本白话小说。1703 年朝鲜也出现了《三国演义》的朝文译人。1757 年日本冈岛

冠山据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翻译的《通俗忠义水浒传》，是世界上第一部《水浒传》翻译本。在冈岛冠山的影响下，中国白话小说的翻译传播在 18 世纪下半叶达到鼎盛时期。如日本儒家学者冈白驹《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及其门人左卫门《小说粹言》，均据“三言二拍”及《西湖佳话》等话本小说翻译改写而成。1758 年西田维则(口木山人)将《西游记》第 1—26 回译成和文《通俗西游记》在京都出版，一般认为这是最早的《西游记》外文译本。及至 19 世纪，松村操(1882—1884 年)翻译《金瓶梅》为《原本译解金瓶梅》。1887 年神田卫民翻译《聊斋志异》为《艳情异史》。1892 年森槐南翻译的《红楼梦》第一回楔子在《城南评论》二月号上发表，揭开了《红楼梦》在日本翻译传播的帷幕。朝鲜则有 1884 年前后翻译的著名的“乐善斋”全译抄本《红楼梦》传世。

日本、朝鲜之外，元明清小说在亚洲其它国家的翻译传播也相当广泛。早在 1890 年，人们就至少有五次机会看到被摘译成马来文(后又印成印尼文)出版的《西游记》。泰国昭披帕康在 1802 年即完成了泰文《三国演义》的翻译工作。这只是众多元明清小说在亚洲各国的翻译传播之一斑。

欧美

元明清小说在欧美的传播中，法国占有极重要的位置。1735 年，〔法〕杜·哈德(J. B. DU Halde)主编的《中国通志》(亦称《中华帝国全志》)第 3 卷出版，发表了殷弘绪神父(Le Dered' Entrecollos, 1662—1741 年)以梗概形式翻译的《今古奇观》中的小说 3 篇。这是第一次将中国小说介绍到欧洲。1736 年，伦敦出版英文《中国通志》，3 篇小说由约翰·瓦茨(John Watta)组织译成英文。此后

的 19 世纪，英法汉学家陆续翻译“三言二拍”小说。在世界上，率先翻译《金瓶梅》的也是法国。1853 年，法国安托尼·巴赞(Antoine Bazin, 1799—1863 年)翻译的《金瓶梅》第一回《武松与金莲的故事》被收入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同时被收入的还有巴赞翻译的《水浒传》、《好逑传》部分译文。《聊斋志异》最早的单篇译文《种梨》也是由法国人于阿里(Huart)翻译的，刊载在 1880 年巴黎版《亚洲杂志》第 117 期。1889 年巴黎卡尔曼出版社出版《中国故事集》，收《聊斋志异》译文 26 篇。19 世纪中叶，法国泰奥多·帕维(Theodore Pavie)翻译《西游记》第九、十回，发表在《亚洲杂志》第 9、10 期。英文《西游记》节译本则出现在 19 世纪末。

《红楼梦》在欧美的翻译传播，英国领先于法国。1892—1893 年香港别发洋行出版了由英国驻澳领事馆副领事焦里(H. Bencraft Joly)翻译的前 56 回《红楼梦》。而法国的译介《红楼梦》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俄国对中国小说的翻译传播极为罕见，直到 20 世纪才由前苏联大量翻译元明清小说。而《红楼梦》的翻译传播却早于英法。早在 1843 年，《祖国纪事》杂志第 26 期即刊载了柯万科《红楼梦》第一回的部分译文。

欧美对中国元明清小说的翻译传播，影响最大而且中外文学交流中提到最多的是《好逑传》，这与文学巨匠歌德的评论有很大关系。18 世纪 50 年代，来华的英国学者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在广东发现了手抄本的中国作品译文集四卷，其中第一卷就是《好逑传》，后经托马斯·帕西(Thomas Perey)主教编辑整理，于 1761 年由伦敦 R&J 多利兹出版社出版。1776 年，法国里昂伯努瓦迪普莱出版社出版梭杜斯(M.

A. Eidous) 转译的法文本《好逑传》。18、19 世纪正值欧洲的中国文化热, 加之《好逑传》与当时流行的理查逊和菲尔丁的作品在主题上很相似, 很快便在欧洲盛传。②1829 年伦敦东方翻译所出版了德庇时(J. F. Davis) 据中文翻译的英译本《好逑传》。

总之, 元明清小说在欧亚各国的翻译传播各具特点。在亚洲尤其是日本与朝鲜, 地缘及政治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决定了元明清小说首先是以原本形式传播的, 之后才渐有翻译传播。而在欧美各国, 由于与中国处于不同的语言文化圈, 而且缺少交流, 注定了元明清小说一开始便是以翻译形式进行传播。

二、戏剧内容的翻译传播

欧美

17 世纪以前, 以华语为通行语的中国文化圈与以拉丁语各语种为通行语的欧美各国文化圈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从 17 世纪开始, 华语文化圈与欧美各国文化圈有了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这中间也包括文学。进入 18 世纪, 欧洲出现了中国文化热。中国戏剧就是在此时带着浓郁的中国色彩、中国气派传至欧洲的。《赵氏孤儿》是第一部传播到欧洲的中国戏剧。1735 年, 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 W. Premare) 翻译的法文《赵氏孤儿》在《中国通志》第 3 期发表, 次年便随着《中国通志》的英译出版而传播至英国。马若瑟的翻译删去了所有歌唱部分, 而那被删去了的实际上正是最能代表中国戏剧意识和抒情审美属性的部分。所以到 1738—1741 年间, 英国分期出版了由爱德华·凯夫(E. Cave) 主持翻译的全译本。1755 年法国巴黎也出版了《赵氏孤儿》的法文单行本。《赵氏孤儿》的广泛传播, 将欧洲的中国文化热推向高潮。《灰栏记》是又一部在欧洲得到

广泛传播的元杂剧。早在 1832 年, 法国朱利安(Julien) (汉名儒莲) 就有译本问世。1876 年丰塞萨(F. A. Wollheimda Fonececa, 1810—1884 年) 的德文全译本在莱比锡出版。这个译本是法译本的转译, 已完全欧洲化。元明清戏剧在欧美的传播并不仅仅靠直接的翻译传播方式, 还靠戏剧家对翻译本的改编及剧院演出。如《赵氏孤儿》的扬名欧洲是因为有文学巨擘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在巴黎的演出;《灰栏记》则是因为在 20 世纪有德国著名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改编本《高加索灰栏记》。《窦娥冤》、《西厢记》等作品在欧美也有翻译传播。元明清戏剧在欧洲的翻译传播中, 贡献最大的是 19 世纪法国的巴赞。他曾以摘译、选择、评介等形式翻译了《金钱记》、《赚蒯通》等近 30 部元明清戏剧作品, 陆续发表在《亚洲杂志》。

亚洲

早在 13 世纪中叶即南宋晚期, 杂剧和南戏便开始传入日本、朝鲜, 此后元明清三朝戏剧向日本、朝鲜的传播源源不断。但这种传播是以原本的形式进行的, 翻译传播则异常寥落。较早被翻译成日本、朝文传播的是《西厢记》。1806 年, 一个署名“岚翠子”的日本人评介过《西厢记》, 同时还评介了清代无名氏的钞本传奇《蝴蝶梦》。在朝鲜, 较早的戏剧翻译传播记录是 1771 年文学屋刊行的《新刻役者纲目》中关于李渔《蜃中楼》第五、六出的评介。1884 年前后, 李钟泰奉高宗之命翻译《西厢记》。总之, 日本、朝鲜尽管在戏剧原本文本的传播速度很快, 但翻译传播却不能与欧美相比, 改编演出传播则更为罕见。与元明清小说的翻译传播相比, 戏剧也是相当微弱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社会对戏剧的歧视。正如日本近代著名戏剧研究家久保得二

所说:明末清初以来,在日本“对词曲持蔑视甚于中国……对中国戏剧的研究,处于完全微不足道的极低的水平”。③

三、传播者、媒介与渠道

传播者

翻译传播的语言转换性决定了翻译传播者必须同时精通翻译的起点语言和终点语言。文学翻译者还必须有相当高的文学素质,而具备这些素质的人是需要时间来锤炼的。在日本、朝鲜,汉学一直相当发达。尤其是朝鲜,10世纪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于是知识分子习汉文并以汉文写作风气盛行,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的1910年。因此在日本与朝鲜,具备小说戏剧翻译传播素质的人并不缺乏。也正是由于汉文汉字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普及,使得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没有必要,因而滞后于原文本的传播。在朝鲜,翻译传播者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宫廷指定的,如李钟泰在1884年受王命,组织数十名文人翻译中国小说近百种和戏剧《西厢记》;一类是文人自发的,如300年前赵泰亿(1675—1728年)曾在其《谦斋集》中提到其母翻译《西周演义》,现在这部共有43册的译本藏于汉城大学奎章阁。在日本,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者大都是文学家。如岗岛冠山、泷泽马琴、冈白驹等。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根据自身的喜好及文学审美的需要,对原文本进行改编。因而他们的许多小说戏剧翻译本,称翻译改编本更为恰当。如泷泽马琴1806年编译的《新编水浒画传》、浅井了意的《伽倻子》等。对于长篇章回小说的翻译传播,最初大都是以节译、选译或评介的形式出现的。这不仅在日本、朝鲜,在欧美也是如此。全译本则往往需要多个翻译传播者的连续努力。日本对《西游记》的翻译就是最好的例子。自1758年西

田维则(口木山人)的第1—26回译文出版开始,至岳亭丘山1831年完成,一部《通俗西游记》的翻译传播历时近百年,由四位作家接续完成。除文学家外,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者还有一部分是僧侣。如关于《通俗三国志》的最早译本作者湖南文山,就有人认为是僧侣。④

欧美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即17到18世纪,来华传教士是翻译传播者的主流。著名者如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他于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来华,前后居留38年,精通汉语,对中国经书有很深的研究。他是将中国戏剧翻译传播至法国乃至欧洲的第一人。最早将中国小说翻译传播至法国、欧洲的也是一位传教士,即殷弘绪神父。进入19世纪,为翻译传播的第二期,传播者是那些继中国文化热后而出现的一批景仰中国文化并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家。其中有传教士、商人,还有外交官和学者。如法国的儒莲、安托尼·巴赞、泰奥多·帕维;英国的道格拉斯(R·&·Douglas)、多马斯·当东(Thomas Staunton)等均是名重一时的汉学家。对欧美小说戏剧翻译传播作出非凡贡献的还有一位不能不提的间接传播者是法国的杜哈德。他作为《中国通志》的主编,热衷于传播中国文化,将元明清小说戏剧的译文最先传播给法国及整个欧洲。

总体来说,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者在明清时期均隶属于文本接受国。而作为输出国的中国,几乎没有主动进行翻译传播的传播者(国内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传播除外)。即使是明清之际,日本执政的室町幕府对外开放长崎湾(1569年),我国开往长崎的商船及侨居长崎的移民逐年增多,这中间有明代遗臣也有著名僧侣。他们积极推广、

普及汉语,甚至成立专门的组织如“唐韵勤学会”,所用的教材中也包括明清小说,但却没有什么著名译事。1884年中国驻巴黎公使馆总兵衙军参赞陈季同将军曾编译《中国故事集》,是不多见的。这种状况到20世纪初才有所改观。

传播媒介与渠道

元明清小说戏剧是以商业贸易、使节朝贡、互派留学生、僧侣往来等途径传播到日本、朝鲜乃至亚洲其它国家的。如在日本,宝历年间的明治中期的贸易商村上家就兼营书籍生意,其商业文书中记有南京开往日本长崎的“寅貳号船”的船载货物目录。其中“书籍目录”中有“《红楼梦》九部十八套”的记载。此时距《红楼梦》首次刊行仅两年。在朝鲜,明王朝与朝鲜李王朝的关系主要是由朝贡制度维系的。两国商贸基本上是通过朝贡使团进行。使团把许多中国典籍带回朝鲜,其中一部分是明王朝赠送的,但小说戏剧均不包括在内。小说戏剧文本是由随团出访的文人或译员私自买回的。明代陈继儒《太平清话》载:“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之贡限五十人,或旧典新书,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值购回”。互派留学生和僧侣往来也是元明清小说戏剧向亚洲各国传播的重要渠道。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通过日本的入宋僧侣带回日本的。此外,日本在壬辰战争中曾从朝鲜带走许多小说戏剧文本(如《剪灯新话》),这是战争传播渠道。

元明清小说戏剧文本传入日本、朝鲜后,以三种形式进一步传播。第一是以原本使用的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传播,以印刷翻刻为传播媒介;第二是口语传播,即通过“说书人”或一般的人际交往渠道传播给不懂汉语的受众,这实际上是不严格的口头翻译传播;第三是翻

译传播,以印刷行钞本为媒介。日本、朝鲜翻译的小说戏剧一般都很刻印出版。至于抄本有19世纪末由朝鲜宫廷译官翻译的《红楼梦》全译本,以乐善斋抄本《红楼梦》为代表。此外更有日本极兴盛的“租书”业传播译本小说戏剧。

在欧美,无明清小说戏剧的传播一开始便以接受国语言为媒介,即翻译传播。其传播渠道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学者、商人、外交官带回接受国。被带回的小说戏剧文本有译本,如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也有原本。原本本现今多藏于欧美各国图书馆中。据统计,欧美收藏中国典籍在10万册以上的图书馆就在10所以上。除上述渠道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战乱中被掠夺、偷盗去的。翻译本的小说戏剧被传播至欧洲后,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与出版社等进行传播。如法国的《中国通志》(英国有英文版)、英国的《亚洲杂志》均是著名的积极发表传播元明清小说戏剧的杂志。余者如英国的《凤凰》、《远东》,法国的《费加罗报》都曾刊载过元明清小说戏剧的译文。许多出版社也积极致力于中国小说戏剧翻译单行本和各种小说戏剧翻译作品集的出版。

四、传播对象

在日本与朝鲜及亚洲其它国家,元明清小说戏剧原本本的传播对象局限于精通汉文的知识分子和华裔。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翻译传播者,其翻译传播的对象扩大到不懂汉文的平民受众。尤其是改编式的翻译,可以根据传播者及受众的需要,在文字、主题、社会背景诸方面进行加工,使译作不带翻译痕迹地传播给受众。这对受众的理解与接受无疑是有帮助的。然而,明清之际的日本与朝鲜,庶民中仍有许多并不识字,翻译文本仍不能直接传播给他们。

而实际持传播效果却是中国小说戏剧故事家喻户晓。这应当归功于讲故事的人和戏剧表演的传播。关于讲故事人,朝鲜赵秀兰(1762—1845年)在《秋斋集》中有非常生动的记载。其中提到讲薛仁贵传奇故事,颇似宋元说话。关于戏剧表演传播,则有日本文化十三年(1816年)初上演人形净琉璃(日本传统木偶戏)《五天竺》的记载。《五天竺》取材于《西游记》。

在欧洲,无明清小说戏剧翻译传播的最初受众是那些文化精英们。18世纪的欧洲,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启蒙主义运动也正风起云涌。中国的小说戏剧被翻译传播到欧洲后,立即引起了进步思想家们的注意。伏尔泰、卢梭、歌德等文学泰斗、思想巨擘都曾对之发生过浓厚兴趣,并争相作出评价。1815年,歌德在仔细研究了法文版的《好逑传》这部中国清代小说后评论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⑤伏尔泰看到《赵氏孤儿》剧本时,则说:“虽有不近人情之处,然而却充满了浓厚的情趣,情节虽不见于复杂,然而线索脉络却清晰分明”,它“无疑是胜过我们旧时代的作品”。^⑥不仅如此,伏尔泰还亲自捉刀,将之改编为《中国孤儿》,于1755年在巴黎上演。经过这些精英受众的评论、介绍、改编,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开始遍及整个欧洲。

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是被动的传播,即传播由接受国进行。20世纪始有主动的翻译传播,但还远远不够。

①据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80页。

②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理查逊(Samud Richardson

1689—1761)。

③转引自《戏曲研究》(12)(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6月,第174页。

④日本元禄二年(1689年)刊行的《通行三国志》五十卷,署名“湖南文山撰”,据田中文瑟《大观随笔》所说,京都元龙寺僧义辙着手翻译,未成即歿,其弟僧月堂继而成之。

⑤出自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本文转引自《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

⑥转引自严绍《赵氏孤儿》与十八世纪欧洲的戏剧文学,《文史知识》1982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宋柏年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10
2. 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施建业著—黄河出版社,1993.4
3.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苏〕李福清著,田大畏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2
4. 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名著在国外/王丽娜编著—学林出版社,1988
5. 传播学引论/李彬著—新华出版社,1993.10
6. 大众传播学绪论/〔美〕梅尔文·德弗勒等著,杜力平译—新华出版社出版,1990.9
7. 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98
8. 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基本特性/秦志希//现代传播—1996(4)
9.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传播运用/章明寿//淮阴师专学报—1993(3)
10. 明清之际我国戏曲在日本/张杰//戏曲研究(12)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6)
11. 近四世纪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流传/黄鸣奋//学术交流—1995(3)
12.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流传和影响/〔韩国〕郑沃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4)

责任编辑:陶原珂

“之”的一种特殊用法——衬音助词

□ 唐为群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00)

[关键词] 之 衬音助词 古汉语

[摘要] 本文就“之”字在古代汉语里用来凑足音节的衬音助词用法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清理, 并加入己见。

[中图分类号] H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3-0118-04

一、嵌在专名中

(一) 嵌在人名中

(1) 介之推不言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2) 烛之武退秦师。(《左传》)

(3) 石之纷如死于阶下。(《左传·庄公八年》)

在古籍中, 特别是先秦古籍中, 人名中加“之”的现象比比皆是。凡人名, “之”一般加在姓与名之间, 无论单姓单名(“介推”), 单姓复名(“石纷如”)、复姓单名(“公罔裘”), 都是如此。落实到单个句子中, 整句音步的安排服从节奏的需要。如例(1)“介之推/不言禄。”例(2)“烛之武/退秦师。”前后都由一个单音步和一个双音步对应组合, 有回环之美。例(3)“石之纷如/死于阶下”, 前后分别由两个双音步组合, 有整齐之美。如果把这些句子中的“之”删去, 音步失去平衡, 细细咀嚼, 总感语气窘急, 放到上下文中去品味, 更感韵味不足。

(二) 嵌在地名中

(1) 以君之力, 曾不能损魁父之丘,

如太行、王屋何?(《列子·汤问》)

(2) 怒而触不周之山。(《淮南子·天文训》)

例(1)的“魁父”、例(2)的“不周”都是山名。(1)(2)不同于“是炎帝之少女”(《山海经·北山经》)、“今臣之刀十九年矣”(《庄子·养生主》)。“少女”是“炎帝”的, “刀”是“臣”的, 为领属关系; (1)不能说成“丘”是“魁父”的, (2)不能说成“山”是“不周”的, 因为它们不是领属关系。(1)(2)也不同于“小大之狱”(《左传·庄公十年》)、“鄙贱之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小大”、“鄙贱”都是形容词, 是从性状上对人或事物起修饰作用, 而(1)(2)中“之”的前项是事物之名, “魁父”、“不周”对后项“丘”、“山”毫无修饰作用。(1)(2)又不同于“当世之要务”(《史记·叔孙通传》)、“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秋水》)。“当世”、“濠梁”分别从时间、处所方面对后项进行限制, 以上表示领属、修饰或限制关系的“之”字, 其前项都是后项的定语。(1)(2)中的“之”既然不表示领属、修饰或限制关系,

所以其前项不能视为后项的定语,“之”不能用现代汉语的结构助词“的”来对译。如果(1)(2)句中的“之”不存在,也不会改变原义,如“魁父丘”、“不周山”等。细审之,即可发现,“之”在此的作用是凑足音节。《马氏文通》有云:“又或偏次字偶而正次字奇……概参‘之’字以四之。”(1)“魁父”(2)“不周”都是双音节,“丘”、“山”都是单音节,中间参以‘之’字,则此结构变三字为四字,读起来辞达气顺,音响韵足,有一种节奏鲜明的音乐感。我们以例(1)为例进行排列组合,同样可以证明“魁父之丘”的“之”仅仅是用来调整音节、舒缓语气的。如:

曾不能损魁父,如太形、王屋何?

曾不能损魁父丘,如太形山、王屋山何?

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形之山、王屋之山何?

用排列组合的方法还可以排出几种,但比较起来,这些表达方式都不如“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那样音节协和,语气舒缓。

在古籍中,“之”除了用于人名、地名中外,还可用于国名:无启之国(《山海经》);谷名:朝阳之谷(《山海经》);水名:青丘之泽(《淮南子》);建筑名:章华之台(《左传》);鸟鱼名:重明之鸟(《拾遗记》);物用名:明月之珠(《淮南子》)等。

二 粘在普通名词后

(1)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小雅·十月之交》)

(2) 左之左之,孟子宜之。右之右之之,君子有之。(《小雅·裳裳者华》)

在古汉语中,语缓增字,语急减字,伸缩自如,从而造成长短交错,整散有致,音步协调,节奏明快的优美语言。如上所举两例都出自《诗经》,而《诗经》一般以四字为句。当一句不足四字时,往往在

适当的位置上用一“之”字来补足字数。从语法上说,并不要求此处用“之”。如例(1)的“之”用于单音节持名词“食”之后,构成“日有食之”四字,只起调整音节,舒缓语气的作用,无语法意义。例(2)的“左”指文事、吉事,“右”指武事、凶事,皆为名词,其后的“之”除为补足字数外,也非语法之所必需。

三 粘在不及物动词后

(1)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诗经·关雎序》)

(2)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维其忍之。心之忧矣,涕既陨之。(《小雅·小弁》)

尹君《文言虚词通释》(1)(718页)认为“例(1)中的‘之’为语气助词,用在陈述句末,表论断、决断或终结语气,一般去掉不译。”我们认为这种解释不太可取。我们倾向于杨伯峻《古汉语虚词》(2)(352页)中的说法:“‘之’字有时放在不及物动词下,形式象宾语,却不是宾语,一则不及物动词本不应有宾语,二则不及物动词既不是意动用法也不是使动用法,也不会有宾语,这‘之’字毫无必要用它,用它,只是多一音节罢了。”如上例(1)中“舞”、“蹈”都是单音节的不及物动词,“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音节不协调,故在“舞”、“蹈”后各衬一“之”字。南宋朱熹《朱子语类·训门人》:“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动有意思,跳踯叫唤,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可证例(1)中的“之”纯属衬音。例(2)中的“陨”也是不及物动词,既不是意动用法又非使动用法,故其后不应出现宾语,它后边的“之”没有语法作用,在意义上无所指代。显然,此结构中的“之”只起调整音节的作用。

四 粘在形容词后

(1) 迹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

(2) 故小之 名卑地削, 大之国亡身危。(《韩非子·说林篇》)

朱有明《〈论语〉“之”字用法研究》^③中说:“‘迓之’、‘远之’的‘之’字为语助词(本文称衬音助词),其作用是表示一种舒缓的语气,译为‘近呢’、‘远呢’。”杨伯峻《古汉语虚词》(348页)认为“‘之’为助词,构成词语的缓中,常常在副词下,如‘今也’、‘昔者’中的‘也’、‘者’。”王力先生也曾指出:“助词中有一类是语助词(词以助足语气,微有顿挫之神情,而不表示态度者也),如‘昔者’、‘今也’、‘终之’中的‘者’、‘也’、‘之’。”^④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⑤认为,例(1)(2)中的“之”字已接近虚词了。我们认为几位先生对这类“之”字的解释很有道理。例(1)中“迓之”、“远之”,例(2)中“小之”、“大之”的“之”都是放在形容词后边,其后不应出现宾语,“之”无语法作用,在意义上也无所指代,这种“之”只起足句作用。

五 粘在代词后

(1)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诗经·魏风·硕鼠》)

(2)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邶风·君子偕老》)

对例(1)中的“之”,古今有不同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二: A. “之”是动词。此说源于郑玄。《郑笺》:“之,往也。”此说影响较大。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就将“之”解释为“往”,将此句串讲为“谁去了还长叹呢?” B. “之”是句中语气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之,其也,‘谁之永号’犹云谁其永号。《笺》训之为往,失之。”“其”为句中语气词,表反问,可译为“还”。“之”可训为“其”,当然意味着“之”也是语气词。今人注《诗》、译《诗》,多从马氏之说。北大中国文学史研究室选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

料》:“‘之’,此处与‘其’同义。”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之’犹‘其’”。二书均将此句译为“谁还长吁短叹呢?”我们不大赞同以上几位学者把“谁之永号”中的“之”训为动词(因为此句中的主语是“谁”,动词谓语是“永号”)或表反问的句中语气词(因为此中的反问是由“谁”来表达的,“之”应该是仅起足句作用的助词)。我们较倾向于崔重庆《“之”在诗骚中的一种特殊用法》^⑥中的观点,认为“谁之永号”中的“之”用于主谓之间,但并没有取消句子独立性的语法作用。我们知道,主谓间加“之”取消句子独立性后,虽可充当分句,但由于这种用法给人以语意未完的感觉,所以一般作从句,位于主句之前,未见作复句的后一分句者。从句子结构来说,此句主谓之间即“谁”与“永号”之间无需加任何虚词,但这里却加了一个毫无表意作用和语法作用的“之”,显然是为了足句。”一般来说,“其”作定语时,后边不用“之”字,用王力先生的话说,就是“其”等于名词加“之”。既然如此,“其”后的“之”在语法上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被排斥的。但是例(2)两个“其”后仍然有“之”,这足以说明足句的需要,超过了语法上的排斥。

六 粘在时间副词后

(1) 顷之,烟炎张天。(《资治通鉴·汉纪 57》)

(2) 久之,目似瞑,意暇甚。(蒲松龄《狼》)

尹君《文言虚词通释》(715页)认为:“这种‘之’字常用在时间副词后面以起停顿作用,有点接近于复音词的词尾,现代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可去掉不译。”华南师院中文系《古代汉语虚词》指出:“‘顷之’、‘久之’中的‘之’是衬字,用在词语中或句首、句中、句末,起凑足音节的作用,无实在意义。”^⑦(元)卢以纬在

《助语辞》⑧中也专门谈到了衬语语辞：“盖一句中必用虚字以为补贴，或用于句首，或用于句中，皆曰衬语，先辈所谓助语是也。如“富之”、“教之”等。”我们认为以上说法言之有理。(1)(2)中“之”除了起足句作用外，也无语法意义。

七 粘在程度副词后

(1) 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幽风·破斧》)

(2) 天保定尔，亦孔之固。(《小雅·天保》)

在《“之”在诗骚中的一种特殊用法》中，作者崔重庆认为例(1)(2)中的“孔”是《诗经》中的一个十分常见的程度副词，“亦孔之……”是《诗经》中一种相当固定的句式，如“亦孔之嘉”，“亦孔之休”，“亦孔之炤”等。我们将这种句式与“忧心孔疚”(《小雅·采薇》)、“威仪孔时”(《小雅·既醉》)相比较，即可看出这里的“之”，是为了凑足字数，非表意与语法所需。如将例(1)下句的主语补上，“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哀我人斯，我人孔将”；“之”自然就不用了。杨伯峻《古汉语虚词》(352页)中也谈到：“之”字有时作助词，在句中无意。他举的例子有：

(3) 民之论言，亦孔之将。(《诗经·小雅·正月》)

(4) 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我们赞同崔、杨二先生的说法，这种助词“之”只起足句衬音的作用。

八 粘在数词后

(1) 素丝纆之，良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邶风·干旄》)

(2) 素丝纆之，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同上)

(3) 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同上)

我们以为“良马四”是主谓结构，在意义

上和语法上已可独立成句。这里的“之”不是语法上的需要，只是为了足句和调整音节。例(2)(3)与例(1)相同。我们把(1)(2)(3)句与以下散文句式作一比较：

(4) 人十之，己百之。(《礼记·中庸》)(5) 昔者杀关龙逢而纣杀王子比干，今君虽杀臣之身以三之，可也。(《韩非子·十过》)例(4)中的“之”表示是某人或某事物的多少倍。例(5)中的“之”指他们。可以看出，(1)(2)(3)不是(4)(5)这种“数词+代词‘之’”的句式，(4)(5)句中的“之”是有所指代的。我们再把(1)(2)(3)句与下面的散文句式作一比较：

(6) 臧文仲，其不但者三，不知者三。(《左传·文三年》)

(7) 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左传·哀公十四年》)

这种句式中的“者”有时可省略：

(8) 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

⑨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赢、蔡姬，皆无子。(《左传·僖十七》)

(6)(7)(8)(9)与(1)(2)(3)句型完全相同，这说明，散文句法里名词性成分加数字构成主谓结构，后面不用“之”。但《诗经》是以四字为句，当不足四字时衬一“之”字，可证这个“之”只为凑足四字而已。

语气词虽意义较虚，但仍有一定的语法作用(如“你去了吗?”“吗”表疑问语气)，而本文所论述的“之”仅起足句衬音、舒缓语气的作用，它仅具修辞功用而无语法意义，与语气词有所不同，不宜归入语气词，称其为“衬音助词”较妥。

①尹君《文言虚词通释》，1984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杨伯峻《古汉语虚词》，1981年中华书局

历史的决定论还是历史的非决定论

——读李明华《历史决定论的现代诠释》

□ 周祯祥

(广州市社科院哲文所副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045)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3-0122-02

在我近期出版的《道义逻辑》一书中,我已经隐含地表达了我对决定论的看法。逻辑学家一般来说大都不是决定论者,即使存在所谓必然性的某种东西,它大概也只能在一个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必然性对于无限而言几乎就找不到它存在的理由。但这只是我多年来治逻辑学的一个理论直觉,并没有想到要把这个非决定论的思想理个头绪的。

明华君也刚刚出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历史决定论的现代诠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以下简称为《诠释》)。作者是认真地抱有决定论思想的,我直觉的非决定论思想是不是也有些充足理由呢?一旦潜藏的形而上学思

考得以激活,我就发现,读他的这本关于决定论的书,同时就是在理清我直觉的非决定论思想。果真其然,拜读《诠释》的结果,引发了我对于决定论思想的种种思考,尽管《诠释》并没有改变我原先的理论直觉,但它对历史决定论的多方面解释,至少让我未敢独断,觉得在这个初始性的观念上,还是多保持一些怀疑论的色彩为好。

通观全书,关于社会历史的决定论思想,《诠释》一书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我对历史决定论的依据心存怀疑,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自然界发展的决定论观点,那么关于历史发展的决定论至少就具有类比关系的逻辑支持。我认为,《诠

出版。

③朱有明《〈论语〉“之”字用法研究》,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版)1987.2。

④王力《王力文集》,第60页,1985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⑤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第99页。

⑥崔重庆《“之”在诗骚中的一种特殊用法》,载《学术交流》(哈尔滨)1988.2。

⑦华南师院中文系《古代汉语虚词》,第261页,198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⑧(元)卢以纬等著《助语辞》,第113页,1985年,黄山书社出版。

责任编辑:陶原珂

释》这本书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对这种类比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正如同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决定论有反映个体事件发展的因果决定论,进而有反映群体事件发展的统计决定论,然后有反映群体事件有机整体发展的系统决定论一样,社会历史决定论的发展形式经历的是同样的过程。

“因果决定论”孤立地考察单个历史事件,把单个历史事件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这就可以构成单个历史事件发展的因果链条。但是,历史事件和自然事件一样,也遵循量子力学的统计规律,在看来是互无条件联系的有限个历史事件群中体现出统计因果必然性,这就让统计决定论在历史发展的解释中产生了作用,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量子力学统计规律的发现,这种因果关系的覆盖面因此而得到扩展。而随着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的产生,我们不仅从单个事件之间可以发现因果关系,从事件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因果关系,我们还可以在系统论的层面上发现新的因果关系。这样,如同自然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并非是这个有机整体的各个部分的简单加和,而是具有作为整体系统的独有特征一样,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也不是简单加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也要在系统层面的特征上寻求解释。这就出现了历史决定论的更高级的形式,即所谓系统决定论。

以上所描述的历史决定论的三种形式,《诠释》作了更为简练的论述:

“从单个社会历史事件到同类的大量历史事件群,再到整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描述对象的提升,也带来了描述方式的提升,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系统决定论也就成为螺旋式的渐次上升的认识形式”。①

《诠释》一书精妙之处,不仅在于对这种以类比关系作为逻辑支持的历史决定论,作了简练而清晰的论述,尤其在于它同时从演绎逻辑的角度,表明这种历史决定论所可能碰到的困惑。作者对这种困惑所持的客观而理性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应该是一个启示。

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就是要对“预测历史进程是否可能”这个问题作出答复。在《诠释》“从逻辑方面讨论社会预测”的可能性一节中,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简略地肯定回答,这个回答我认为是过于简略,几乎只能看作是一个认定而不是一个论证。但作者恰在这一节中,显示出其探索终极问题的理论功底。当对未来的预测归结到是“自己对自己的未来进行预测”是否可能这个命题的时候,作者坦然地承认:

“的确,‘自己预测自己的未来’,这是一个逻辑悖论”。②

这何以就是一个逻辑悖论呢?作者引用了一个归谬法的例子并且用现代逻辑中的一个著名定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来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点。这种论证的支持度似乎比建立在类比关系基础上的历史决定论的支持度还要高。

作者说道:

“这个例子表明,人们对事件的描述,永远不能超过描述者正在描述的瞬时,这就永远不能满足预测未来所需要的准确的初始条件,因此也就永远无法预测未来”。③

而谈到哥德尔定理,作者认为:

“从该定理可以得出如下推论:任一以形式数论系统为子系统的形式系统,如果是相容的,关于这一系统相容性的证明就不可能在该系统内得到表述。这条不完备定理也说明了‘自己解释自己’的不可能性”。④

岭南古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读后

□ 张荣芳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3-0124-03

杨式挺先生的《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出版), 收录论文 29 篇, 煌煌 56 万字, 是式挺先生在广东从事考古文物工作 30 多年间, 关于岭南考古文物的代表性著述的结集。主要内容包括若干古遗址的发掘与重要发现; 栽培稻作的起源、演变及

传播; 广东早期铁器; 岭南青铜文化; 南海早期交通贸易; 西樵山文化; 石峡文化; 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与邻区原始文化的关系; 粤闽台先秦考古学文化关系; 港澳考古发现与祖国内地的历史关系等。书中附有大量考古图录、文物照片和各种资料统计表格, 可谓图文并茂。

因此从纯逻辑的角度看, “自己对自己的未来进行预测” 这是不可能的, 用必然性的观念来表达, 对于人类自身的历史未来的预测, 其预测的结局不存在任何必然性。

我非常欣赏《诠释》一书的这样一种论述方式: 以一种独断的立场来着力论证历史决定论的支持依据, 但在该书的最后, 又以纯粹的逻辑依据对预测性问题提出诘难, 让人们对于历史进程的问题留下种种思考。任何严肃的哲学思考者, 都会对这一类哲学问题取这种诘难和质疑的态度, 唯有这种态度, 才深化我们对于终极问题的理解。

就我个人而言, 历史进程是决定论

的还是非决定论的, 这不仅仅是一个依据命题的逻辑支持度来决定接受与否的问题, 这还当然地和人的知识背景、生活条件、心理素质等种种因素相关。如果仅从人的观念偏好来考察, 我认为, 意志自由论者和怀疑论者大都会不相信决定论, 而倾向于接受非决定论, 至如那些不相信意志自由, 持有独断态度的人, 则大都不会相信非决定论, 而倾向于接受决定论。

①②③④李明华:《历史决定论的现代诠释》,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28、158、159、159 页。

责任编辑: 罗 苹

该书所取得的成就,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对岭南史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特征、年代、分期、发展序列,勾勒出一个基本的轮廓,描述了岭南史前社会发展的生动情景。我们知道,要复原原始社会的历史,主要是靠考古资料。广东的旧石器遗存,解放前是个空白,现已发现多处,尤其是曲江“马坝人”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华南人类进化系统上的空白。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岭南占有重要位置。作者及其同事们,在全省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发掘。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遗物地点)已达五六百处之多,清理墓葬 200 多座,窑址 20 多座,各类文物数以万计。经过作者及其同事们的研究,已经大致弄清了全省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分、特征、年代、分期、各种埋葬习俗以及经济生活特点,并已提出若干考古学文化名称或文化类型,如粤西区“独石仔——黄岩洞类型文化”、粤北区“青塘洞穴类型文化”、韩江三角洲“陈桥类型文化”、珠江三角洲“西樵山文化”、粤北区“石峡文化”、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南路区——海南岛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等等。其中“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已被列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西樵山遗址”、“石峡遗址”等已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条目。文化分期则可分早期、中期和晚期。作者在该书的诸多篇章中,向人们展示出岭南的先民们如何从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发展到披荆斩棘、因地制宜,从事原始锄耕农业、渔猎捕捞业、家畜饲养业及石器、陶器、玉石牙饰物等手工业制作的一幅幅绚丽多彩、艰苦创业的生动情景,描述了岭南原始社会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过程。

第二,就岭南先秦时期的青铜文化问题提出系统的见解,并把岭南青铜文化遗存的发现、分布、内涵、特征、年代与分期作了理论的概括。岭南先秦时期有没有存在过青铜时代,是否出现过奴隶制,是岭南古史上的重大学术课题。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存在过青铜文化,也存在过奴隶制;另一种意见认为存在过青铜文化,但不赞成有奴隶制;第三种意见认为不存在青铜文化,岭南发现的先秦青铜器,是秦或汉初的将领或官员从中原带来的。据该书作者统计,广东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含遗物点)约有 500 处,墓葬近 200 座,各类青铜器 1100 多件。这些青铜文化遗存几乎遍及各个省辖市。作者把这些青铜文化遗存,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并从这些青铜器形制特征分析,认为岭南先秦青铜文化,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本地区新石器末期原始文化基础上萌发起来的;而它的产生、发展过程,始终受到长江以至黄河流域先进青铜文化的影响和浸润;岭南青铜文化的创造者应是本地区的古越人。至于岭南地区是否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作者定位为“不发达的奴隶制”,我认为这个提法也是符合岭南历史实际的。

第三,就岭南古文化与邻近地区古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独立的见解。中国土地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呈现出千姿百态。因此,原始先民们在各地所创造的文化也就会有千差万别。考古学文化就是考古遗存中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具有相同特征的文化共同体。一个考古学文化以若干特定类型的居址、墓葬、工具、陶器、装饰品及独特的工艺技术为标志,可反映一个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古代社会集团。

运用考古学文化的方法去观察和分析考古遗存,使在考古学中探寻各个族的共同体的特殊发展规律成为可能。式挺先生的老师苏秉琦教授,根据考古学文化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创立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为从宏观上研究原始文化的体系,从考古学上研究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各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式挺先生正是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去研究岭南古文化与邻区古文化的关系的,并得出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比如他把石峡文化类型遗存与江西樊城堆文化作比较研究,认为“樊城堆与石峡文化的面貌最相似,两者的关系也最密切。”两者的关系很可能就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当中的“赣江——北江区”同一原始文化系统的两种类型。同时,作者也注意了石峡文化与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区、湖南湘江流域的原始文化的关系等。又例如西樵山文化,作者把西樵山文化的主要因素如双肩石器、绳纹圜底釜、广东彩陶的源流、墓葬、人骨与拔牙等问题与邻近地区的原始文化的关系作了广泛的探讨,对进一步认识西樵山文化是相当有益的。

还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作者把近年来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考古新收获、出土的文物,与珠江三角洲出土的文物,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写出《“大湾文化”初议》、《香港古文化的根在大陆》、《从考古

材料看香港与祖国内地的历史关系》、《略论澳门黑沙史前文化与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关系》等有份量的论文,从考古学上论证香港、澳门古文化的根在内地,阐述了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的血肉联系,为香港、澳门主权回归祖国,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从该书几篇关于岭南秦汉以后历史的文章以及书后附录《未选录的文章目录》来看,作者对秦汉以后的岭南历史也有许多真知灼见,也是非常可贵的。

总之,作者从理论与实践、考古与历史的结合上不断探索,通过大量的真实可靠的考古材料,反映了岭南不“荒”,“南蛮”不“蛮”的本来面貌。因此,该书所取得的成就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由于该本书所收的论文,其发表时间前后相距 30 多年,所以有的论点或材料前后有抵牾之处,作者为保持文章原貌以展示自己研究的轨迹,集成该书时未作修改,这是允许的,希望读者注意就是了。

最后,我想以国际著名汉学家饶宗颐教授为该书作的《序》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杨君从事考古专业多年,多所创获,细读此书,其特色有三:(一)每涉一专题必作综合性的全面考察;(二)必引征文献史料,故所论皆信而有征;(三)必原始要终,细加辨析,以求其是。综此之长,信足为来学典范。”

责任编辑:郭秀文

寻根问底,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评何楚熊《中国画论研究》

□ (香港) 邱振声

[中图分类号]J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3-0127-02

研究中国画论的著述很多, 往往侧重点不同, 有的在探索中国艺术精神, 有的勾勒中国画论的理论体系, 有的在揭示中国画论的哲学基础, 有的在阐释中国画论的创作经验和审美价值取向, 还有艺术鉴赏研究, 真是五花八门, 见仁见智。这显示了中国画论的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何楚熊教授的《中国画论研究》一书, 则别具一格, 以儒道释文化合力作用审视中国绘画艺术及其理论, 着意在通过画论本身的剖析, 盘根究底, 辨难释疑, 还中国画论及中国画发展过程的历史面目, 使人对中国画论及中国画的历程有一个接近本原的认识。当然这样做, 要花很大的气力, 甚至要舍得花些“笨功夫”; 唯其如此, 既难能又可贵, 值得重视。

全书分为“上篇”“下篇”和“导论”“附录”几个部分, 论述中国画论的不同品格, 中国画论发展的历史逻辑。“导论”讲的是中国画从上古青铜艺术的象征形象, 到崇尚形似, 追求客观真实, 走向宋元写意倾向, 以神似为快的历程; 提出中国画从象征型走向写真型而后发展为写意型的必然走向, 这是前人未有的立论, 并从大文化视野, 探讨中国画发展

走向的文化根源, 阐述了文化合力作用的理论而异于流行的庄文化根源说。中国早期的绘画以人物肖像为主体, 这是为了祭祀, 表彰祖先的功绩。只有形似, 才能达到目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的开篇就提到这一点。这是发轫于祖先们的图腾崇拜, 到祖先崇拜的需要。这个历史阶段的“形似”说, 与古希腊文艺所提倡的模仿理论原则上是一致的。过去有人曾以为中国文艺一直强调写意, 强调形似是西方艺术的专利。这显然是一种误导, 是一个不明真相的错误。此书纠正了这个错误。

“上篇”通过对有代表性的画论著作的剖析, 梳理了写真型绘画理论的发展历史。其中有不少精到之论。比如对谢赫“六法论”的剖析, 就从剖析六朝这个文学艺术的“自觉”时代, 艺术家们在批评与鉴赏中所遵循的艺术批评标准与原则这个广阔视野, 说明谢赫“六法论”中所论述的内容便是当时大家的共识, 指出其与顾恺之所涉及的关于传神、神韵、骨法、布陈、阵势、模写等内涵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六法论”是从人物画的创作实践概括出来的, 六朝便是人物画发展成熟并占画坛统治地位的时代。因此“气韵生动”是六法中的主要标尺。作者指出: “这已为古今学者共识了的。”对

“气韵生动”的辨识,作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说:“以往谈论这个尺度,大都着眼于‘气韵’内涵的辨识,这当然是必要的。但窃以为‘生动’则是谢赫的创造及独特的贡献,是纯属于美学的贡献,而且是这个尺度,乃至整个批评尺度的关键。”作者在肯定由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的说法:“在中国美学史上,明确地把‘生动’一词用于艺术理论中,并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美学意义的概念,是从谢赫开始的”之后,进一步考察了“生动”观念的形成及其涵义,指出:“这‘生动’不仅是如有的论者所认为的‘形似’,而是已经蕴含着主体的审美感受,用现代的话说,相当于主客体生命交融的产物的意思。这与顾恺之的‘传神’论之‘传’就有了极大的区别,‘传’是一种被动的活动,是以被‘传’的客体为本的活动。而谢赫的‘气韵生动’,则体现了主客体的双向关系。是故,谢赫对客体生命精神不以‘神’概括,而以‘生动’名之。……它是对象的生命、精神、气质、性格的总体显现,是创作主体对这一切的审美感悟。”这是深刻的。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顾恺之的传神说是写真型绘画的重要理论,然而,其传神论不可能直接导出宋以后的以抒发创作主体情怀为主的写意型的绘画艺术。谢赫的‘气韵生动’论便成为这种过渡理论的基础。……这是谢赫对中国美学发展的独特而重要的贡献。”这便理出了从古代的“写真型”绘画到宋元的“写意”绘画的内在联系,即它们的承传关系,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依据。

显然,作者对“气韵生动”之生成、内涵以及其在艺术批评与鉴赏,乃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是很有意义的,不仅有助于准确地把握

中国画论的精髓,理解艺术就是生命运动的真谛,也为正确地进行艺术批评与艺术鉴赏,提供了一把钥匙。

“下篇”则系统地梳理文人画论——写意型绘画理论的发展过程,并归纳为三个阶段,对各阶段之代表论著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论述。其中对苏轼及其画论,邓椿《画继》美学思想,董其昌文人画论的剖析与论述都很有独到的见地,有说服力地辨识了过去对写意画理论中的一些错误理解,为写意画传统勾勒出了一个完整明晰的理论构架,使人对中国写意画理论的博大精深及其文化渊源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这工作也是前人未有认真做过的。

“附录”,也是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研究中国画论的足迹,表现了作者重名著、重典型材料的态度。

还想着重指出一点,本书在方法论上的意义。作者提到,本书在写作时采取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它的表现是,用材料说话,让历史作证,尊重逻辑的规律。当然,这要耗时费力。60年代与楚熊同志一起在广西一所高校任教。从那时开始,她便省衣节食广泛搜罗有关中国画的书刊与资料,写下数以千计的卡片。可惜,“文革”她被抄家时,几乎损失殆尽。“文革”后再从头开始。撰写书稿时,前后历时八年,曾数易其稿。个中甘苦,别人难以感受。该书凝聚了她数十年的辛劳与心血。终于完成了预定的构想,得力于她那种坚韧不拔稳扎稳打的作风以及重材料的实验主义精神。这种良好的学术传统精神,很值得肯定。

责任编辑:童 轩